941399

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内容提要

张元济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远见卓识、有才能的先驱者、实干家。他一生都处在时代的大变动、大动荡之中，曾参加过戊戌变法，经历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最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自1901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后的半个多世纪，他呕心沥血，开拓前进，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丛书简介

《走向未来》丛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领导编辑的一套介绍当代最新成就的综合性的系列大型丛书。

它偏重介绍新兴的边缘学科，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它将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和责任感。整套丛书共约100本，计划在几年内出齐。

书号：17118·122

定价： 1.50 元

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

编委名单

《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包遵信

副主编：金观涛　唐若昕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学良　王　焱　王小鲁　王岐山

王晓强　尹蓝天　包遵信　乐秀成

刘青峰　朱嘉明　朱熹豪　阮芳赋

严家其　何维凌　张　钢　陈子伶

陈越光　易小冶　金观涛　唐若昕

贾新民　翁永曦　陶德荣　黄江南

董秀玉　樊洪业　戴士和

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

——张元济传

汪家熔 编著

10001214843o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特约编辑：刘青峰

责任编辑：傅世悌
封面设计：戴士和
插　　图：戴士和
装　　帧：盛寄淳

走向未来丛书

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

汪家熔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60mm 1/32 印张9.75 插页9 字数147千
1985年4月第一版 1985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17118·122 印数：1—54,300册

定价：1.50元

张元济先生七十岁生日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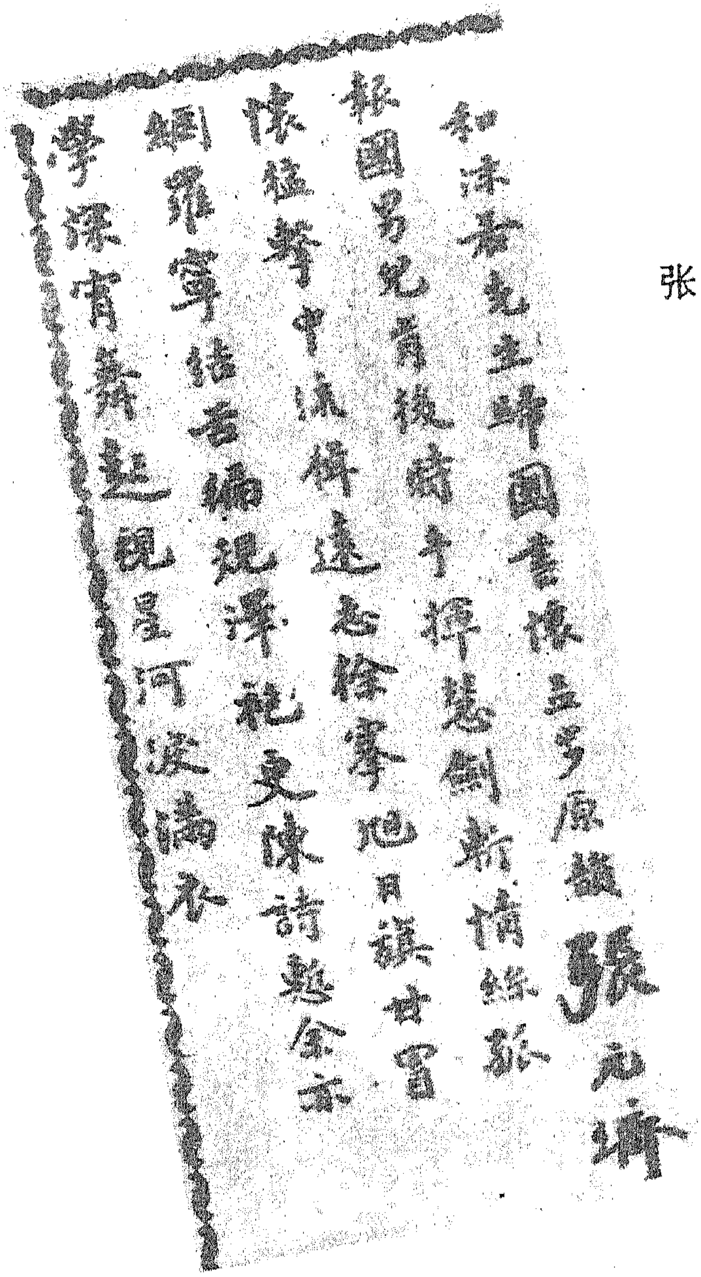
张元济先生一九〇一年
在南洋公学时摄于南洋公学

张元济先生的事业朋友夏瑞芳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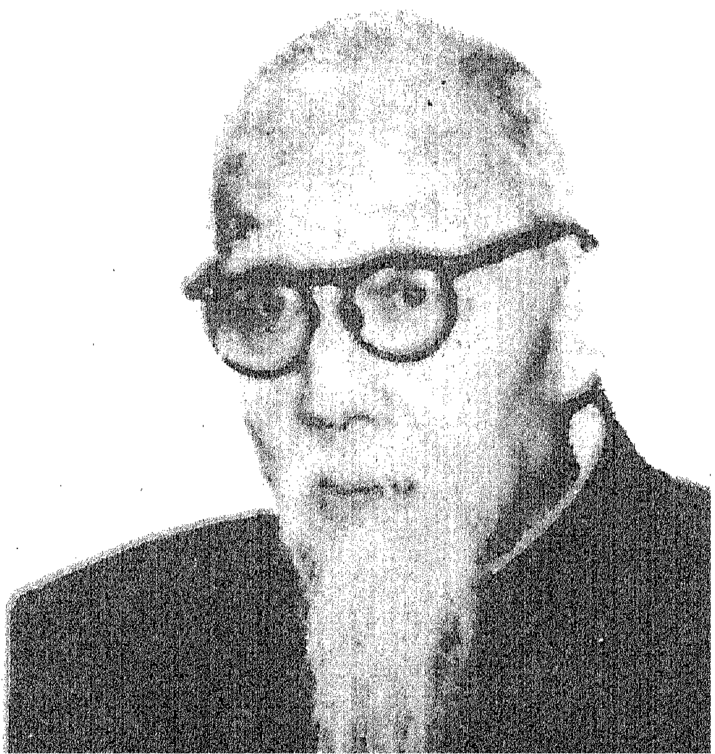
张元济先生的事业朋友杜亚泉先生

张元济先生四十岁生日照

“四川之游”在成都，自左至右：李宣龚、张元济、高梦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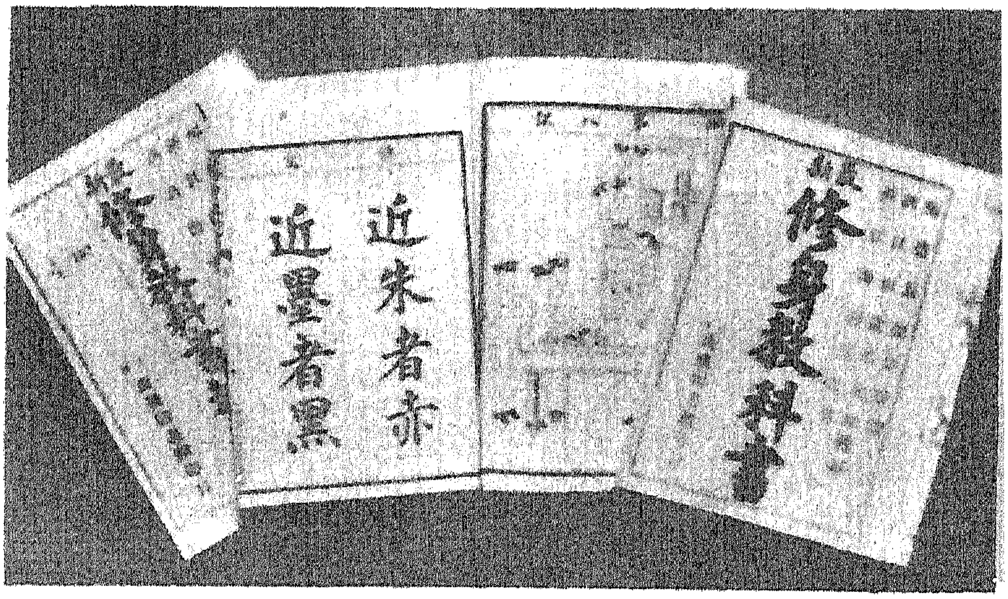


张元济和郭沫若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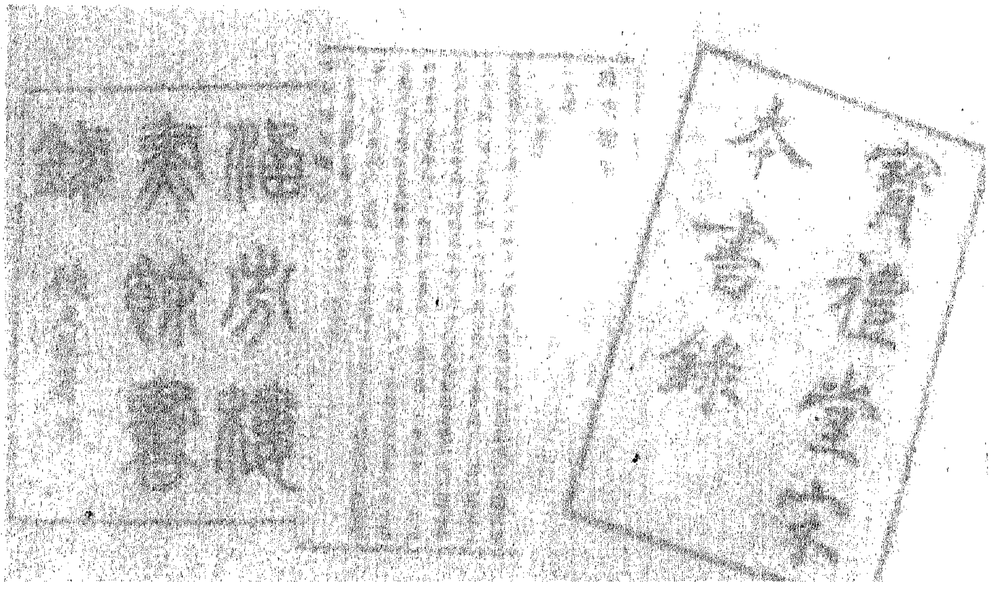


陈叔通先生

张元济参加编写的《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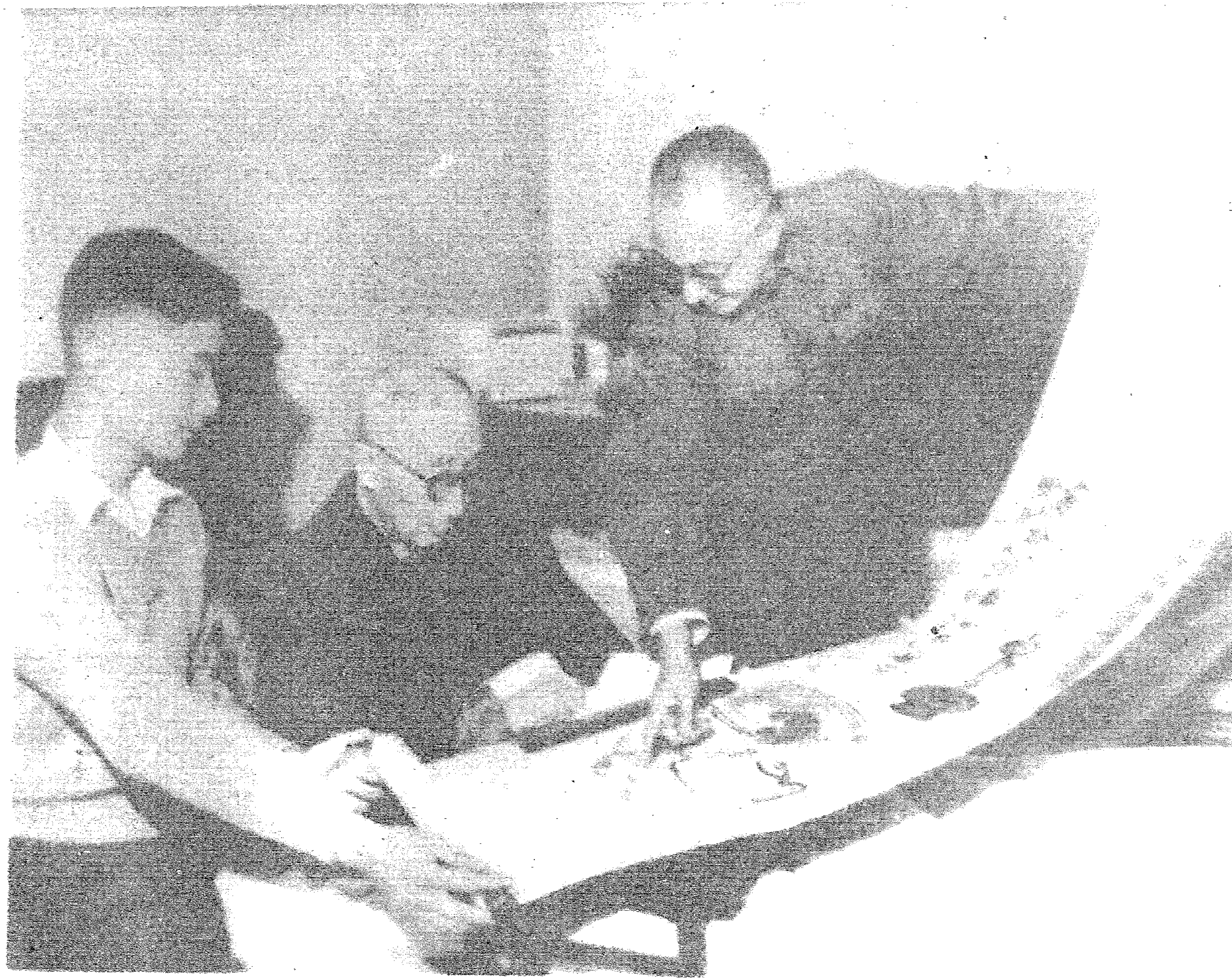


张元济编：《最新修身教科书》第一册。



张元济的目录、校勘著作：《涵芬楼烬余书录》、《校史随笔》、《宝礼堂宋本书录》。

张元济（中）九十寿辰，展看上海市长陈毅同志所赠齐白石画。



编者献辞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

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领导下，我们编辑了这套《走向未来》丛书。

她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5页。

《丛书》是个新的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目　次

一、只能从少年时讲起……………………1
二、戊戌前后……………………………9
三、在南洋公学译书院…………………27
四、他的教育思想和加入商
务印书馆……………………………43
五、“开辟草莱的人”…………………61
六、最新国文教科书……………………77
七、摈弃三纲的伦理道德观……………92
八、为教育的健康发展…………………102
九、四条铁路……………………………120
十、辛亥革命时期………………………131
十一、夏瑞芳之死………………………152

十二、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163
十三、办函授学校……………………………………174
十四、梦里也惦着商务印书馆…………………………178
十五、五四前后………………………………………189
十六、看似容易却艰辛…………………………………205
十七、闲暇和情操……………………………………234
十八、在民族灾难面前…………………………………247
十九、黎明前…………………………………………266
二十、“及身已见太平来”……………………………275
后记……………………………………………………288

引用书目………………………………………………290

一

只能从少年时讲起

张元济离我们并不很远。写他的传却有两个困难。从生活上讲，他的童年并没有留下什么有趣的生活轶事，更没有传奇式的故事。他那严肃而有规律的生活，就连和他一起生活半个世纪的儿子和他钟爱的孙女，都回忆不出他曾经说过什么一句半句笑话。他毕生为祖国的富强独立而努力，留下三四百万文字，却找不到一篇论文、一次演讲宣传他的理想。好在一个事业家重要的是身体力行，往往把他的理想埋在心田。事业就是标志，在他事业的进程中我们探索他的思想，在他的成败中领略他生活的情趣。

旧时习惯和现在不一样，一个有些地位的人除

了自己和正式文书上用“名”外，别人当他面或背后都不能直呼其名而用“字”或号。张元济，元济是他的名，他的字叫筱斋，号菊生，大家习惯都叫他张菊生。他的籍贯是浙江嘉兴府海盐县。一八六七年生。

他祖父名漢，父亲叫森玉。父亲被托付给人，跟随人离海盐到广东，当时只有十二三岁。

旧时习俗，遇有大的兵灾时，有托人把孩子带离家乡，远地避难以保“根苗”的习惯。

森玉成年后在广东结婚成家，生有三子二女，张元济是他第二个儿子。因为森玉先生在粤东的行踪查考不全，所以张元济的诞生地只能说可能是广州。

因为那时科举只能在本府、本省考试，森玉先生一直在外，所以他虽读书却并没有取得功名。他用当时通行的捐官办法得到同知直隶知州的衔，实际只做过广东会同县和陵水县两任知县。

张元济十一、二岁的时候，森玉先生同他讲过张家上代的事情。

张元济印象中最深的有三位。首先是张九成，原先是开封人，后随宋南渡到杭州。他是张家迁到浙江的始祖。因为在对金的战和问题上与

秦桧不合而被罢官。在他罢官的十四年中闭门读书著书。另一位是十世祖奇龄先生，是从杭州迁到海盐的一支的始祖，他极有学问而不愿做官，主持书院讲学。还有一位是九世祖惟赤先生，号螺浮。顺治、康熙时在京师做官，直言敢谏。后来有人把他的奏牍编集刻印，名《入告编》。森玉先生一再叮嘱孩子成年后要好好读一读《入告编》。

后来张元济回到海盐时就设法借到了《入告编》，细细地读了这本奏牍。惟赤先生做京官的时候离满族入关不久，汉族官员一般不敢对满族人有什么不满的话，更不敢对朝廷做有损汉人利益的事讲话。而惟赤先生敢于据理力谏，置个人利害于不顾。他反对当时满族贵族"跑马圈地"，保护汉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他建议把因战争而产生的无主土地发给人耕种。他反对当时刑部审理案件记录口供只凭满族官员的记录。当时康熙接位而未亲政，实际权力落在鳌拜手里，他胡作非为而满朝官员不敢说话，惟赤先生上疏请亲政。张元济说，他读了《入告编》"益晓然于致君泽民之道"，就是杜甫所说："致君尧舜上，要使风俗淳"，也懂得了他父亲当时为什么

一再叮嘱他要读这些奏牍的道理。

读书人十分珍重图籍。森玉先生还告诉孩子，张家世代读书，所以藏书很多。特别是六世祖宗松先生，非常博学，喜欢作诗，年轻时写的村居诗有“隔水一牛横笛去，盘云双鸽带铃来”句，当时争相传诵。他的《寒坪诗钞》士人传抄。他特别喜欢刻书。他所刻各书都为当时的读书人珍重。宗松先生的几位兄弟宗柟、宗棣、载华先生都有极丰富的藏书。载华先生藏书万卷，遇到善本书都要亲自抄录，刻有《初白菴诗评》。这些藏书经历一百多年而没有散失，也是极难得的。嘉庆、道光年间，江浙的校勘家吴免床、鲍渌饮、陈留庄、黄丕烈都曾到张家借书校勘。

张元济后来说，他听了父亲的这些话后心里极为触动，久久不能忘记。

森玉先生在广东前后出任两任知县，一是会同，一是陵水，都在海南岛。海南岛会同县所在地现在叫琼海，在五指山麓万泉河畔，沿海椰林丛生。陵水在海南岛南端，紧靠着那“天涯海角”之所崖县。从张元济后来的文字中我们只能发现提到他幼年在广东的事，绝未提及海南岛。估计森玉先生没有带家眷到任上。在一八八〇年张元济十四岁

时，谢夫人带领孩子们长途跋涉回到了母子们都从未见过的海盐老家。略事安顿以后，孩子们一一晋谒族中长辈，一则是礼节，二则也是求得同族照拂。晋谒长辈，也就认识了不少同族弟兄。在他们的陪同下，去南城外寻访涉园旧址。

涉园原来是十世祖奇龄先生在明代万历年间所建的住房。后来九世祖惟赤先生托病引退回到家乡后扩建成园，题名涉园。以后陆续经营维修，林泉台榭极具规模，为一邑之胜，骚人墨客不乏题咏。嘉庆年间曾辑集刻印成《涉园题咏》。后来经过兵灾，园已被毁，颓垣欲堕、小池湮塞，只有大可数围的参天大树犹存。

母子们回到海盐过了一年多平静的生活。突然传来噩耗，森玉先生在陵水任所病故了。

张家世代读书，张元济自幼就被安排在读书、科举图出身、出仕的道路上。他在广东的时候就和哥哥元煦、弟弟元瀛跟随舅舅谢榴生读书。他们回海盐后，就和舅舅分别而跟别的老师学习了。森玉先生过世并没有打断张元济兄弟三人的读书生活。唯一的影响可能是因此而养成了张元济节俭而不吝啬以及实干的作风。

有人写文章说森玉先生过世后一家生活无

着，依靠张元济的廪饟和设帐授徒过活，这是不确切的。他在成为进士后说过，他是到离家三四里外的查济忠先生那儿去读书的，他弟弟则到另外一位先生那儿去读书，弟兄俩虽很友爱而不能在一起读书。后来又跟朱福诜先生学，所以完全不可能自己再去收学生教书。

张元济说，他父亲过世后家里辞退了佣人，出去读书也是为了省些钱。他的老师查济忠科举极不得意，只是秀才，后来不满四十就去世。张元济跟查先生学了一年多后跟朱福诜先生学。朱福诜先生的学问比查先生要高，后来成为翰林院编修和侍讲。他在清末的宪政活动里也很活跃。

清朝的科举制度同明朝一样。第一关是“入学”，就是考秀才。科考取得一、二等的秀才有资格参加乡试。乡试合格的就成为举人。举人名额各省各时期不一样，光绪年间浙江每次取五、六十名，可见中举是很难的。乡试的第二年在京城举行会试。晚清每次会试约有六千左右举人参加，录取其中三百名左右，称为贡士。

一八八四年张元济十八岁才入县学成为秀才。他考得很好，冠军。但是拖了五年到一八八九年他二十三岁时才在省里乡试考中举人。中举人后到下

一科一八九二年壬辰年中进士。他当年乡试、会试的謄录卷还在。他在卷子上填的出生年龄有失实之处，乡试时他报小两岁，会试时报小六岁。可见他中举、中进士时的实际年龄稍大了一些。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他的意思，只是说他并不象有的人说的那样“连中三元”，一帆风顺而已。会试中了叫贡士。发榜后即刻复试，复试没有疵漏的参加殿试成为进士。从考秀才到成为贡士参加殿试，最起码要经过七次考试，每次考试都要三场，每场都要考三至五个卷子。而且都是在极严格的搜身、监考下进行的。惟独名义上是皇帝亲考的殿试只考一个卷子，而且到了保和殿上拿到试卷以后，张元济说，可以“在殿上各呼相识，接席联坐，谈笑自若，凌乱无序”，而监考的大臣只当没有看见。

清朝殿试名次高低全凭试卷上字的好坏，内容反而无关紧要。张元济讲，当年他殿试时刘福姚坐在他边上，问他借小刀刮写错的字。张元济递刀给他的时候看到他卷子上的字写得非常好，就说这样好的字今科状元必定是你无疑。发榜后果然如此。当时虽传为佳话，却可概见科举之荒唐。

本章主要引用材料

《〔海盐〕张氏族谱》

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

张元济：《祭四弟文》

《壬辰会试硃卷·张元济》

《己丑浙江乡试硃卷·张元济》

《翁同龢日记·壬辰春闱》

张树年一九八二年谈话录音：赴会前后

二

戊戌前后

张元济一八九二年中进士以后，经过朝考，被选为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

明清两代都以翰林院为培养、储存高级官吏的场所。翰林院出身的人升迁快。“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其余列卿尹、膺疆寄者不可胜数。士子咸以预选为荣。”（清史稿108卷）每次朝考后从新进士中选拔文学、书法好的人入庶常馆为庶吉士，专门读书，也称“观政”。三月一考，到下科会试前进行一次大考后，一部分留在翰林院任编修、检讨等职务，一部分分到各部充任给事中、御史、主事、中书或到地方任推官、知县、教职，称为散馆。

张元济散馆时被任为刑部贵州司主事，是六品官。张元济从翰林院出来到刑部，刚踏上仕途，适逢我国正受着又一次的大冲击——中日甲午战争。

张元济诞生前后，我国正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自鸦片战争开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以后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咸丰七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攻天津、北京，抢掠和焚烧圆明园；沙俄趁机胁迫清廷签订瑷珲条约，割地六十万平方公里，“共管”四十万平方公里。光绪二年，英国入侵我国西部；九年，中法战争爆发；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清廷无战不败，败必割地赔款。康有为的《强学会序》说“俄北瞰、英西睒、法南邻、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这篇文章极真实地描绘了一幅帝国主义妄图瓜分我国的局面。处在这种局面下，年轻知识分子有点血气的都不醒自醒。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被原来并不“起眼”的近邻日本打败，给人的震动更大。汪康年说：“自甲午以来，吾华士大夫鉴于中国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万万之众，败于扶桑三岛，割地偿金为世大辱，始亟亟于知彼知己，舍旧谋新，以图自强而洗大耻者。”

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唤醒了更多的知识分子以图自强而洗大耻，而且从日本的变化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日本原先也是受西方资本主义的炮舰欺侮的一个弱国，自从明治维新以来短短二十多年竟变得如此强大。中国的出路就是变法。因而，从《校邠庐抗议》开始倡导新政和康有为第一次上清帝书以来的变法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反对签订马关条约为中心的公车上书也扩大了变法思想的影响。七月，强学会成立，标志维新运动进入了组织阶段，尽管强学会是各色人等参加的连名单都没有的松散组织。

强学会由康有为联络、帝党赞助，好些官僚捐款，连李鸿章都想参加。这说明当时救国、变法声浪之高已成为时髦的事情。为了减少阻力，强学会由文廷式出面。他是帝党，瑾珍二妃的老师。光绪为了擢拔他，专门举行了一次已经多年不办的翰詹大考，升授他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实在是维新派的一把挡风伞。

文廷式作为帝党重要人物在中日开战不久就成为陶然亭年轻京官集会的核心人物。陶然亭是个“文人雅集”的地方，年轻京官都喜欢去。碰到军事不利，虽然品级低的官员不许集会议论朝政，但

谁都会议论两句，各种观点都有。这就是所说的陶然亭集会。沈曾植、沈曾桐、叶昌炽、李盛铎、陈炽、黄绍箕、徐世昌等人都参加这种议论，张元济也是常去的一个。他们虽然从爱国救亡出发，却提不出正面的反帝主张和新办法，仍然是洋务派“以夷制夷”和“两害相较取其轻”的老办法。叶昌炽日记说，海战失利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九月初八日文廷式主张利用日本与英国在华利益的冲突，法国和德国的矛盾，请英德出兵。日记说这个意见因对英德政府是否会同意没有把握，当场被大家否定了。但据翁同龢日记，第二天文廷式却起草了三十八人联名奏摺。

参加陶然亭集会的人见识目的不一样，所谓“闻见既岐，趋向各异，未几星散”。陶然亭集会里很多人后来参加了强学会，张元济没有参加，而且后来类似的组织他都没有参加。什么原因呢？儒家从《论语》开始就宣称君子不党，后来封建专制，党禁更严。张元济后来说：“党会二字当时视为蛇蝎。”

我国文人喜欢“以文会友”，盛行以诗社、书会的形式彼此交往，切磋学问。张元济当时也参加这一类的结社。他和陈昭常、张荫棠、夏偕复等组织

了一个“健社”，一共八个人，其中五个是广东人。他们“约为有用之学，盖以自强不息交相勉，冀稍挽夫苟且畏缩之风。”

健社人所说的“有用之学”就是西方的东西。中日战争失败后，变法走日本明治维新道路的思想日益发展。毛主席说，那时要求进步的人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当时对外国先进事迹的了解已不再满足于坚甲利兵，格致之学。当时翻译成中文的书极少，而且大都是理工书，讲政法经济的更少，这就有一个学外文的问题。当时要想了解外国的人几乎都学外文。蔡元培曾和王书衡商量办东文书馆，后来请陶大钧教日文。汪康年在上海鼓动罗振玉利用《农学报》日本翻译办东文学社，等等。张元济则在光绪二十一年即一八九五年底开始学习英文，正是组织健社的时间。健社所学的“有用之学”就是英语、算术。经过一年的学习英文活动，愿来附学的又有十多人，共二十多人，因此有进而设立学堂的活动。初名“西学堂”，于光绪二十三年一月在总理衙门备案。所以用“西学堂”而不再

用“健社”，因为人多了，再用社的名义易招事：“强学覆辙不远，一切概从静晦”。梁启超描写过他们的活动：“自强学一役，被议中辍，而京师一二劬学之士犹为小会，月辄数集，相与讲论治平之道，亹亹勿绝，今琉璃厂之西学堂是也。”后来严复以“国子之教六艺是职，艺可从政，渊源圣门”，建议学堂改名为通艺。既然“艺可从政”，对一部分人来讲，求学的性质变了，收的学生不但是年轻官员，也有官员的子弟，学好后可以此为进身。所以他们在八月份给总理衙门呈文中希望对“学习期满，著有成效，有官人员保加升阶，无官人员比照同文馆作为翻译官。”清廷基本上满足了这个请求，因为当时清廷设立的同文馆和上海、广州同文、方言馆的毕业生远不敷应用。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对通艺非常热心，“约了几个大臣联名写信向各省督抚募捐。一共捐了好几千元，张之洞，王文韶等都有捐款。”

张荫桓和通艺的另一发起人张荫棠并非弟兄，他支持通艺并非因为他热心新政。他是总理衙门中不兼军机的大臣，所以事务管得多些，后来张元济进总理衙门后和他接触较多。变法后张荫桓受命处理矿务铁路总局，奏请准张元济兼办

该局事务，所以当时有"二张"之说。虽然政变时张荫桓被谪充军新疆，但确非维新人士。

通艺的发起人就是健社：陈昭常、张荫棠、何藻翔、曾习经、周汝钧、夏偕复、张元济。前面五人都是广东人，后面两人是浙江人，张元济为浙江籍而生长于广东，视广东为第二故乡。其中何、曾、周、张是同科进士，陈昭常也是进士。同年又兼同乡，又都有志于西学，所以多年在一起活动毫不奇怪。但是健社成立半年左右张荫棠到美国去，不久陈昭常到云南去，所以后来健社发展成通艺，主要是张元济的努力。现在能找到的当年张元济给汪康年的书信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关通艺事务的记录：托找教师，托在上海买语法书，托买中西文参考书，等等。后来学生增多后，发生了种种不同意见。因为有子弟，为考差和乡试而生"魔障"；又坚持请外国教习，不管经费短缺。张元济为了把学办好，坚韧不拔想尽办法。

一八九七年五月初一《知新报》消息也证实："京师强学会封禁以后，有一二志士倡为小会……后官书局复开，而此小会仍别行，相与讲求实学，惟日孜孜。顷闻集者益众，已有数十人，……常住会中者，为刑部主事、总署章京张

君菊生元济云。”

通艺的办学不同于当时所有学堂之处，是办学民主。学校最高为学董，负责教学事宜，堂董负责校务；另有议事员四人，负监督责任。而学董、堂董和议事员全由同学公推选举，并且不能开支薪水。学生随时可以提出建议，而学董、堂董应及时答复处理办法。这种民主精神在当时实在是仅见的。

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夏天张元济一面学习英文、办理通艺学堂事务，一面和唐文治等报考总理衙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办理外交事务、存在过四十年之久的“临时机构”。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奕䜣等提出外交事务暂从军机析出，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协助大臣处理事务的主要助手是由内阁部院各司员中经过考试挑选暂调。清代，内阁、部院、军机协助主管处理案牍的官员，在军事部门称章京，在文职部门称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因为是从军机处析出，所以称章京。张元济是刑部主事，有资格调任。张元济和唐文治等一起报考，被录取，于次年九月进总理衙门，任章京。

他进总理衙门的原因是感觉办外交的人太窝囊，想进总理衙门做一番事业。然而进总理衙门后他大失所望，不仅“在总署无可进言之处”，而且他说他碰到了一批不可理喻的未开化的野人，处处受排挤，刁难。当时与外国签订的条约，签字文本放在一个木橱里，毫不把它当一回事。而有次伍廷芳从美国寄回一份美国茶叶进口检验规定，张元济见到后想抄寄一份给汪康年在《时务报》上刊载，以利于对外贸易。不料被另一人见到，说此举是“漏泄军机”。同僚的头脑如此不清，他只能报之以“哀哉”。进总理衙门后，张元济并不能为外交出力，还受到排挤，也不能象在刑部那样有时间学英文，所以在当年十二月下旬已萌生退志。

他后来没有离开总理衙门，是与时局变化有关。次年，即戊戌年正月初二，光绪命令总理衙门大臣延见康有为，问变法事宜。时局正向着有利于新政的方向发展。

当时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仅总理外交事务，还是“不管部”，凡是一切新政，统归总理衙门办理。如果光绪能接受维新建议，总理衙门岂不有大量事情可以做？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下《定国是诏》，宣布变

法，命各大臣保荐人才，“百日维新”开始。二十五日，侍读学士徐致靖上保荐通达时务人才密摺，保荐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五人。徐致靖的密摺对张元济的荐语中讲：“刑部主事张元济，现任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这个评语十分实际，“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这十六个字不仅是当时，而且一直是张元济所信奉的办事规程，也是我们研究和了解他的一个线索。

徐致靖上保荐人材摺的第二天，四月二十六日，光绪就下谕康有为和张元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地点在颐和园。

四月二十八日清早张元济到西苑朝房等候传唤。这天荣禄也在朝房等候传唤。荣禄是来陛辞请训的。荣禄的出现正象维新的清晨遇到乌鸦，是个坏兆头。

清廷规定皇帝只召见四品以上的官员。光绪在上年底准备召见康有为，因为康只是六品官，恭亲王奕䜣力阻，才有初二日由李鸿章、翁同龢、荣禄、

廖寿桓、张荫桓等在总理衙门约见康有为代光绪问话的事。“百日维新”开始，光绪召见康有为、张元济，是清朝二百多年历史上第一次皇帝破格召见六品官，当时局势变化很快。二十六日下召见谕时这未尝不是件喜事，但二十七日时慈禧已命光绪下了三道对维新极不利的上谕。一、将光绪的师傅、帝党领袖、协办大学士翁同龢斥革，并且命令马上离开京城回常熟老家，把光绪唯一的一只手斩掉了。二、召见游移于后、帝间的直隶总督王文诏而任命后党领袖荣禄署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三支部队，京师四周军队尽入后党手中。三、规定授侍郎以上的官职要到慈禧前谢恩，也即二品以上官员必须通过慈禧才能任命。这“三斧子”砍得光绪垂头丧气。所以到二十八日张元济被接见时觉得光绪虽胸有成竹“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

张元济是被单独接见的。他们君臣谈话的内容极一般。光绪从徐致靖的保荐奏摺上知道张元济办有通艺学堂，一般地问了通艺的情况，勉励通艺同学好好地学，将来能为国家出些力。询问通艺有无铁路课程。光绪近年来也看些新科书籍，对于改革等已有所考虑，所以对话中张元济觉得光绪已胸有

成竹。因为有守旧势力的阻挠，所以张元济对光绪“首请坚定立志，勿淆异说。”此外，张建议多培养合格的使领人员，“如公使领事均能得人，外交必能逐渐起色。”

此后的日子里便是包括维新人士在内纷纷上书言事，光绪不断下诏改革。上书言事似乎成了时髦，什么奇奇怪怪的救国仙丹妙药都有。光绪虽陆续下了六七十道命令，但都停留在纸上，根本没有人去办理。这种“维新”，对于办事认真的张元济看来简直是儿戏，大失所望。他在给沈曾植的信里说“所谓新者，亦不过一纸诏书而已，”觉得其中问题不少。而且很多好建议经大臣们一议也面目全非。六月初九日，他给至友汪康年的信里流露出自己的担忧，说变法“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张元济在维新一个半月的时候就冷静地看到不久就要到来的反动。

康有为和张元济是同日先后被光绪接见的。康有为被接见后“热度”升高到沸点以上，一百天不到上了几十个摺，还代很多其他趋新的官员起草奏摺，一条条建议直奔光绪那儿。光绪让他到上海督办《时务报》，他都不去。有几个人看到形势不大

好，建议他先缓缓再上书，到广东办学，等有一批干部后再鼓吹变法，康有为当然听不进去。同样主张变法的张元济却是个极慎重的人，他以康有为相反的"温度"去观察。同往常一样，他按时到总理衙门值班，到通艺学堂学英文，读新书新报。他如此冷静和预见，除了他慎重和办事认真的性格外，还与李鸿章以微妙的方式向他"打招呼"有关系。李鸿章是总理衙门大臣，是张的上司。他在张元济被接见的第二天，问张知不知道翁同龢刚被斥逐的事。翁同龢这么大一个人物被光绪"斥逐"，在北京官场中谁会不知道，李鸿章的问，无非是告诉张要注意。所以张后来说，当时就觉得时局会有重大变化。李鸿章是"后党"，又是洋务派头子，老奸巨滑，甲午战争时受帝党和维新人士弹劾。帝党支持、组织强学会，独独拒绝李鸿章捐款，李非常愤懑，授意他的亲家、御史杨崇伊设法处置。杨弹劾强学会和文廷式，前者封禁后者革职。戊戌变法后暂时沉默，礼部六堂官革职后，八月初三上书慈禧，请"即日训政，以遏乱萌，"初六日政变。人都说整个变法期间李鸿章以两面手法，表面不予介入而指使杨崇伊相机阻遏。

张元济在光绪召见后一个半月中觉得"天心虽

转，时尚未来”，与朋辈们的书信往来相对减少，更没有任何明显的活动。孙家鼐受命管学大臣，奏准派他为京师大学堂总办。他“因其所用之人多非同志，极力辞退。”之后，他做了两件事：

六月十八日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沈曾植，沈当时应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武昌两湖书院史席。信中希望沈曾植能鼓动张之洞，在他势力所及推行光绪所颁布各项新政，还希望沈曾植抱病去长沙，设法调解湖南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

他对张之洞一直抱有幻想。早在一八九七年三月，他与汪康年有过一个乌托邦式的计划，研究计划的时候觉得十八行省督抚中张之洞最能接受、推行新东西。现在沈曾植在张之洞身边，更觉得他是唯一可以被鼓动推行光绪所颁新政的理想人物。

另一件事就是在七月二十日上书光绪言事。这是一件难以理解其动机的事。

在四月底他就知道变法的局面要有变动。在六月初九给汪康年、十八日给沈曾植的信里他从五十天来的光绪下的变法命令“上以是施，下不以是应，可为痛哭”中得出结论，变法“时尚未来”，还不成熟。从守旧人物的抵制中感觉到他们的反动

早晚要表现出来。六月中旬，后党阴谋日益显露，反对新政的人越来越多，七月初，光绪命各省广设学堂，张元济劝康有为乘机出京办学，回籍韬晦，免犯众怒，建议他到广东后专办学堂，等风气大开，人才众多的时候变法就不难了。他本来无意于上书言事，如果热衷于上书，四月二十八日被接见后就可以在谢恩摺里大书一通，而不必拖到七月二十日，已看到毫无希望并有“回力”的时候上书。他的动机实在是个谜。

他上的摺子的摘由叫《敬谢天恩、痛陈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摺》，共四十条。归纳总纲成五条：一、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二、融满汉之见，三、通上下之情，四、定用人之格，五、善理财之策。八月三日他又上一个摺子，建议新政衙门的编制不要以被裁旧衙门人员充任。这两个摺子的全文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已全文收录，这里不再引用。我们感觉到的是这五纲四十条并不是他上摺子的中心所在。因为其中很多条光绪早就下令改革或措置，如保荐人才（四月二十三日光绪令，下同），振兴工艺给奖章程（五月二十五日），等等。有的康有为、阔普通武、王锡藩等早已上书，都知道光绪确实支持的。他七月二十

日奏摺的中心是指出变法要“统筹全局”，不能毫无步骤，东一杠子西一鎚子。一是变法各事不能交守旧大臣去议处，他们一议不是否定就是弄得面目全非。

这个他有经验，在光绪交廷臣议处康有为为开制度局的建议时，廷臣一再否定、推诿。六月初他找李鸿章和廖寿桓建议一个有制度局之实而无其名的过渡办法，他们也觉得很可以，结果大臣们议出来一个路矿总局，完全不是他原来的意思。

所以张元济建议光绪，臣民提出的变法各事只能由“宸衷独断，勿交廷臣核议，以免阻格”。张元济强调的这两者是切中当时变法要害问题的。但他更清楚当时的根本问题是光绪下了令没有人听。

他在六月初预感的“回力”终于来了：八月六日政变发生，慈禧再出训政，六君子殉难，徐致靖等入狱，康梁出逃。

八月八日他写信给汪康年，建议尽早结束《昌言报》，怕镇压波及上海，并勉励不要气馁，说“事变之来，且更有不可意想者，自来变法莫不如是，惟望新党勿为所摇夺耳。”他自己亦有所精神准备，怕在家里被捕惊动他母亲，天天早出晚归到

总理衙门上班。

他母亲原在海盐，一八九四年他改用刑部主事后接到北京奉养。

八月二十三日他受革职永不叙用处分。

张元济是维新人士，和康有为同日被光绪召见，和梁启超关系极好，但并非康梁一党。他并不崇拜康有为，在戊戌三月底康有为发起保国会，张元济就认为“其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其如何办法，其势不可告人。”他同汪康年讲，康有为对维新开风气之功不可抹杀；但人品，他认为“康固非平正人”。而张元济是崇尚实干，崇尚效率，办事切实的人。

张元济在一八九六年就努力探索实行改革的着手处他认为就是培养人才。三月他与汪康年的讨论中也认为培养人才和找到同志是“吾辈今日所当办之事。”提出“此时急务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其次即为培植人材”，要汪康年以《时务报》为基地，在来访者和投稿者中发现同志，“加意牢笼，毋使倦懈。始则观听系焉，继则臭味洽焉，终且为我所用矣。”他办通艺学堂困难重重而竭全力维持就是这个意思。《时务报》是当时鼓动人心的重要机关，他极力支持，刺探、透露外交消息、代

为发行刊物，调解梁启超和汪康年之间的矛盾，做了很多工作。他和梁的关系正是佩服梁在《时务报》的鼓动人心，而实非一党。

本章主要引用材料

《张元济书札·致汪康年，致梁启超》
《张元济日记·一九二〇年部分》
张元济：《送简墀入滇序》
张元济致沈曾植信（1898年）
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
张元济《追述戊戌政变杂咏》
张元济：《挽唐文治诗》
《汪康年昌言报启事》
《通艺学堂章程》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光绪朝东华录·光二十四年》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
钱仲联：《文廷式年谱》
《翁同龢日记·甲午年》

三

在南洋公学译书院

八月二十三日清廷处分王锡蕃、李岳瑞、张元济革职永不叙用。他结束了通艺学堂，将它移交京师大学堂后就离京南下。

张元济一九五二年《追述戊戌政变杂咏·序》说，他往见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桓。廖告诉他，当时他正在军机值班，研究处分王锡蕃、李岳瑞后，光绪“特谕枢臣，张某亦尝上书妄图国事，应并案办理。盖隐有保全之意。余封奏语涉狂妄，设有人弹劾，必膺严谴。”

在临走前，李鸿章派于式枚去慰问，问他作何打算。张元济告诉他想到上海谋生。几天后于式枚通知他说，“你可先到上海，李中堂已经招呼盛宣怀

替你找事情。”李鸿章当时是洋务派首领，戊戌变法没有触及洋务问题，他对变法采取的态度前面已讲过，但在明处对维新派人有敷衍。

九月底张元济到上海，盛宣怀就派人接他，并建议他去南洋公学筹备译书院。盛宣怀是洋务派中坚，李鸿章在交通方面的“人物”，买办官僚，当时是“办理轮船电线（电报）事务大臣”，经理招商局（航运）和电报局。南洋公学是他提出办理的，经费由招商电报两局拨付，所以他是南洋公学督办。

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的前身，成立于一八九七年，当时计划设上院（大学部）、中院（中学部）、师院（师范）和外院（小学）以及译书院。除译书院外其当时都已成立。

张元济熟悉西学，懂得英文，办事认真，是筹备译书院的理想人物。他一向重视翻译西书，《时务报》筹备的时候他就建议汪康年尽可能多译西书。他把译书看作“鼓动人心”、“培植人材”的重要手段，现在能亲自进行这项工作当然是愿意的。从此，他和出版结下了不解缘，开始了长达六十年的出版生涯。

清代到同治、光绪年间，有墨海书馆、广学

会、江南制造局、格致书院、同文馆等所译西书盛行于世。同光年间洋务运动的时候，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方，仅仅是武器不如人家而已，当时所译书籍多是有关制造船舰、兵器和它的基础理论即物理、化学、数学书籍。广学会等教会组织的书除宣传教义外，多医学书。当时有这样的说法："教会之书多医家言，局译之书多兵家言。"甲午以后，较多的人懂得岂止是兵甲落后，翻译书籍遂多法制、史书，以求借鉴。甲午以后翻译已不仅是官书局进行，私人也从事这项工作，如董康、赵之益招股组织译书公会于上海，出版历史书籍。到十九世纪末，我国翻译外国书籍已近千种，但都系各个具体问题，资产阶级的理论著作还没有人翻译。

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著作被介绍进我国是从严复开始的。严复从船政学校毕业后派赴英国海军学校学习战术和炮台等学问，回国后在海军学堂当教习。他的知名不在于军事教育而在于翻译。他在甲午战争后就主张变法，指出"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一八九五年翻译赫胥黎《天演论》。一八九七年他与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出版《国闻报》，附刊《国闻汇报》，译载外国重要政事及名著，《天演论》的译文就在汇报上按期发表。他以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论点，以按语的形式号召人们救亡图存，对当时思想界起着振聋启聩的作用；他提出的"保种、保群、自强进化之公理"给悲观失望的人士指出希望和道路。这不仅在维新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直到"五四"前，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代人仍然身受其赐。戊戌政变后政局更加昏沉，他觉得干什么都于世无补，保守革新都无不可，唯有启发民智最重要，只要"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黄炎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得有复苏之一日。"基于这种认识，戊戌政变后他"欲一志译书"，"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得。"

张元济和严复有着较深的事业上的交往。他办通艺学堂得到严复支持不少，不久前被革职离京南下，途经天津时两人还见面叙谈，严复亲往码头送别。张元济筹备译书院，在一八九九年二月十三和十八两日接连给天津的严复去信，讨教译书院的问题。希望他能在选题上提供意见，希望在译手组织上出些主意，还提出请严复去南洋公学译书院任总校，并告诉他准备出版他以前翻译的宓克著《教案论》。

宓克，又名立嘉、米嘉，Alexader Michie（1833—1902）英国人，一八五三年来华在上海

经商。一八八三年迁天津，任天津英文《时报》(The Chinese Times)总编辑，并任李鸿章顾问。《支那教案论》是他所著的一本小册子，一八九二年李鸿章命严复翻译。译本当时未出版，有抄本流传，一八九九年南洋公学译书院据传抄本排印出版。该书对当时外人有关教案的反华议论持不同意见，斥责外国人有不是之处。严复在一九〇一年说，“此老年七十余，于中国绝爱护之。近著《中英交涉录》，大躁一时，诋諆列强，其言极刻酷。”

从保存至今的严复给张元济的复信中可以看出，经过戊戌政变，严复已灰心仕途，想一心译书，做一些基本的理论建设工作，因而给他出了一些主意。但在翻译组织工作上，两人的主张是极不相同的，严复是想凭借译品“以垂久远”的，所以提出要象隋唐译经那样进行组织。当时一般翻译水平和他对译书要求之间的差距太大，所以他不愿到译书院任总校。但他表示极想到译书院去译书，如果能给他一个洋人一样的薪水待遇的话。这件事可能因为盛宣怀没有同意而无下文。但是严复与张元济进行了另一项合作——译书院出版了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

因的研究》。

严复的翻译不仅水平高，而且在选题上下功夫。他翻译的名著一共只有八本，而且其中只有四本是全译本。但这几本书的影响远胜于当时翻译书的总和。他带给中国人以一种新的世界观，起了空前广泛和长远的作用。那时一般翻译过来的西学著述，偏重于个别问题，尽管也是和封建文化相对立的，但总不如理论著作那么成为向封建文化轰击的"重炮"。康有为尽管力图将他的学说理论化，但还没有摆脱经学形式的束缚。而严复的翻译"为先进的中国人反对封建的斗争提供了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的理论武器。"

严复不仅翻译理论著作，还注意理论的各个领域，他的选题是经过反复考虑确定的，力图适合需要，而起更大作用。《天演论》的影响大家是极熟悉的。

一八九九年严复正在译亚当·斯密《原富》，译毕《原富》已经是二十世纪了。斯密的著作是十八世纪的，一百多年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已有极大的变化；而且已经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严复翻译这样一本旧书有什么意义呢？他说这本书"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

其后而鞭之。”书中作者以历史事实指出，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国家政权对经济生活不干涉政策，即自由经济政策。我们可以看出斯密的书对改变当时中国经济政策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后来他译J·密尔《论自由》，改名《群己权界论》。从改名就可以知道他翻译这本书的用意是在于使人正确地理解自由的全部内容。

严复的译著从《原富》开始，除了《穆勒名学》和斯宾塞《群学肄言》早就拿了人家的钱以外，都由张元济为之组织出版，支付远远高于当时一般的稿酬，张元济支持了严复的翻译。

当时一般译稿约千字二元。严复《原富》十五万字，南洋公学支付买稿费二千元，再给印数百分之二十的版税。从1903年出《社会通诠》，商务开始按书价40%付版税，中国没有第二个人，他也没有在第二个地方拿过如此高的版税。严复自己讲，他的生活费用很高，必须有足以维持的收入才能安心译书。而当时除了张元济外，公、私都没有人愿意付给他高稿费。所以我们在评论严复翻译的历史意义时，不能忘掉出版家的作用。

一九〇一年初张元济接任南洋公学总理。

一九六〇年六月平海澜回忆当年南洋公学：“后来何梅笙故世了，接手的就是张元济先生。张先生励精图治，真好。他是非常爱研究学问，勉励学生读新书的。譬如本来我们是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御批通鉴辑览》等旧书的，他改掉了，教我们读严复的《原富》。……他那时候就有个新作风，就是找一个一个学生去见他，去谈。……足见他是很讲维新的。他晚上常拿了一盏油灯，四处去看看。”

二月，南洋公学开办经济特班，招收有一定学养而愿学西学的人入学，学习英语和政法、经济、伦理等功课。其用意原在改造原有读经书的学生能从事实务。张元济聘请蔡元培为特班总教习，聘请赵从藩为特班学监。

蔡元培，浙江绍兴人，与张元济同科成为进士，都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时他被授职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时开始猎涉西学书报，留意世界。戊戌政变后觉得清朝统治者已“无可希望”，不可与图治，请长假南下从事教育。张元济和蔡元培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赵从藩，江西南丰人，甲午恩科进士。京师大学堂初建时主持过建校事务，和张元济原无瓜

葛。因为土建招标时拒绝接受贿赂得罪恶势力，反被御史弹劾"贪污"。张元济听说后在上海利用报纸揭露了事情真相，使他解脱。

四月，张元济向盛宣怀提出辞职。七月，由劳乃宣接任。从和严复的往来信件中看，七月他仅仅卸掉了南洋公学总理的职务；译书院长的职务约在当年年尾《原富》全部出版以后才辞掉。

张元济辞职的原因恐怕有两个，一个是他的教育思想有变化，我们在下一章里谈，另一个原因是"与同事洋友殊难得调"——没法共事。这个"洋友"就是所谓"中国通"的美国人福开森。

福开森（1866——1944，John Calvin Ferge-son），一八八八年来华任南京汇文书院（即后来的金陵大学）院长。一八九七年盛宣怀办南洋公学，聘他为监院。监院并非校长，但他在南洋公学以"主人"自居，极为跋扈。张元济是位爱国者，自然很难和他"和平共处"。有三个材料可以概见一斑：

平海澜："福开森那时是监院，同张先生不大对头。监院其实不是校长，而他在自己的信纸上就写President，President就是校长了。就从这一种神气也可以看到他的野心了。总之他处处

都要管。学生替张先生抱不平，反抗外国人，所以就有一个学生被外国人开除。外国人开除了他，张先生就暗地把他送到东洋去。……后来张先生受了福开森的欺负，退出了。”

严复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五日致张元济信：“今日时事无往而不与〔南洋〕公学相同。无所立事，则亦已矣，苟有所立，必有异类横亘其间……。今夫矿、路、船、电诸公司，借助洋财者，犹可言也，至于学堂，又何取乎？瞶瞶者以为必洋人乃知办此，不知教中国少年以西学，其门径与西人从事西学者霄壤迥殊。故近日所成之材，其病有二：为西人培其羽翼，一也；否则，所学非所用，知者屠龙之技，而当务之急反茫然。至于学本易而故难之，事在近而故远之，尤其常遇不一遇者矣。”

张元济一九〇一年底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中提出，办学“最要办法”是“勿以外人主持学事。尝闻美国人言，中国财政之权在英，军事之权在德，教育之权吾美人其勿失之。斯言之可畏也。国家之气恃教育以维系之，此为何事，岂可授之外人者。……彼见吾国人之中无所主也，乃阴使其攫窃之计：不肖者肥其囊橐，行黠

者植其羽翼，而学堂人才遂不复为中国有矣。”

这三条材料，两条是当年的笔录。其中张元济论学校书正是与福开森等洋人直接接触后的血泪之言。张元济在一九四九年的回忆里也说：“当时南洋公学的监督是美国人福开森，我和他意见不合，只干了几个月就辞职了。”

一九七三年王云五著《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说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与该校西文总教习之美国福开森博士相处甚善，互相交换语言之教学，于是原通中国语之福开森君进而通达中国文字，原未习英文之张君，因是亦能通英文。”此说毫无根据。本书第三章中谈健社和通艺学堂教学英文事，都根据张元济当年致汪康年信及其他文字材料。政变后至上海，张元济继续学英语。庚子义和团运动开始，严复避居上海，介绍在上海行医的爱尔兰医师柯师（Staford Cox）与张元济相识，此后即以朋友身份往来，学习英语口语。马叙伦在一九五六年十月说：“伦于清光绪二十七八年间至上海佐赵彝初先生治《选报》，时温宗尧先生于同宅中设英文学习班，丈（张元济）就学焉，每晨八时准至，伦每晨遇之楼际。”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勃起，义和团进北京，天津。接着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廷向各帝国主义屈膝求和。两广总督李鸿章受命从广东北上议和。李途经上海略有停留。张元济曾经去拜访过，谈话中建议李鸿章不必再为清廷效命。

> 张元济的回忆这样说："八国联军陷北京，西太后和光绪避难到西安，一面叫李鸿章北上议和。李经过上海时，我去见他，劝他不必再替清廷效力了。他对我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呀？'又说：'我这条老命还拼得过。'"

庚子八国联军侵华，次年七月二十三日清廷与英、美、俄、德、日等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条约除"赔款"四万万两白银外，还规定北京至海通道各处和大沽禁止设立中国炮台，而外国军队可驻扎北京和北京到山海关沿线十二个重要地区。仅这一条就可以看出辛丑条约标志我国进一步殖民地化，帝国主义加深了对我国的控制。

张元济这时集合同志创办了《外交报》。《外交报》的宗旨是"欲使内地人士周知四国，捐除锁港之见，免受物竞之惨"（癸卯第三期报告白）。这个宗旨是针对庚子之役清廷的盲目排外政策的。它的创刊《叙例》中提出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文

明排外”，指出外国人欺侮我们无非是他强我弱；盲目排外并不能真正排斥外国，文明排外才能做到这一点。文明排外有两点。一是愤发自强，象日本那样，强大了，西方国家再不敢欺侮了。二是了解外国，知己知彼，从中找出与之斗争的办法。所以这个刊物本来准备叫《尊闻》。

《外交报》的另一位发起人蔡元培曾经对特班学生说："现在中国被各国欺侮到这地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要知道自己弱点，还要了解国际情况。"

刊物名为外交，其实并不是研究外交事务的，而是我国最早介绍各国动态的国际知识专业刊物。它从辛丑年底，合阳历已是一九〇二年一月创刊，到庚戌年终刊，历时十年，是个有影响的刊物，对于了解各国状态颇有价值。

《外交报》是张元济集资创办的，但是因为一直由商务印书馆代印，商务印书馆先是经销，不久总经销，所以历来都认为是商务印书馆的刊物。

《清季重要报刊目录》："《外交报》，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杂志最早的一种。月刊，内容分论说、文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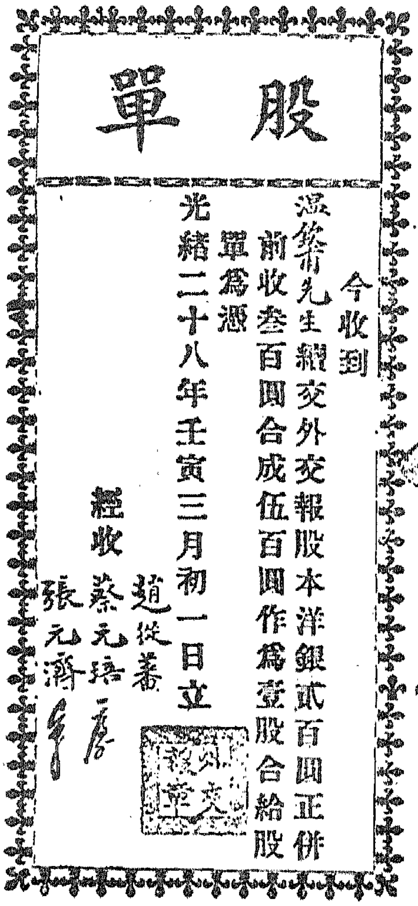
张静庐《出版大事年表》："一九〇一年商

务书馆创刊《外交报》(月刊)，由张元济主编。”

商务印书馆历次大事记也都认为商务所办，至于文章如此讲的就更多。

也有说《外交报》是商务创刊而“先以普通学书室名义出版”的。

普通学书室确实是个存在过的机构，在上海五马路同芳居后背，由蔡元培的同乡杜亚泉所办。它是一个独立的学馆，招收学生教授数理化，还出版一些书籍，还办有一个杂志《普通学报》。在其第二期杂志上有一幅《外交报》的广告（见下页）。



股單

今收到
溼蓀先生繳交外交報股本洋銀貳百圓正併
前收叁百圓合成伍百圓作爲壹股合給股
單爲憑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三月初一日立
經收 趙從蕃 蔡元培 張元濟

《外文报》股票

合资的本埠士绅是谁呢？一九八二年找到了一部分股单、章程和《外交报社庚戌年结账清单》，加上原有的一部分材料，已大略知道外交报的出资

外交报（每月三册）原拟名尊闻

此报系本埠士绅合资编印现暂托普通学书室发行

《外交报》广告

人。从外交报章程和庚戌结账清单证明，《外交报》是独立的机构，商务仅是投资者之一而已。

股金共四千四百元，共九股，每股五百元（当有一股不足）。张元济两股，股单号第四、第九。蔡元培和杜亚泉合一股，股单二号（据蔡元培《杂记》手稿，蔡认三百元，杜亚泉当为二百元）。温宗尧一股，股单第一号。商务印书馆一股，据商务印书馆早年结彩清册有投资记载。另有徐珂、沈幼珊、赵从藩、王耕三，入股数不详。经手收集股款的有张元济、蔡元培、赵从藩的共同签字，他们都是南洋公学成员。股单分两次收款，第二次壬寅三月，赵从藩都未签字，疑已离上海。蔡元培热心于中国教育会、爱国女学、爱国公会、对俄同志会、光复会和同盟会，嗣又去德国，殊难顾及《外交报》事务。张元济戊戌后矢志出版事业，《外交报》支柱实系张先生。

从《外交报社庚戌年结账清单》中可以看出，《外交报》办了十年而于庚戌即一九一〇年底停刊，是因为它同解放前其他经济独立刊物一样，每期总有一些卖剩的刊物，每年总有一些收不回的代销刊物的账，日积月累整个资金全成为剩刊和呆账，无法周转。

本章主要引用材料

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
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
严复致张元济信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政治史》
包遵信：《中国近代一位感觉锐敏的人》
《学府纪闻·国立交通大学·校史记年》，台北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
《外交报史料》
黄炎培：《八十年来》
《辛亥革命回忆录》卷四
赵世暹：《记张老伯二三事》

四

他的教育思想和加入商务印书馆

一九〇一年张元济交卸南洋公学总理的时候他已经加入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是一八九七年年初在上海开张的一家小印刷厂。它最初的投资人共七户，都是基督徒，大部分是清心书院的学生。

清心书院是美国教会长老会在上海办的学校。当时风气，因为教会学校教的课程不能应科举考试，一般人不愿去教会学校读书。因而教会学校不仅免收学费，还略有津贴，吸引清寒子弟。清心书院实行半工半读，附设印刷工厂，叫清心书馆，学生可以学到一技之长。清心书院有姊妹组织清心

堂，是长老会的礼拜堂。清心堂有鲍牧师，名哲才，字华甫，浙江鄞县人。他有三子三女，前后都在清心书院读书。老大鲍咸恩，老二鲍咸昌；老三是女儿，嫁清心书院同学张桂华；老四是女儿，嫁清心同学夏瑞芳，

鲍咸昌毕业后在美华书馆当英文排字工人。鲍咸恩和夏瑞芳在英文《捷报》馆(China Gazette)排字。因为捷报馆经理英国人奥夏（O'Shea）对待工人粗暴，鲍咸恩和夏瑞芳两人内心极为痛苦，想脱离捷报馆而自办印刷厂。经过框算后觉得可以维持，鲍咸昌和张桂华也同意他们的打算。他们郎舅四人，还有咸昌岳母家郁家和美华书馆高凤池（也是清心书院同学，都是少年知己）的参加。他们六户共集资二千七百五十元。又由张桂华找他在电报局的同事沈伯曾投资一千元，这才买机器设备、材料，租房，前后筹备了近一年开张。

这七户都是基督教徒。除沈伯曾是天主教外，其他都是新教长老会清心堂教友。除郁家外，鲍、鲍、张、夏、高五人都是清心书院同学。除高凤池外，鲍、张、夏、郁都是弟兄和姻弟兄。沈伯曾一千元几乎是借款性质，对事情不甚顾问，下余六户同信仰、同宗派、同学、亲戚，意见极易一致。他们

中间夏瑞芳行次最小，但在事业上他是中心人物，因为他最能干。

当时正是戊戌前后，新书新报很多，刚“回娘家”的机器印刷业得到发展，这是一个客观的有利条件。但商务印书馆异于其他印刷厂的成就，原因在于他们对技术的精益求精。

实滕惠秀：“《昌言报》开始三期印刷完全和《时务报》时代一样，而到第四期突然面目一变，三号铅字成为四号铅字，并且比之过去给人一种鲜明的感觉。因为铅字好了。仔细观察，从这一号目录的旁边有‘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字样。”

杜亚泉《鲍咸昌先生事略》：“维新同志皆以编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时上海各印刷业，皆滥恶相沿，无可与谋者，于是咸踵于商务印书馆。”石印“本甚明了，但现今石印局中不甚考究，故石印之书不及铅印者可贵”（杜亚泉《文学初阶》卷五之三十七）。严复译《原富》，清稿后请著名写手李嘉璧工楷书写，严复觉得“简靖朴穆，异于世俗书摺卷者，即此上石固甚不恶”。张元济觉得石印局中不甚讲究而改由商务印书馆排印。

杜亚泉一九〇〇年初因为守旧派排挤，愤而和

蔡元培一起离开绍兴中西书院，到上海办亚泉书馆，后改组为普通学书室。他编刊物《亚泉杂志》和《普通学报》，出版《支那文明史》、《定性分析》、《露漱格兰小传》等书籍。这些书刊除《普通学报》用石印外，其他都请商务代印。可见他说的“上海各印刷业，皆滥恶相沿”是真实的。1901年商务代印的严译《原富》，和1902年其他印刷厂代印的《原富》一比较，尽管字大小一样，字体差不多，也会看出排印质量的高低粗细。

杜亚泉讲商务的质量吸引了维新同志，其中包括张元济。如果说远在日本的实藤惠秀都发现了《昌言报》的印刷质量变化，那么当年作为该报编者汪康年至友的张元济，每期都读，岂有不注意到的。到上海办译书院，自然会找商务代印。译书院在张元济任内一起只出了严复译的两本书，都是商务代印。在一年多的业务往来中，张元济和夏瑞芳互相了解，以致在一起工作。

从张元济参加商务印书馆到它公私合营以前，社会上认为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那是一点不夸张的。他加入商务后，六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为商务操心。把商务从无到有办得有声有色的是夏瑞芳。把商务从一个规模不大的印刷厂发展为解放

前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或者说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这和张元济的思想和活动是分不开的。因而探索他加入商务的动机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

有一则海外学者也都引用的传说。大意是夏瑞芳因印刷业务和张元济认识。商务自从出版《华英初阶》尝到出版的甜头后，迎合潮流，“请托王慕陶、戚元丞两人购买译稿，怎知这两个大坏蛋约了几个略通日文的人，随便选定几种日本书交给他们翻译。……造好之后以千字二元的代价卖给夏瑞芳。……出版后无人过问，心知有异。就请张菊生看看那些译稿和已出版的书籍。张把原文和译文一对之后，觉得非常骇异”（香港《大成》杂志105期），“于是请南洋公学译书院代为改译，很久都未完成”（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2辑）。还有具体数目：“当时商务印出的新书，质量不高，无人购买，亏本将近万元”（《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三十年代时蒋维乔也这么说）。有人指出当时商务“财务周转亦渐感困难，乃增招外股，以资应付”（台湾《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还有具体书名：《日本法规大全》（上述新教育年谱和日本泽本郁马文章）。说，夏因而想邀

请张主持编译，“张戏言，公学月俸三百五十元，商务请得起吗，夏一口答应，张无言以对”（《文化史料》第二辑）。于是“三百五十元”就成为杠杆上的一个力点，把南洋公学的总理兼译书院长搬到了一个当时还是小小的商务印书馆。有人据此说“元济以股东兼为编辑部长，实质大事皆由其主政，家亦因以饶裕”（费行简《当代名人小传》）。这是在海内外流传五十多年的传说，经常见诸于文字的。不同之处是有的说不是买翻译稿，而花两百元钱买了一部教科书稿子。有的说夏瑞芳不敢请张元济，请他介绍。张荐爱国学社蔡元培，蔡兼编译所长，《苏报》案后张自代。有的文章事事语气肯定，有的文章语气含糊。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没有拿出具体材料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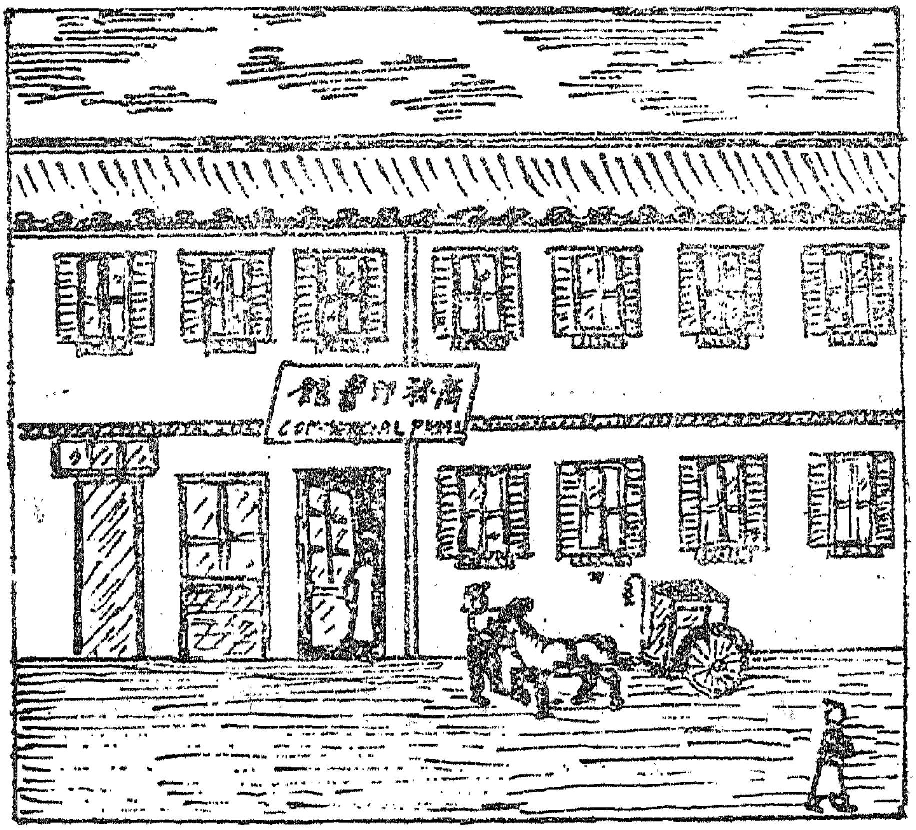
上面这几则传说作为历史，至少和张夏两人的思想、抱负、性格是矛盾的。

有些事实是应该注意的：

张元济是个极淡泊而固执的人，说钱能左右他，那是对他根本不了解。

他说：“鄙人于丙午复职以后，始终未入宦途，……若欲得钱，则取不义之财孰有如做官之便者。”（《民立报》辛亥年十月十八日）。我

们在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每年自己所得花红，自己规定要低于其他高级职员。



1900年商务印书馆在北京路时。此时张元济与商务发生关系，次年加入商务。商务北京路房屋图景久已失传，这是最近根据可靠资料的复原图。

张元济加入商务时间上是和辞南洋公学职务相联系的。他辞职除了无法和福开森相处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教育思想的变化。

维新人士所追求的是“民智大开”，但是相当长时间里，无一例外地他们始终热衷于办“英才教

育”。张元济从办通艺学堂开始一直到办南洋公学特班，概括起来也可以称为办英才教育。通艺四十多人、特班四十四人。花那么多钱，那么多时间，“四万万同胞”要哪年哪月才能“民智大开”！而且能出多少人才都是疑问。学出了以后也有一个按现在的说法叫为谁服务的问题。如戊戌六君子临刑时，通艺学生有面有喜色者。当时他说真不识此人是何居心。又如严复信中同他讲的，洋人办学，教出学生要就是为洋人所用，要就是学的并不切合中国实际。严复显然把话说得太绝对了，但这两个问题是确实存在的，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时也会觉察到。当时正是庚子之后，也应适当考虑义和团运动所给予一般人的影响。

一九〇二年一月张元济发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他写作和有此思想当在一九〇一年），详细表述了他的教育观点，极有见地，也是我们了解张元济的入手处。他提出办学的第一条宗旨是“勿存培植人才之见”，并不是不要培养高级人才，而是说如果“念念在育才，则所操者狭而所及者浅”。他说西方几乎人人上学，但并非人人都成人才，但每人应当懂的都懂，这就是“民智大开”，事情就好办。他提出要做到“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

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必重普通而不可言专门，则必先初级而不可亟高等，”提出了“设学堂当使人明白为第一义”。这个思想比历来主张新学的人是一个大进步，提出了教育普及问题。可贵之处还在于马上身体力行。在一九〇一年八月清廷虽然下令命各省办学，将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他们的学堂概念和原来的县考、乡试、会试并无本质差别。命令里讲得清楚，教学内容仍然以四书五经为主，教学的目的仍然是“学而优则仕”。张元济的“无良无贱”，“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才能使人民的素质提高。他已经提出了读书不是为做官，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上海这个新兴的工商城市和北京不同，他在上海两三年，会觉得普及教育和国家发达的密切关系。至少他会接触到一个排字工人都要有相当文化，而刻木刻书的工人不必识字。

他还针对当时办教育的人以洋人为师，提出了另一个宗旨：“勿标讲求西学之名”，反对教育上的全盘西化，指出各国都“各有其独立之道”，我们文化悠久，虽然落后，“亦自有其不可不学之事”，要为中国而学，不要为外国学。但是，他说“又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所认为正确的是

“意欲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宗教、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

既然主张“勿标西学之名”，又要“扫腐儒之陈说”，所以他提出要杜绝当时的两种通病，一是滥读四书五经，一是用洋人课本。当时当然不能公开反对四书五经，他提出不应用四书五经做启蒙读物，《论语》、《孟子》只宜中学，“其他诸经必列专门”。这就大大限制了四书五经的活动地盘。

他的这个思想一直没有变化。一九四九年他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人提出读经，他马上反对，指出：“此难施诸大众，将来大学不妨别立专科，听人研究。”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外国教会多设立学堂作为传教手段之一。一八七六年教会决定组织委员会编教科书，供教会学校用，前后编有英语、算学、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科目。他们还将这些从西方利益出发的课本大肆赠送，在教会学校外也有人用。临十九世纪末，中国人自己编的课本虽然已经问世，但因为教会课本免费赠送，仍有很大市场。张元济说“华文教科书各教会学堂所刊者，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亦取径迥别，与中学绝无关系。”

即使英语课本，他也主张“宜自编纂”。教科书必须是中国人自己的领域。“最上，速自编译；其次则集通儒取旧有各本详加改订，虽未必佳，而流弊要少矣。”这个思想贯穿于商务的出版物。

文章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主张，如前面已经提过的办学权不能操在洋人手里。而中心是教育要普及；教育权要掌握在中国人手里；要为中国办教育，所以那些宣扬基督教教义的课本不能用，四书五经不宜作课本；要取西方的各种学术和我国的民质、习俗、宗教、政体等结合起来编新的课本。

他的教育思想的大转变，必然导致他的活动的变化。他是言必行，行必果的。如何来推进普及教育，由谁来编辑适合国情的普及教育所需的课本？他选择了办出版。

研究张元济进入商务，并且以出版事业为他的终身活动，总应该寻找思想上的原因，而不宜停留在夏瑞芳有魄力，肯出三百五十元薪水之类传说上。因为这个传说即使真有其事，也推导不出他终身从事出版事业的结论。有一件材料是我们极不能忽视的：

严复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给张元济的信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此时外间欲办报馆、译局者

甚多，……而昨得公来书，亦云拟于海上集鉅股为此。”他准备集股办出版——当时报馆、译局就指出版。另，商务印书馆历次大事记都记“一九〇一年张菊生印锡章二君加入本馆为股东。”严复的信证明是张元济要办出版，至少证明张元济，夏瑞芳在事业上的结合的主导方是张而不是夏。我们也不能忘记那是一个封建等级社会，张元济和夏瑞芳之间有着很大的等级差别，夏是不能贸然开这个口的。

张元济加入商务，从投资讲，时间约在一九〇一年四月至八月间。九月二日严复有信给张元济，附去他为商务将出版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作的序。这本词典有严复和辜鸿铭两人序和盛宣怀题词，当是张元济作为商务一员后向他们求的。

后来在一九一七年或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日张元济有信给蔡元培，说：“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编号：B8）。张元济在九十寿辰时写有一组告别亲友诗，其中《告别商务印书馆同人》诗里有“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句。

上述五件当时的文字材料在张元济加入商务的

动机上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出版事业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这是他辞南洋公学总理职务而到商务的事业思想基础。

因而五十年来的那宗“公案”——夏瑞芳买入质量低劣的书稿，才聘请张元济——基本上可以否定了。但是这宗“公案”影响太大了，有必要再费一些笔墨提供一些材料来弄清它。而且多少年来很多人虽然都说夏瑞芳买了大量日译汉坏稿子，却谁都没有指出过一本两本那卖不掉的书叫什么。《新教育年谱》中讲是《日本法规大全》，但它自己又以另一个材料否定了。

立论总要根据材料。现在已经找到相当一部分商务早年出版物和其他材料，基本上可以复原出一八九七至一九〇一年，即张元济没有加入商务前，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三年九月，即张元济加入商务后至中日合资前夕两份总书目和部分分年书目。

从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一年夏天张元济加入商务前，商务出版书籍约十六种，二十五册（不包括无版权畅销书，下同）。这些书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英语课本、读物、语法、词典。这些书的组稿方向与对象和夏瑞芳、鲍咸恩、高凤池他们的经历相符合。一九〇一年夏至一九〇三年九月两年间新

出的书籍约九十种，一百另二册。其中以教科书形式出版的十八种二十三册。另有编写的读物十一、二种，此外，都属于“西学”翻译书籍和外国史书籍，译自英文和日文；而两年间新出版的外语课本读物只有两种。前面我们已提到张元济是一九〇一年四月至八月间加入，即投资商务印书馆，而这种投资的目的不是为取得利润，而是为了普及教育，他必然要掌握商务的出书，使之能为他的普及教育目的相符合，这是毫无疑问的。商务在一九〇一年夏天以前三年时间出版的全是外语读物（十六种），而一九〇一年后到一九〇三年两年多一点时间这类书仅出版两种，而大量的是历史、政治、经济类的书，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出版方针的变化和张元济加入有关（另一个原因一九〇一年八月清廷宣布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

那种说“张把原文和〔夏瑞芳组译的〕译文一对之后，觉得非常骇异”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知道张元济只懂英文不懂日文，无法“一对之后”。当然可以转请别人，比如说请“译书院懂日文的人”。但是据我们所知，在张元济担任译书院长期间，译书院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更没有懂得日文的这类人材。

我国学习日文开始于一八九六年第一批留日学生。据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实藤惠秀讲，到一九〇一年才有第一批毕业生。在国内正规学习日文的，是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由他的《农学报》的日本翻译任教；其中学生如樊炳清、吴尔昌、王国维等虽可以胜任翻译，但都为罗振玉的《农学报》社和《教育世界》社工作。

南洋公学有日文，是一九〇一年八月以后，劳乃宣当总理的时候。有当时的一则消息记述了这件事：

一九〇一年九月底出版的《普通学报》第一期，《学务杂志》栏有南洋公学消息：

"九月二十日南洋公学招考东文生，以习法科。闻盛〔杏荪〕大臣有出资万金以译《日本法规大全》之意。……公学规模向不过西洋之初等教育，……今分其一部以施东洋之初等教育，不可谓非公学之进步矣。"

（十一月南洋公学东文学堂，或东文班成立，由罗振玉等办理。）

这则消息说明两个问题：一、在此之前南洋公学无日文，必不能以日文稿子请其加工。二、有说商务亏本是组译《日本法规大全》，这则消息也说

明了《日本法规大全》是盛宣怀出资。而且一九〇六年该书出版前，预订广告追述这部书的翻译情况，也谈到是由南洋公学出资。可见《新教育年谱》虽举了书名也不可靠。

至于说商务"亏本将近万元"，"财务周转亦感到困难，乃增招外股，以资应付"，更是缺少一种基本的计算。当时一般图书的成本不及售价的25%，一般"西学"书籍份量都不大。线装四十双页一本，成本五分，卖二三角钱。以成本一角一本计，一万元要合十万册书，以平均一千册一种计，合一百种；如果书的份量或印数加一倍，品种减少，也有五十种，怎么会书名都举不出呢？

商务印书馆在一九〇一年六月初五取得《华英音韵字典》的版权保护，并已在排印。这是一部在今天看来规模也不算小的、收词十万条的双解英华词典，大二十五开本，两千面，售价七元五角一部。这部词典的投产说明当时并无财政"周转困难"。

我们也知道张元济投资时，商务原有投资资财升值七倍。从一八九七年正月到一九〇一年夏，四年多些时间资财能增值七倍，不能说是一种亏蚀或"周转困难"的现象。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是要

利用这可以利用的现成机构和夏瑞芳等一批善于经营的人，来为他的理想服务。如果夏瑞芳是出一批书连连亏累的人，不论以何种形式张元济都不会和他合作，更不必说投资。

关于蔡元培当编译所长的事和戚元函，我们下一章谈。

我们把这五十年来的公案结束以后再回到一九〇一年。

张元济在戊戌年间开始原有“鼓动人心，培育人材”的思想，前面谈到了在一九〇一年间他对普及教育有更多的想法，而南洋公学或译书院是不足以实现他的想法的。他“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加入商务，商务的出书性质有了明显的变化。

戊戌变法前后，认为救国自强根本在于“民智大开”的人是极多的。但相当多的人无非人云亦云而已，既不清楚教育的真正作用，也不研究那一种教育才能有助于祖国的独立富强。至于行动，至多是不着边际的呼吁两声，或者慷慨激昂，或者感慨万千，实行的不多，研究的更属凤毛麟角。所以到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清廷公布办学章程，大多数人也就心满意足了。

张元济之值得称道，在于认识后就踏踏实实去

干，在干的过程中研究摸索：英才教育——普及教育——以出版推行教育。

本章主要引用材料

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
张元济致蔡元培信
实滕惠秀：《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日文本，1940年映雪书院
实滕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考》
杜亚泉：《鲍咸昌先生事略》
张元济：《赴会日记》
严复致张元济信
《外交报材料·庚戌年结账清单》
《商务印书馆早期书录》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摘要见《戊戌变法》四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
冯自由：《革命逸史》
《中外日报》1901——1903年

五

“开辟草莱的人”

张元济在一九〇一年夏投资商务印书馆后，就顾问业务。如为正在排印的《商务印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请严复、辜鸿铭两位英语高手作序。这部词典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英汉双解词典。他在筹备南洋公学译书院时就准备先翻译一部英语词典，向严复讨教该如何办法。严复是不主张用英汉词典的，他只许他的学生用原版词典。还说翻译词典“此事甚难，事烦而益寡”。但从广大初学习者和一般水平的人讲，英汉词典是必需的。在一九〇〇年商务印书馆即请上海企英译书院翻译英国布罗存德尔编的英语详解词典而成《商务印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

"企英译书院",有时叫"企英学馆",其实就是谢洪赉,当然并不排斥谢有翻译上的助手,是商务在张元济加入以前主要的,或说唯一的供稿者。

一九〇二年大约在一月,张元济就整日在商务办事,接着约请杜亚泉编辑一套《文学初阶》,是蒙学堂课本。当时,清廷于一九〇一年八月颁布了改书院为学堂,州县多设蒙学堂的规定。《文学初阶》计六卷,供学生三年之用。读毕转入小学,读《文学进阶》。第一二卷于一九〇二年六月出版。

《文学初阶》第一册有一个序言,述说基础教育的重要:"蒙学一事不但为学生一身德行之基础,实为全国人民盛衰文野之根源。"当时流行蒙学课本如南洋公学外院的《蒙学课本》,第一册前几课就教学生虚字。沈朵山编的澄衷学堂《字课图说》,简直就是订成本的方块字,而且它的注解以《尔雅》、《说文段注》等为准。如"椅"字,告诉学生:"树之梓实而桐皮者曰椅",取的是陆机《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的注。以远解近,把儿童身边常见的浅近事物解释得深远,不择对象,使学生坠入五里雾中,完全不合教学原理。杜亚泉的

《文学初阶》第一册在第九十课以前不出现虚词，全部用儿童身边常见的浅近事物做认字课文和内容。如第一课，生字为“大小牛羊”四字，再组成“大牛、小羊、大小、牛羊”四词作课文。八十课以后出现简单句，如“马负车、牛耕田、桃开花、竹生笋”。第三册，即第二学年开始课文穿插各科浅近知识，伦理修身，也有激励发愤读书学艺以振兴中国的。

课本后续各册中有声光化学，中外史地人物，对道光以后割地“赔款”都有所议论，也有寓言故事，如《二友》、《戒谎》等。直到四十年代初旧中国的小学课本还采用这些故事。由于杜亚泉先生有着广博的自然科学知识，这套课本里讲述的科学知识的广度和通俗性，是当时课本所仅有的。它还附有简单的教授法，也是以前各种课本所没有的。如果说商务后来编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成熟的和影响大的教科书，那么《文学初阶》是在此之前的一个重要阶梯。

杜亚泉是既有功于商务，更有功于我国近代科学事业的科学编辑工作者。他是浙江绍兴人，原名炜孙，号秋帆。家中薄有田产，从小发愤读书，求实学而不为科举奔走。他读书方面极广，无论数

学、物理、化学、动植矿物、医药、政治、法律、哲学方面的书籍，凡是能接触到的，无所不读。蔡元培说他“当暑夜，就庭中围帐挑灯以读。风雪冬日，掩北向书窗，仅留一线光以读。忘餐忘寝，有目为痴者。”如此苦读，又善于读书，所以“虽无师，能自觅门径，得理化学之要领。”绍兴办中西学堂时，慕其名，聘他担任教员。一八九八年冬蔡元培弃官回乡，担任中西学堂监督，即校长，学校里新派力量更多。还有马用锡、寿孝天、胡道南等都相信新科学，对尊君卑民、重男轻女、封建迷信等旧习随时加以纠正。因而引起旧派教员忌恨，怂恿学堂堂董横加干涉，杜亚泉、蔡元培等愤而辞职。

杜亚泉到上海开办亚泉学馆。按他自己讲，亚是化学原素惰性气体氩的省写，泉是数学中线的省写。他自己说在世无作用，如原质之氩；几何之线无体无面。他以此为号，是自谦没有作用、没有价值的意思。作为学馆名称，表明它是数学和理化。亚泉学馆招收学生教授数理化课程；另办《亚泉杂志》半月刊，刊载数理化文章，是我国自办科学杂志最早的人。他希望他教授的学生毕业后可以从事高深研究，或者作教员，或者从事需要数理化知识

的生产。因为风气未开，来求学的学生既极少，杂志每期只能销售一百一十几份，亏累不堪。当时社会科学新书销路很好，遂将亚泉学馆改组为普通学书室，决心专营出版，以出版手段推广新学，而不再面授学生。一年多时间前后出版书籍七八种，有自己编著的，如《定性分析》，有买稿的，如《露漱格兰小传》。另外出版期刊《普通学报》一种。

普通学书室虽较亚泉学馆时期较为“兴旺”，但他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编写、出版、发行、理财各方面极难面面顾及，顾此失彼，疲惫不堪而书室没有大起色。后来到一九〇二年四月因为斡旋浔溪公学事情，将《普通学报》停刊，到七月，商务印书馆失火后复业，将《外交报》发行业务移交商务后，书室业务也渐渐结束，他回绍兴去了。

一九〇四年底商务印书馆聘杜亚泉担任理化部编辑、主任，一直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他才离开。在商务前后二十八年，他除编辑加工书稿不计外，影响较大的署名著作有《最新格致教科书》、《最新笔算教科书》、《共和课本新理科》、《新撰自然教科书》、《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高等植物分类学》、《下等

植物分类学》、《动物学精义》等书，对培养一代人才起了积极作用。他这一根“线”和其他“线”结合起来，构成了“面”、构成了“体”，在祖国的科学技术传播事业中作出了很大贡献。

商务这两年出的书里还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叫《中国历史教科书》，是由夏曾佑编写的。

这本书后来列入商务的最新教科书里，称《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一九三三年收入《大学丛书》，改名《中国古代史》；解放后一九五五年三联书店重印。一本教科书前后印行六十年，是极罕见的。

夏曾佑，字穗卿，号碎佛，笔名别士。杭州人，是汪康年的表弟，但比汪康年早中进士。一八九〇年他中进士后任礼部主事，仍利用时间读书。他聪明而勤奋，得以博览群书。他的英文也学得极好，能直接读英文书。一八九四年春梁启超入京会试，广交名流，两人相识，成为“讲学最契之友”，崇拜公羊学。礼部三年后，分派外省而未曾中签，到上海。

清朝制度，分部主事，即各种渠道分配到各部任主事的官，除来自庶常馆散馆各员已经“观政”过的外，都是“学习”。三年“学习”期

满，由各部长官考核，合格和有额缺（编制有余），由长官引见“奏留”。不奏留的统归礼部签分外省（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他被奏留日日记）。

一八九六年《时务报》在上海创刊，因夏曾佑和汪康年是表兄弟，又苛爱新学，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次年他到天津任育才馆教师，与严复、王修植等创办《国闻报》，鼓吹变法。因为办报和严复接触频繁，“夜辄过谈，谈辄竟夜”，系统地接受了庸俗进化论思想，从而抛弃公羊学，史学观变成为历史进化论者。戊戌政变后，育才馆因他变法言论，将他解聘，八月下旬离天津回到上海，境遇极窘。张元济在京师时和他交往很深，极佩服他，称他“天才至可爱”，这时极力为他推毂，谋江南省学堂教习职位。不久任安徽祁门知县，三年后迁泗州知州，因母丧丁忧，是为一九〇二年夏。丁忧期间张元济聘请他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

《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分册出版于一九〇三年五月，是我国第一部新体通史，它有三个突破。首先，它突破了我国历来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借鉴西方，应用章节体编写历史。其次他

将我国历史进行分期，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大期，用进化论指导这种分期。从我们今天的史学知识来看，这种分期显然是错误的，看不出历史发展的真正因果，但打破了几千年历史不分期的旧传统。第三，它将三皇五帝上古三代，因无信史，称之为传疑时代。这点无疑对后来“五四”时期历史学中疑古学派，即《古史辨》派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商务印书馆在一九〇三年五月创刊国内第一份文学期刊《绣像小说》半月刊。这个刊物的编辑人我认为可能是夏曾佑。小说在我国历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对小说从社会的意义上进行理解，始于严复和夏曾佑。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国闻报》发表他们合写的《本馆附印小说缘起》，是我国阐明小说社会价值的第一篇文字。文章说：“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因而“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报〕纸分送。”他们是利用小说进行政治活动的“始祖”。《绣像小说》也提出了相同的宗旨，在其缘起的文字上也是相同的，认为“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搏桑（扶桑，即日本）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彦，……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

齐民之耳目”，于是“纠合同志，首编此编，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我们看两者的宗旨和文字多相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〇三年初商务还同时创刊了《说部丛书》。《说部丛书》是文艺翻译丛书，一半以上书是林纾所译，就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冲击封建的作用讲，林纾当时是并不意识的，而这套丛书的编者却是十分清楚的。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年底在横滨创刊《清议报》，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他接踵他的好友夏曾佑在《国闻报》的做法，将小说“次第译之，附于报末。”不同的是他指出了译印的重要，而不是著、译兼顾，因为当时中国自己著的新体作品远没有西方成熟。

他谈了所以要“洋”的原因：“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黌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商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

为功最高焉。”

《说部丛书》一开始就确定其方针是只收辑翻译小说，和梁启超的观点正是一致的。不仅如此，《说部丛书》第一辑第一种是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正文前有一序，这篇序不是别的文字，正是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只是将题目改成这本书的序而已，而译文也正是梁启超译《佳人之奇遇》的译文。如此明目张胆印“逃犯”的文字，舍夏曾佑外别无他人。这无非说明《说部丛书》也是准备藉翻译小说，抒“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

林纾这时将他的译本《伊索寓言》交给商务出版。自此之后，他的翻译著作都交给商务印书馆，占《说部丛书》的一半。

在一九〇三年九月以前商务除出版十七种课本外，还新出有政学丛书十六种，财政丛书三种，商业丛书三种，帝国丛书五种，历史丛书十三种，战史丛书五种，传记四种，地理一种，地图两种，普通学七种，说部四种，小说期刊一种，其他书六种。这些书籍以翻译自日文的或从日文转译的占多数。而以前几年一直出版的注释英语学习书籍从一九〇一年下半年起就基本停止了。

实藤惠秀在《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一书中说，商务“聘请做过高师教授的长尾槙太郎为编译所所长，在他下面布置了日本人及留日毕业生的编辑阵容。”这段话是错误的。显然，他是根据当时商务译自日文的出版物版权页上都署“出洋学生编译所译”的字样作判断根据的。出洋学生编译所在上海新马路，它是和东京的《译书汇编》社有关系。《译书汇编》的核心人物是戢翼翚，湖北房县人，一八九六年我国第一批留日学生十三人之一，后来成为留日学生的首领。一九〇〇年他曾受孙中山委托回国协助唐才常自立会起义。事败后回到东京，组织《译书汇编》社。次年一九〇一年我国第一批留日学生毕业回国，戢翼翚和日本人下田歌子在上海合办作新社，从事日文书的出版。有的人回来后从事日译汉工作，是为出洋学生编译所。戢翼翚和出洋学生编译所有联系，自己又有书稿在商务出版，如他和王慕陶合译的那特硁著《政治学》。戢翼翚字元丞，“戢”字和“戚”字韵母相同，声母又对应，有些人对他以字为名，文章中称他戚元丞。出洋学生编译所的稿子可能质量高低不一，于是有人说“王慕陶和戚元丞两个大坏蛋”，卖次稿

子给夏瑞芳的故事。戢翼翚一九〇一年夏天才回国，请他组织人翻译只能是张元济投资之后。而长尾槙太郎一九〇三年底才进商务，他是汉学家，而非“中国通”，在商务仅是顾问而已。

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针从英语学习书转到社会科学，稿件从译自英文转到主要译自日文，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社会形势变化，一方面是张元济加入商务和进入商务后一系列活动的结果。

他在一八九九年筹备译书院时就写信给严复，告诉他计划译书，“门类以政治、法律、理财、商业为断”。南洋公学是个“准衙门”，办事掣肘很多，这一计划无法实现。现在他拿到商务来实现。在两年左右时间里出版了九十种左右这类书。

张元济加入商务时正值清廷用下诏实行所谓“新政”作遮丑布。一九〇一年七月十六日下令废八股，八月一日下诏实行“新政”，八月二日令改书院为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这叫“三纸空文”：书院改学堂，是换块招牌；多设蒙养学堂，政府不拿钱出来；废八股，仅仅是科举考试的文体有所变化，明令规定科举仍考四书五经经义，——大家要求的是废科举。唯一不同的是科举考试除四书五经外，要“加试中国政治史事论，各国政治艺

学策”。八月二日改书院为学堂的命令中规定，书院“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汤和药都没有换。

这“中外政治艺学”对原来只啃四书五经的莘莘学子来讲是非常陌生的，于是这类书吃香起来，出版事业得到发展。但是跟着发生一种极坏的做法。当时，一九〇二年有人在《中外日报》上发表文章《译书略记》，指出科举加试政治艺学以后，那些原来专门赶科举考场的书肆纷纷出版翻译书，供考试者应付。买者不是为求知识，而是买夹带，卖者不是为开民智，是卖夹带。他称当时为“夹带译书时代”。又说“夫译书而至充夹带，则译书之恶达于极点矣！”这种书“译工、印工、装订工无不草率之极。”他还指出译书分为四等：“专为传其学说起见，上也；欲以其学著名，次也；欲以其学易利，又次也；利在前而后从事于学焉，下焉。”那种“夹带译书”正是译者、出版者“利在前而后从事于学”的产物。

张元济在加入商务时就和夏瑞芳约定，以后商务印书馆“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不以盈利为目的。不以盈利为目的，主要的，我们想，应该是不搞粗制滥造。所以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业

务后，主要的活动就是聘请有学问的人当编辑，舍得花高薪聘请一些有学问的人作编译员，舍得花高稿酬买一些稿子，保证书稿的质量，使读者能从中得到一些学问。他聘请了夏曾佑，聘请了在南洋公学担任帮办的翻译家伍光建。高凤岐、徐珂也都是著名的文人，而且都有一定编辑或主持工作经验。在稿酬上，商务舍得花钱。当时最著名和最有成就的两个翻译家，除严复所译《名学》很早就答应给金粟斋书社外，其他著译稿都交给商务出版，版税高达40%。林纾自从高梦旦加入商务后，他的译稿几乎全卖给商务，商务给千字六元的稿费（当时一般稿费为千字二元）。吴梼的译稿也大都在商务出版。这样的译者和编辑阵容使商务的书籍质量异于当时的其他出版者。

我们从所说“夹带译书时代”商务的出版物看，属于供“夹带”的出版物是没有的。这个做法后来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一种传统，即不出流品低下的书。

书籍流品不等于质量，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应该用对社会发展是否有好的影响作为标准。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检查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出版的一万多种书籍，流品低下的书可以说是没有的。

甚至在其所出的一千余种学习外语的书籍中，连“百日通”或类似的书名都不用。形成这种传统当然是几十年里大量编辑人员的共同努力，但也不能否定作为商务出版事业奠基人张元济的作用。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新式出版并不是从商务开始，也不是从张元济开始。在先已经有很多人、很多机构，与其同时代就更多。但相当多是以盈利为目的，他们或许可以得利于一时，但最后终被时代所抛弃。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民族的利益为利益，尽管开始很弱小，历尽艰辛，却能够得到读者的支持、经得住时间的冲刷。商务印书馆是其中之一，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等都是它的伙伴，都是注意出版流品高尚的书为自己的职责的。这些才称得上“出版事业”。是我们研究出版历史首先应该关注的题目。进入三十年代后，以邹韬奋为首的生活、读书、新知等书店，把出版事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相联系，把出版推入一个更新的世纪。

本章主要引用材料

张元济：《东方图书馆缘起》
严复：《英文汉诂·序》
严复致张元济信
袁翰青：《一个自学有成就的人》
杜亚泉：《文学初阶》1—6册
《亚泉杂志》1—10册
《普通学报》1—5期
梁启超：《亡友夏穗卿》
《民国人物传·四·夏曾佑》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
汪穰卿师友书札
《光绪东华录》
实藤惠秀：《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日文版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商务印书馆早期书录》（稿本）
汪家熔：《商务印书馆的绣像小说》（《出版史料》第二辑）
冯自由：《革命逸史》
刘禺生：《世载堂杂记》

六

最新国文教科书

杜亚泉编的《文学初阶》在我国教科书历史上虽然应该作为进程的一个梯阶，到一九〇六年还重印，但还不能令人满意。这时南洋公学发生了“墨水瓶风潮”，为编辑更好的课本提供了条件。

南洋公学虽是教洋书的“新法学堂”，但同衙门差不了多少，管理学生用封建专制办法。因为学生每月可得到一点生活津贴，学校有恃无恐，动辄以开除来维持“秩序”。学校历任总理实心办学的极少，教员水平也参差不一。一九〇二年汪凤藻任总理的时候，有位姓郭的教师，越没有学问，越专制。他讲课时一定要学生把他的椅子放得端端正正。十月中旬一天，他给中院五班上课，发现他的

椅子上有只灌满清水的墨水瓶。他勃然大怒，随便指定一个学生要他查出是谁放的。过了两天查不出，他就请校长开除这个学生，“罪名”是不敬师长，——大概他是想学生以空墨水瓶讽刺他胸无点墨，或肚皮里没有墨水吧。当时学生都用墨水瓶当水盂洗毛笔，是否故意不得而知，随便指定一个学生查不出而开除，处理得也太无道理。全班学生不服，请求总理收回成命，汪凤藻接着把全班都开除。全校学生激于义愤，列队请求，特班总教习蔡元培是一贯主张民主的，看不惯这个做法，也和汪凤藻交涉，汪坚不收回。汪凤藻的做法激起了包括特班在内的全体学生抗议而退学。蔡元培将学生介绍给中国教育会而成立爱国学社。学生因为“要自成学校，家中不给钱，要求自给之法。”蒋维乔说：其一法“社中自总理、学监以下教职员，均自行另谋生计，对于学社，纯尽义务。如蔡孑民则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吴稚晖则任文明书局事。”

蒋维乔在一九三六年关于中国教育会的回忆与他的日记不尽符合；学社存在七个月，他只参与一个月零六天的活动，会有模糊的地方。

蔡元培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事，在由黄世晖记的《口述传略》里和后来他专门记述回忆的

《杂记》手稿里都没有提起过，仅在《自写年谱》手稿里，有一九〇三年《苏报》案发前离开上海辞职商务编译所长的事。张元济亲自记录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职员录》上没有关于蔡元培的记载。

商务印书馆有一些拿干薪的和不必上班的人员。他们或在教育行政部门任事，如民元后蒋维乔；或是有学问、声望的人，前期如章太炎、后期如蔡元培等（均见《张元济日记》和致蔡元培信）。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出出力，或写一些、看一些稿子。他们自然不是商务的"职员"，不上职员录。

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序》称："余既受商务印书馆编译之职，同时高梦旦、蔡孑民、蒋竹庄诸子咸来相助。"

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蔡先生在商务印书馆成立初年，因张菊生先生主持编译所之关系，一度曾在编译所相助主持，及苏报案……"

张元济在一九〇二年一月已在商务全天主持编译事务；爱国学社在同年十月中成立。蔡元培要"另谋生计"以维持爱国学社，张元济会义不容辞支持他的。两人不仅是同乡、同年、同在翰林院，

而且在北京时都倾心西学，主张革新。在上海他们一起在南洋公学，同发起办《外交报》，两人关系极密切。张元济非常尊重蔡元培。张元济有很浓厚的民主思想，在讲他办通艺学堂时已提到过。他也不会同意汪凤藻的那种师道尊严，所以他完全会支持蔡元培。蔡元培也是以学问道德著称于当时，在商务挂一个名对商务是十分有利的。蔡元培前后两次去德国游学，张元济都答应按月以稿费名义由商务支付生活费用。

蔡元培并不是为了出版事业，而是为维持爱国学社才搞的兼职。他的大部精力都放在爱国学社上，甚至爱子夭折都不去料理而为学社奔走。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他还要天天“着操衣上操”，还有一个四合会，每天有三小时活动。即使是所长，蔡也近乎挂名。当然他也要有一些编译活动。活动之一就是议论编辑教科书。我们在前面谈到，张元济在《致友人论学堂事书》里提出了通行的课本质量不如人意，应延聘学有专长的人主持编辑。因为商务编译所当时规模还小，就决定请中国教育会系统的人编的办法。先定编辑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大略的规定了编纂体例，吴丹初编历史和地理，蒋维乔编国文。

五月中旬商量编教科书的事。蒋维乔已脱离爱国学社而是爱国女校教员。五月二十三日女校放暑假后，他一个人就埋头编。原定是全套国语教科书共一千五百六十课，分为十册，计划在六月底（中间有闰五月）编完。后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全部编完，计编八册，每册六十课。

这时商务印书馆有一个大的变化，即吸收了日本出版界的股份，成为中日合办企业。

金港堂是日本最大的教科书出版商，在品种上、在发行数量上都占日本全国一半以上。他们勾结日本文部省，刁难其他出版社送审的课本，贿赂各县教育行政当局支持采用他们的书。一九〇二年这些事被揭露，称为“教科书疑狱案”，有一百多人受牵连，一批人被判入狱，——大多是两个月。“教科书疑狱案”使金港堂大受打击。这件事导致日本政府提前实行国定本教科书，彻底打破了金港堂的垄断局面。金港堂为安排一些疑狱案出狱人员，要在中国进行一部分投资。金港堂主人要他在上海三井支店的女婿山本条太郎进行投资调查。

当时商务的资方之一高凤池说：“山本倒有意同本馆合办。当时本馆鉴到中国的印刷技术非常幼稚，本馆虽说粗具规模，但是所有印刷工具能力，

只有凸版，相差很远，万难与日本人对敌竞争。权宜轻重，只有暂时利用合作方法，慢慢地再求本身的发展，可以独立。遂由山本介绍议定，由日方出资十万，本馆方面除原有生财资产〔估值五万〕，另加凑现款亦并足十万。”后来在十月初一日签订协议，十一月聘长尾槙太郎、小谷重 等。没 有 几天，又聘请高梦旦进馆。

高梦旦原名凤谦，他是福建长乐人。他目睹祖国日益沦亡，极力主张学习西方，求得自强。所以他不去参加科举，而自学“新学”。他二哥而谦和表兄魏某在福州马尾船厂，他随同教表兄的孩子读书。和他们表弟兄往来的有林纾、江经畲。林纾译《茶花女》时，他们都在旁边。他后来随长兄凤岐到杭州，协助办西湖蚕学馆，即蚕桑专科学校。一九〇一年夏，清廷下令实行新政，杭州求是书院改为浙江大学堂，劳乃宣任监督，聘高梦旦 为 总 教习。次年浙江选派学生去日本留学，他担任留学生监督。在日本一年多，他趁机考察日本维新成功的原因。他认为根本在教育，而教育的根本在小学这个基础，不认为办大学、留学是重要的事。所以他辞职回来，准备从事普及小学教育。这个看法虽然比张元济晚一年，但多么一致。

因为那时他哥哥在商务当编辑，回来后他就认识张元济。他们两人虽然刚刚认识，却是神交已久。高梦旦在一八九七年就投稿《时务报》发表文章，最早公开提出废除跪拜。梁启超非常佩服他，而有书信往来。不久高梦旦著文《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说：

“互市以来，天下竞尚西学，竞习西文。然音义诡异，则学之难也。教授乏人，则师之难也。由官设学，则周遍之难也。国非一国，则兼通之难也。惟以译书济之，则任其难者，不过数十人，而受其益者，将千万人而未已。”

他认为中国之改造必须学西方，学西方，离不开翻译家。翻译家是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他愿作窃火者的助手，将这些书稿变成书，这是使祖国摆脱愚昧、黑暗、贫弱，走上文明富强道路，也是自己能作贡献的地方。

他与张元济的思想、观点、抱负直至品德太一致了。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他们两人初次的见面和谈话将是如何的投契。以致张元济不同其他任何人商量就决定聘请他为国文部主任，从事教科书的编辑工作，而高梦旦马上答应进商务。从此他们两人密切合作，终高先生毕生而无间，共三十多年，使

刚从印刷企业转变为出版机构的商务印书馆的巩固和发展具备了基本条件。

高梦旦作为国文部长，一进商务就把全部精力放在协助张元济从事修订蒋维乔已经编好的国文教科书上。这套书的第一本出版时叫《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在一九〇四年二月出版。

这本书对商务的发展有着近乎决定性的作用；在我国教科书的历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不仅它所确立的编辑原则基本为以后各家编的课本所遵循，而且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真正超过它的国文课本出现。它所以成功的原因有各种说法。我们认为关键是它采用了多人参加的"圆桌会议"，或说"合议制"和认真负责态度。可以拿他们编写习字帖的一次会议来说明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

《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后，接着编一种习字帖，和它配合。张元济是翰林，当然由他写范字。字帖不外乎是写范字，但他们还要研究一下如何安排才更好。

一九〇四年二月十四日蒋维乔日记："午后复与高君等商议习字帖。张菊翁之意欲令习字帖每日所习即按读本每日排次。然编时大有不便，盖读本虽以笔划繁简分先后，然儿童习字之难，

当不在繁简而在笔划之转折也。今议定习字帖之例如左：

一、前四星期先教三十五种笔法。

一、第五〔星〕期授以笔划极简单而无转折者。每日十六字，带温熟字，加入生字五个，皆所读本中已读者。

一、六星期至十星期，亦每日十六字，渐以笔划稍多者，生字仍加入五个。

……

一、习字帖可用铜书钉反订，教员每日可随拆一页授学生。”

引这则日记并不是研究学生先写点划竖撇三十五种笔划好，还是先写“上大人孔乙己”好，无非说明他们当时是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的，即使一种小学生习字帖。

语文教科书以第一册为最难，特别那时用文言文，如何使刚入学的学生不觉得困难，又不能太浅，免致后续各册和其他各科学习时困难。他们一开始就着力于研究当时各家已出各种课本的优缺点。整理出十八条缺点，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文字方面：生字多，笔划多，句子长而没有韵味，过早讲解介字、助字等虚字；有的课本则

太浅，在教其他功课时困难很多。二、在思想方面：讲一些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无助于学生的修养；墨守旧思想，无助于社会进步。三、在材料安排上，或是搬不合于我国情的外国事物；或讲不常见的事物，或春讲落叶、秋讲萌芽，学生不易和实际联系。

找到了别人失败之处，订出了十八条与之相对的办法：规定生字笔划由简至繁，由单字而单词，再成句。第一册最长的句子以五字为限；第一册不出现虚字。取材规定由已知至未知，以儿童身边的事物为主，不取外国、古代故事。花草瓜果，按课本进程和时令选事遣词。

全套课本取材注意居家、处世和治事所不可缺者，如农业、工业、商业等普通知识，一般尺牍、帐册、契约等。课本具有普及教育的性质而不是为当时科举所必读的四书五经服务。他们在缘起中提出，课文材料极力表彰我国的悠久文化和古代圣贤的嘉言懿行，极力矫正我国的陋习，如迷信、禁忌、缠足、鸦片等。“务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知识，然后进求古圣贤之要道，世界万国之学术艺能。”这个宗旨正是张元济、高梦旦的倡普及教育而不亟于高等教育的思想，反对科举的思想的反

映。也和他们对待西学和留学的态度一致，这就是提倡欢迎西学，同时反对数典忘祖。

在排印方面规定用老粗号大字排，六十课课文共有一百幅插图，以增加学生的兴趣。图和文字要在同一展开面上。这看起来很容易，其实很难。

圆桌会议认为课本以教日用普通文字为主。今天看来极平常，而且理所当然，其实难能可贵。因为正当第一册修改完毕后，清朝政府公布了《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这个章程规定了小学科目、程度及每星期各科教授时间。有人说商务课本的成功"是依照学部所颁布的学堂章程各科俱有的，所以独步一时"（庄俞：《同舟》第七期），其实并非如此。这个章程规定的课程，按每周规定授课时数，次序是：读经（用五经节本）十二时，算术六时，中国文字四时，……。要注意的是章程所指的"中国文字"课并非国文课而是语法课，规定中并无国文课。我国规定小学有国文课，始于民国元年十一月《教育部订定小学教则及课程表》，有国文课，初小一年级每周授课十时。而早些时候商务的圆桌会议诸人对学部章程大肆嘲笑其不合教育原理，才确定了商务的《最新国文教科书》一年级"每星期授国文十小时，六小时讲解诵读，四小时

默写作文。”他们的课本以教日用普通文字为主，完全不是“依照学部所颁的学堂章程”，而是依照一般群众的需要。所以初版在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三日出版，到十五日，就“已全部销完四千部，现拟再版矣”。

还有两个不为人知的事：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清廷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布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传到上海后，夏瑞芳怕不照章程规定编书没有人买课本，“为谋利起见，颇有欲强从之者。而张菊翁、高梦翁及余等均不愿遵之。”张元济是有“否决权”的，夏瑞芳只能收回自己的意见。另外，长尾等见到那个《章程》后写了一首诗，诗中轻视中国之意，见于言外。圆桌会议的中方人员当即写诗一首：“荆棘铜驼叹墓门，茫茫地老与天昏。会看汉族风云变，大泽龙蛇淮泗村”，表达了人民终将推翻这腐败的清王朝而建立民主国家的意愿。

历来文人的习惯不愿别人改动自己的文字。而《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编辑，采取的圆桌会议合议制，不仅研究编写的原则，也对编好的课文进行集体审订、修改，实际就是改动别人文字。据原编者蒋维乔后来说，这种做法一方面保证了书稿的质

量，另方面，因为彼此的宗旨相同，能够互相谅解，"以为一人识力有限，必须互相批改，以求至当。国文部中遂成风气，彼此水乳，毫无成见。"集思广益是这几本课本获得高质量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套课本的成功还有日本朋友的帮助。课本配置大量插图以引起儿童阅读兴趣和帮助记忆，就是日本朋友的建议。

前面讲，《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未及二三天，四千册就卖光了。我们查当时的上海报纸，这本书只登了一天广告，在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五日《中外日报》上，介绍它的编辑旨趣，体例。也就是说广告见报的那天书已经卖完了，真可说不胫而走。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全国各地，包括已被日本侵占的台湾在内，学生大多使用这套课本。台湾八十老人任真汉老先生一九八二年著文回忆他当时在台湾偷读这课本的情景时说："商务版的教科书，确是更易上口入脑，'天地日月，山水土木，父母子女，井户田宅'，虽然也似千字文体，但逐课发展，生动有趣"（香港《文汇报》1982年2月6日）。

商务印书馆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既然叫

"最新"，自然不是"最早"。它在辛亥革命前后发行十余年，在它之前、之后的课本只有它把别的挤倒，别的没能把它挤垮，它的发行量占了全国发行量的百分之六十。后来各家新编教科书十九离不开它的窠臼。可见不一定"最早"、"第一"才有历史价值。

教育家蔡元培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多年和商务印书馆有比较深的关系。他当时观察："于是印刷之业，始影响于普通之教育。其创始之者，实为商务印书馆。……〔教科书〕审慎周详，无不如是。编辑之日力，缘是而虚糜者颇巨，不敢吝也。又有教授参考书，……大受教育界之欢迎。而同业之有事于教科书者，度不能以粗疏之作与之竞，则相率而效之，于是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一批仁人志士参加出版事业，以出版推进教育，作为救国救民的手段，出版事业发生了质的变化。沈雁冰所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常开风气之先"。我想，他和蔡元培所说是一个意思：使出版变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达到了张元济当初加入商务时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目的。

本章主要引用材料

张元济、高梦旦校订，蒋维乔、庄俞等编《最新国文教科书》1—10册，1904—1906
张元济、高梦旦校订，蒋维乔、庄俞等编《最新国文教科书教授法》1—10册、1904—1906
《蒋维乔日记》癸卯年甲辰年
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
庄俞《同舟》第七期文章
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
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
吴稚晖：《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
高乃同（平叔）：《蔡孑民先生传略》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
张元济致蔡元培信
高凤池：《本馆创业史》
《东方杂志》33卷18号悼念高梦旦文章
蔡元培：《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君传》

七

摈弃三纲的伦理道德观

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的修身教科书名叫《最新修身教科书》，由蔡元培、高梦旦、张元济三人署名合编。实际，初小一至十册由张元济编，高小四册由高梦旦编，中学由蔡元培编。

《最新修身教科书》是部成功的教科书。从教学方法上讲，它符合修身课的特点。修身课同其他各门功课不同，重要的不是获得知识，而是道德、性格的养成，是一个陶冶的过程。这套课本根据这个特点，将课程规定为从入学第一天起到中学毕业为止十二年中每学年、每学期、每星期都有的功课，成为贯彻在整个学校生活全过程的功课，而不是某个阶段的功课。它将伦理道德的每个方面在每

学期，即课本的每一册里都至少出现一次，在学生头脑中不断扩大和深化。

《最新修身教科书》还有一个符合修身课特点的教材编选方法。它不用抽象的伦理条文，完全用古人的事例作教材，以生动的故事代替枯燥的条文教育，用榜样作手段潜移默化，这符合品德教育的规律。

这些特点使《最新修身教科书》和同时代的其他同类课本比较是远高于它们的。同时代的其他修身课本没有很好探索伦理教育的特点，而将课本编成和其他知识性学科课本一样，因而变成教学中某个阶段的功课。如南洋公学出版的陆基编的《蒙学经训修身》，只是薄薄一本；文明书局由朱树人编的修身仅限于高小；人演绎社编的，初小高小都是一册。

对于修身课程来讲，课本的编纂方法完全是次要的，首要的是内容，看它所推崇的伦理道德是什么。

在以往漫长的封建年代里，形成了与之适应的、完整的伦理道德。我们国家历来重视修身，即“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以修养个人为其关键。《礼记·大学》讲“欲治其

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在清末中国启蒙思想家也以德育作为十分重要的内容。严复在《原强》里讲：“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至于发政施令之间，要其所归，皆以其民之力智德三者为准的。”商务在编教科书的时候，有人赠诗给他们，其中有“劝君多造国民格，复我河山有后贤”句。亦可见当时知识分子对德育之重视。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从张元济自己、蔡元培、高梦旦三人来编这套课本，可以间接证明他是十分重视德育的，才以这样强的“阵容”来编这套书。他们三位的学问道德，在当时新学界里是颇有名声的。

一九〇二年奏定学堂章程开始有课目的规定，但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公布课程标准，因而教科书的编撰者、学校对教材的选用都有极大的自由。所以《最新修身教科书》我们完全可以看作张元济伦理道德观念的反映，从中研究他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一个分析、研究他的入手处。

一九三六年，教育家吴研因在《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一文中讲，清末的教科书“很注

重修身忠君爱国等的教材”。从当时的一般情况讲是这个状态，但从商务的各种课本讲，却不完全是这个样子。以小学修身课本为例，每册二十课，十册共二百课，没有一课提及忠字，没有一课涉及君字。这套课本第一册每课讲一则故事，五六册以后各册每课讲两则故事。共三百个左右故事，没有一则故事涉及忠字。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事实。在一九〇四年这样选材，确是表现了可贵的民主思想。

爱国和守法，是当时教科书中比较难处理的观念，不能不接触，而“国家”又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国家”有两层意思，一是指阶级压迫的国家机器；另一是区域概念，即生我育我的祖国。因而爱国也有两层意思。当时腐败的清廷是不值得任何人爱的；但作为生我育我区域概念的祖国，在日益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候，又是人人应该关心，起而捍卫的，而这种爱国行动又往往对腐败的清廷有利。

在《最新修身教科书》里一共有六课以爱国为内容的。

第四册第二十课，讲申包胥乞师于秦，在秦

七册十九课时在教授法中要老师向同学讲："楚既为吴所灭，而包胥犹必复之，则未灭而将为人灭者，可不知惧知警哉。"

第七册十九课，从《孔子家语》取孔子告弟子，"鲁，父母之国，不可不救。"从《墨子》取公输般为楚造梯欲攻宋，墨子往救的故事。后一个故事，当然是墨子的非攻思想，但教授法强调的是"墨子宋人也"，"则宋即为墨子父母之国，其当救之也与孔子同，故孔墨之道虽不同，而爱其父母之国则一也。今诸生皆为中国人……"

第七册十七课虞潭一课，教授法强调"国有外侮，岂可坐视"。

七册二十课，引《战国策》客止田婴城薛的故事，以"齐亡而薛亦不能终保"强调"国与己身之关系"。十册第一课，以《左传》郑国商人弦高犒秦师却敌，和《史记·田单传》齐国画邑王蠋宁可"自杀而不为燕将"以及第八册十六课马援马革裹尸，都指出国家沦亡，个人就不能生存，应当一战而求马革裹尸，绝不能助桀为暴求个人的富贵。

选择这些材料和作这样的引导，在外侮日益严

重的时候，当然无可非议。

对于守法教育，共三课，全部选择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故事。对贯穿于整个封建时代的“八辟”即“亲、故、贤、能、功、贵、勤、实”犯法可以减刑或免刑，以及官官相护、徇私是一种很好的反动。

在这套课本里，反映出张元济的思想是摈弃封建的三纲，而接受五常和五典。

五常，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一》：“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

五典：孔颖达《书疏》：“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

他接受五典原来的合乎理性的部分，而不接受后来的非理性成份。在第三册家庭一课的教授法里完整地表达了他的五典观念是反对“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课文中指出家庭的每一员“人人当自尽其职分，而不可苛求于人，是故父慈其子、子孝其父，兄弟相友、夫妇相敬，则一家之中太和洋溢，……。”强调家庭成员的相互关系；而否定那种隶属关系：“苟不以自己当尽之责为立，而专以责备于对待之人，则必至父子责善、兄弟相尤、夫妇交谪，而为之骚然不安。”他推崇颜之推的风化

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这些说法规定了上者不仅不能凌下，而且要做个“好榜样”，反对千百年来的家长制，推行一种相互敬爱的和睦家庭关系。

他对于孝的材料，也选那些合于理性的，如殷子徵得到果品等可口食物先奉母亲，王延夏清父亲枕席，冬温其被褥；而不以卧冰求鱼、哭竹、恣蚊之类非理性的故事宣传孝。讲崔沔刘审理奉侍母亲、祖母（十册八课）的故事。

夫妇关系他强调双方的贞，而不仅是女对于男的义务。教材举郤缺夫妇、樊英夫妇相敬如宾，举尉迟恭以“富不易妻”拒绝唐太宗招他做驸马的故事。张元济和高梦旦、蔡元培都是主张“男子不娶妾，男死后女可再嫁”和“夫死再嫁，礼所不禁”的。蔡元培与黄世振结婚时是以此作为条件提出。高梦旦对再醮“当做断发天足一般的热心提倡。”张元济在一九四七年曾经著文支持再醮。

他如师弟、诚恳、守信、慎交、廉洁、节俭、惜物、敬老、宽容、勤奋、敬事、自立、公德等等都有接受和提倡。

将博爱的概念引伸到平等。博爱是我们的旧观

念，它指泛爱一切，可以是一种毋需平等的爱，例如不杀生之类都可称为博爱。

他借博爱提倡平等，但他并不提倡旧有的那种善恶不分的泛爱一切的"博爱"。如在第一册第十六课讲肖递欣反对以弹鸟为游戏，戒学生"生命之不可妄杀"。但紧跟着在第十七课，讲孙叔敖小时杀两头蛇的故事，告诉学生"有害之物不可不杀"，使学生"既知妄杀生物之不可。至害人之物，仍当杀之，庶使他人不至再受其害。"

他对待国内问题，他生活在历尽兵灾的时代，所以历来主张"和平改革不伤元气"，而对外侮历来主张抵抗，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如此，在抗日战争是如此。

清末，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传入，平等的观念开始传播。在第五册第十五课、第七册第十二课里他以平等来解释博爱，在《教授法》里说："均是人也，何分贵贱。"指出对于人"使以贵贱贤愚之别，而有所厚薄于其间，非博爱之道也"。而且以所谓"逆施"的故事来衬托。那些故事中的上位人对下位人尊重，以人格对待。前面提到课本里关于守法教育里所举，实际也是一种灌输平等思想的

方法。

摈弃三纲，而以理性检验五常五典和四维，爱国、平等、博爱，还有勤奋、自立等，这些，加起来，是属于中国的资产阶级范畴的伦理道德观念。但各个方面之间还理不出一个核心。

使我们感到兴趣的不仅在这部课本里能整理出张元济的伦理道德观，而且还觉得，他多年身体力行的正是这套课本里所推崇的伦理道德观。在整套课本中三百个左右故事，引证古书，遍及经史子集，独于颜之推《家训》引用最多。整个课本和教授法仿《家训》，每一训必以故事佐证的体例。《家训》以“规行矩步，安辞定色”为修身第一章，《课本》第一课教学生“进退坐作，如何而可”。《课本》最后也以《家训·勉学》：“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的宗旨，在最后一册最后一课要老师叮嘱学生不要“藉古人之佳言懿行为口说之资，所学仍与所行相违，何裨于实际”，而要躬行。凡是曾经和张元济接触过，或是接触他文字比较多的人都觉得他始终是以这套课本作为他行为的准则，以此对待长辈、弟兄姊妹、子侄、师友、朋友和尽自己对社会的义务的，一个始终表里如一的人。了解他的伦理观，可能有助于对

他的事业活动的了解。

本章主要参考材料

张元济：《最新修身教科书》第一至十册（1904——1905年）

张元济：《最新修身教科书教授法》第一至十册（1904——1905年）

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

颜之推：《颜氏家训》

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

《东方杂志》33卷第18期悼念高梦旦文章

八

为教育的健康发展

张元济加入商务正是辛丑“新政”的时候。“新政”从表面上看和戊戌变法差不多，实际大不一样。它是在清廷决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后，是在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利用庚子八国联军之役各国要求惩办“祸首”的交涉，使载漪、刚毅等顽固派濒于全军覆灭，而他们在重新获得慈禧重用之后。“新政”是为了适合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强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需要。因而除了那些适应帝国主义利益的以外，其他“新政”一般都是官样文章，人民除了被敲骨吸髓加重捐税外，一无所得。但是各项“新政”中，兴学堂、派游学，“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资产阶级思想和西学的传

播，客观上起了一点积极作用。一批批和封建士人不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堂和留学的过程里产生出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多少有了些扩散的园地。”（《辛亥革命史》上册）

一九〇一年七月十六日清廷命令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八月二日命各省、府、厅、州、县书院改设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八月四日命各省选派学生出洋肄业，学成归国奖励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一九〇三年二月十五日，袁世凯、张之洞会奏：科举阻碍学校，请将科举取中名额按年递减，三科减尽。一九〇五年八月初六日，袁世凯、张之洞会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奏请从次年丙午科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这些废科举、兴学校的措施都有利于新式教育的发展。但是新式教育当时尽管有所发展，却有个致命伤：清廷的一系列兴学校的命令是和废科举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以办学校和留学代替科学，丝毫没有触及一千多年来读书为做官的传统思想，教学内容亦没有大的变动，因而教育并无大的变化。一种是“改换书院匾额，仍试策论，变易义塾名目，

仍授经书。然此犹可曰荒僻之地，风气未开。”一种是“都会之区，通商之埠，外国语学校到处林立，”以为外语和算学就是新学。相当多的人以上学和出洋留学作为图出身的手段。当时有人说，科举虽废，日本却成了中国人的“大贡院”（清代乡试、会试的地方叫贡院）。既然为图做官，留学的以学政法为主，对于教育，“其研究者如凤毛麟角，十百中不得一二。……此关系重大之事，而人多不肯过问，无惑乎？日日言兴教育而教育终不见进步也。”以上是当时有人在《论中国教育宜急图改良之法》里分析的教育上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是适合新式教育的教材，第二是师资，第三是上学和留学的目的。

清廷废科举兴学校，目的仍然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在一九〇一年八月兴学诏里就讲清楚，各级学校，“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史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张百熙等的奏章里，拟定了“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础，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材，慎防流弊之意。”清廷废科举，兴学校始终抱着“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从未放松过。

但是因为它拿不出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更拿不出象样的课本，这给“风气未开”的“荒僻之地”办学带来了没有课本的困难，客观上也给有志于教育事业的仁人志士以宽广的驰骋的场地，较少受清廷束缚，可以编出不符合它宗旨的课本，也是广大群众所欢迎的课本。张元济主持编辑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正是这样一种课本，所以被大家广泛采用，十分流行，所到之处自然而然地把清廷所规定的读经时间挤掉。《最新修身教科书》同样受欢迎，所到之处也很自然地把以忠君为中心的三纲排除掉了。这就偷偷地把清廷所规定的“体”的问题中的“忠”和读经解决掉了。新式教育中出来的学生，如果没有其他干扰，将是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一八九九年秋张元济曾经和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有过接触，那次内藤到我国游历，他们两人探讨了中国改革的途径和前景。他们两人都认为，人们才识的获得，知识分子伦理观念形成的影响，两者首先是学校的责任，因此必须关注学生在学校的情况。这个观点他一直没有改变，并且一直为了改善学生的学习条件而始终不渝地埋头工作。他除了对学校提供足以培养新的一代知识分子有关伦理道德

的课本外，极注意其他课本的提供。《最新国文教科书》和《最新修身教科书》第一册出版后，接着组织编辑初小算学等其他学科的课本。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根据张元济建议，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通过决议，鉴于当时废科举后各处“广设学堂，需用教科书籍较前更甚，京师学务处及各官〔书〕局所编辑教科书无多，其余书业各家编辑教科书甚少，本馆更应设法扩充”，“编译所添聘编译人员”；在闸北设新厂；添设分馆。在此后的几年里，直到辛亥年，商务印书馆不仅出齐了初小各年级、高小各年级和中学各年级的各科课本，而且低级学校有供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选用的课本，高级学校各种学科都有不同人编的课本可供选择。商务出版各种课本共三百七十五种，八百零一册。我们现在无法找齐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全国共出版各类各教科书的总数，无法从比例上看其所占份额。也难以从质量上进行比较，但从近四百种和八百册这个绝对数字看，一般地能说明一些问题——没有一定的质量是难以维持这么多品种的。

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么众多的学科教学用书里，有一部分是小学各科教授法、教授指南和“详解”。这些书籍在我国是商务印书馆首创，最早是

张元济所校《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教授法和张元济所编《最新修身教科书》第一册教授法，都在一九〇四年。此后商务印书馆所出小学各科教材，包括习字、图画、体育等都有与之配套的教授法。对于一个极少人研究教育学、师资水平从教育学的角度讲总的偏低的国家讲，与课本配套的教授法对提高总的教学水平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问题还得从当时我国小学教学的师资情况讲起。

我国教育原来只教四书五经，教书历来是落第秀才的事。历史上有一些诸如孔子这样的大教育家，有关于教育的学说，但没有人去系统研究过，更没有人专门传授教育教学经验。兴办新学，清政府办了一些师范学校。师范学校不仅数量少规模小，而且腐败之极。爱国华侨陈嘉庚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述了辛亥革命后他回国赞助革命，在家乡福建同安县集美乡办学接触到师资问题所作的调查。他说同安全县连简易师范毕业的都算在内，只有四个人，其中一人早已改业。他到福州调查，全省师范只有福州一校，学制四年，毕业后约当举人资格。每年招新生八十名，但从不公开招考。因为膳宿免费，奖励优厚，毕业后赏给举人资格，所以官僚、富人、豪绅的不第子弟，多方钻营。这些学生念师

范无非图混四年可以凭空得一个举人出身。既然钻营入学不经考试，程度难免参差，文凭到手后这些膏粱子弟谁愿去当教师。而贫寒子弟愿当教师，却受不到师范教育。这就是当时师资的一般情况。

根本的办法就是使有志于教育事业的人能受到师范教育；创造一个研究教育学说的环境，使从西方借鉴来的教育学说和我国传统的教育学说结合我国具体情况进行研究。采用配合课本的教授法是种极好的治标办法。特别当时很多小学只有一个教室，实行单级教学，好一点，也仅是复式教学，一位教师要负担几个年级、几门功课，根本没有时间准备教案。这种情况下教授法书籍即使对一位素有经验的教师也是极好的助手。教授法书籍很好地解决了边远地区合格师资缺乏的问题。

商务印书馆的各种教授法基本采取三段教育法：预备或复习，教授新课，练习。现在可以找到张元济编的全套修身教授法和略短缺几课的全套修身课本，修身教科书教授法，每课的预备阶段，是非常精彩的，在每新课前总是把以前讲过的近似性质或同一人物的其他故事提示复习，甚至三五年前教过的也从不遗漏。

课文中引用古代或外国故事，总是详细注明

出处，讲清背景。不仅省掉了教师的翻检，而且很多偏远地区往往无书可查。这是商务的各种教授法共同遵循的原则。

在一九〇五年七月，商务印书馆出资创办了师范讲习班，作为辅助教育的一项社会事业。第二年除续招新生外，还附设了供师范生实习的附属小学。张元济和谢洪赉负责这所师范班的教学监督工作。前后两班，一共毕业学生八十人。这所师范讲习班后来停办了。停办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附属小学维持下来，这就是后来在上海以教学质量和设备有一定名声的尚公小学。

收效比较大的是在一九一〇年张元济和严复、郑孝胥、伍光建、夏曾佑、王季烈、罗振玉等七人联名发起的师范讲习社。

从一九一〇年张元济致高梦旦的信里我们知道这件事的真正发起人是张元济，其他六位当时是有名的“新学”界人，都办过教育，是“增重”。

师范讲习社是种函授教学，从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七年前后共办过三期，入学学生近九千人，遍及当时全国二十二行省，经考试合格毕业者一千九百六十余人，相对当时政府办的实效极小的师范教

育讲，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大的贡献。

办这种函授师范有一个客观条件。前面讲过清末师范教育的腐败，影响到小学教育质量，经过正规训练的师资极少，很多学校聘请秀才、举人、监生担任教员。秀才、举人还识些四书五经，至于监生，相当多是纳捐买来的身份，并无真才实学。另外当时办有相当一批简易师范，学制极短，并没有经过认真训练，因而小学师资水平参差。在社会压力下，清廷在一九〇九年公布奏定小学教员检定章程，规定学制在二年以下的简易师范毕业生和举人、秀才、监生都应通过检定试验合格，方能担任教员。师范讲习社主要帮助有志于教育事业而对教育学和其他新学不甚明了的人能有所裨益。课程重点放在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教授法和学校管理法上，其他史地、理化等一般知识性学科则教授概论。最后经过通信考试。

函授教育一般公认起源于美国。美国函授教育最早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西内敦（Shenandoan）镇，那儿有煤矿。一八八〇年政府规定井下工头要经过安全考试合格才能充当。镇上有一报社，适应这个规定在报上辟一角专栏，讲述矿工考试各个题目。矿工有不明了处可以去信询问。后来

扩充为煤矿专科，再进而迁移到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敦（Scranton），发展成为有名的世界函授学校。十分有趣，我国的函授教育也是从应付职业考试开始。

一九〇四年慈禧七十整寿，她搞了一个“恩泽天下”，以示“普天同庆”。其中之一就是在五月初八日“赦免”除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以外的“政治犯”；戊戌党锢各员，监禁和交地方官看管的，一律恢复自由；革职的，一律官复原衔。紧接着有人荐举张元济出任外务部、学部、邮传部、度支部各职，他都不愿意去。他懂得真正要办些事，到已经腐朽透顶的清廷的任何衙门都是不行的。他在七月初四日回复汪康年奉瞿鸿禨命，劝他重新出山的信里这样讲：“善化师拳拳于弟，至为可感。惟数年以来，自鏡稍明。如今时势，断非我一无知能者所可补救。若复旅进旅退，但图侥幸一官，则非所以自待，抑亦非所以对师门也。晤时如再询时，尚祈婉达鄙意。来书‘吾辈既为国民’云云，诚然诚然。然亦只能尽其力所能为者。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很明显，张元济拒绝到北京做

官。但是瞿鸿禨之于张元济另有一层关系。瞿鸿禨当年出任浙江学政，张元济科考取得参加乡试资格，瞿就成为他的“受知师”，“师命”是不能违背的。而且瞿鸿禨还保举他任学部左参议，在张元济思想中，教育“究于前途关系至大”，加以“学部奏调，函电络绎”，拖到一九〇六年年初，“允疾稍痊，即便就道。”同时讲清：“到京之后决不久留”。

学部刚刚建立，要管理全国教育的制度、章程。张元济到京后先到学部，从事了一些章程、制度的起草和建议，也审查他人起草提出的一些制度、章程。

他提出了在教育远远未能普及之前，学校经费不宜由捐税解决而应适当提高学费，由学费解决，使负担合理。政府筹集经费应用于开办新的学校，才能使学校普及。

他起草了各学堂毕业生待遇章程，提出实行学位，以博士、学士、毕业生等名号给予各级学校毕业生，而取消一九〇一年所规定的给予进士、举人出身的办法。

他提出全国各地各系统聘用外国人，其薪资应该基本一致。因为外国人经常单方面撕毁合约，到

工资高的地方任职，给一些经济困难和贫瘠地区造成困难。

其他诸如建议重视和使用我国大学毕业生、管理外国人在华所办学校、庙产转为学产、奖励私人办学等等都有所起草或建议。

不久，张元济调任外务部员外郎兼储才馆总办。他以“呈请备资出洋，藉扩闻见”为名，没有就任，离京回到上海，仍回商务印书馆编小学教科书。这次在北京前后不足半年。以后清廷虽然陆续发表过委他各项职务，实际都没有就任。

出国走走，增长一些见闻，早在戊戌年之前张元济就有这种想法。现在从事出版工作，藉此推进教育事业，那么外国的教育事业是怎样办的，能够做到“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亲眼看一看，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一九一〇年二月初六他出国，经新加坡、锡兰，入红海、地中海到欧洲，在荷兰、英国、比利时、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意大利、法国作了为期约半年的游历和考察。然后他到美国，又由美国到日本，从日本回到上海已是十二月中旬。这次在十一个国家主要考察小学教育普及情况，根

据现在能找到的当时报纸记载和他的一些书信看，这次考察的重心是盲聋哑教育、贫儿教育和初级职业教育。这是些涉及工农贫苦大众的生计、教育的问题，而在当时我国很少人关心过。

这次游历考察，他后来准备著文在《东方杂志》和《教育杂志》上发表，但实际上他只在《东方杂志》上以《环球谈荟》发了两篇途间见闻，关于教育考察所得并没有发表。因为他在一九一一年六月到北京参加中央教育会议等活动，写作计划被打乱了，使得我们不能了解他考察所得。但是有一封他在英国爱尔兰时给沈子植的信，里面很简单地谈到爱尔兰所见。素称贫瘠的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就有二千左右在校生，贝尔法士能造载重量四万五千吨的船舰，他感觉到实行义务教育的效果，国家实行义务教育只有二十年，就收到这样大的效果。他说："元济专察其初级教育之事，乃知仅言兴学，学固不能兴也。财政、警察、交通，无一事不相联者。"他懂得了办学是不可能离开其他条件而单独活动，需要其他条件。

这可以说是他这次远涉重洋，环球一周所得的最重要的收获。他原来认为我国的积弱是由于人民没有受到教育，无法理解，因而抵制朝廷的各项政

治。官吏的贪婪腐败，也源于教育。只要教育普及，伦理素质提高，必然是官吏廉洁，士民勤奋，于是朝廷一声号令，要做什么就成什么，国家强盛、人民富庶指日可待。现在懂得了教育受其他所制约。英国实行义务教育二十年而收大效，我国清朝政府自一九〇一年起空喊了十年“多办蒙养学堂”，政府连分文拨款都不给，他梦寐以求的普及教育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想到这儿他只能“为之浩叹。”

辛亥年清廷公布全国各级学校在校学生，1,284,965人，即全国总人口“四万万同胞”中的千分之三。

这点对于他在回国后，即辛亥年他的很多活动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对清廷开始转向抨击，尽管态度是温和的。他对辛亥革命一开始就采取了肯定的态度。

他在一九一〇年腊月中旬回国，第二年六月初出席了学部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议。张謇说：一九一一年五月下旬“学部唐〔景崇〕尚书奏任〔张謇〕为中央教育会会长，张元济、傅增湘为副”。当时张謇因为被上海、广州、天津、汉口四商会推他到北京请求准许组织代表团访美，在北京，能亲自辞

职，因为“再辞不获，乃许任半月”。张元济因为教育“事关公益”，他在给梁启超的信里讲因而“不能不摒挡一行”。

为什么开这次会议，当时有各种说法，都没有正式的书面材料根据；为什么请张元济参加主持，也没有正式的书面材料。只有一件报纸消息：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五日《民立报》北京专电：“监国（摄政王载沣）面谕枢臣：整顿教育、清理财政为当今急务。枢（此人即庆亲王奕劻）即面保许鼎霖、沈邦宪办财政，伍廷芳、张元济办学务。”四十个字的消息把两件事都说明了。奕劻是张在总理衙门时的“老上司”。

张謇只答应参加半个月会，后来也真只参加半个月就离开北京了。从傅增湘的日记看，他于会务不甚关心，并非天天到会。所以历时四十天的会议基本上是张元济所主持的。这个会作了十八条决议，因为很快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朝很快灭亡，这些决议都谈不上实行。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来自各地各方面，历时四十天，基本上是一次新旧教育思想的大交锋，对民国初年的教育制度发生了影响，因而还是值得简单地回顾一下。

会议共有提案六十五条，其中一部分是学部在

会前提出交议的，一部分是代表提出的，会议只讨论决议了十八条。十八条中被否决六条，提请实行十二条。

通过的十二条中，重要而有助于教育事业正常发展的，我看有四条：一、国库补助小学经费，二、国库补助养成小学教员，三、停止以实官奖励高等学校毕业生，四、改变小学教育方法。四条中前三条比较顺利地通过，关于改变小学教育方法，其内容是初小列手工为必修课，不设读经讲经课和实行男女同校。大部分与会者都主张实行男女同校，因为除了少数人口稠密地区有条件设立女校，绝大多数地区没有条件设立女校，不实行男女同校，女孩子将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但是也有人极力反对，以为初小男女同学有妨礼教。至于初小不读经，是推翻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奏定学堂章程中关于初小读经的规定，绝大多数与会者赞同小学不设读经课，守旧者对此攻击得更加厉害，林传甲在会上痛哭流涕，说小学生不读经要亡国。有个叫孙雄的，在会上逐条念《历代圣谕》中关于读经的上谕，根本就不许人讨论这个问题；孙雄还提出小学生不仅应该念四书五经，还要增加《尔雅》和《夏小正》。

中央教育会只是一个咨询性的会议，它通过的议案要学部认可后上报内阁（那时已有内阁）经摄政王载沣批准才能生效，特别是“国库补助”，白花花的银子从那儿来。张元济在会议结束后曾经为此做了一件与虎谋皮的“无效劳动”的事——他去见了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他向奕劻提出了一个“移买枪炮钱办教育”的要求。他指出，当时陆海军费占全国财政岁入三分之一，这么大一笔钱花得冤枉，实在属于不急之务。

他的这个主张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他对奕劻还有很多其他抨击，我们在下一章里再谈。

本章主要引用材料

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

《光绪东华录·二十七年——三十一年》

《东方杂志》：《论中国教育急图改良之法》

《Modern Asia Studies》16：3关于内藤湖南的文章

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记录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

T.W.Howerth：《函授教育史》

《张元济书札·致汪康年、沈曾桐、张謇》

张元济：《致学部书》

《教育杂志》第三年第七期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
《民立报》一九一一年正月
张元济：《上庆王书》

九

四条铁路

旧中国的铁路史就是帝国主义的侵华史。外国掠夺筑路权，不仅铁路本身能得到高额利润，铁路还是他们得以掠夺我国矿产资源和深入内地倾销工业品的重要工具，还把铁路所经地区划为势力范围。当时有人说："今〔侵华〕各国皆以铁路为割地之媒"（《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页500），还有人形象地把铁路两根铁轨比作剪刀的两个刀刃，所到之处国土被剪破。或比喻作一管子，所入之处人民膏血被吮吸殆尽。帝国主义的贪婪掠夺，清廷及其一部分官僚的买办性，在铁路问题上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人民的反抗斗争在铁路问题上也最集中。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参

加，使这种斗争的性质、手段和规模达到一个新水平。在二十世纪的头十个年头，张元济也积极投身于维护路权这一爱国反帝斗争。

从文献中可以看到，张元济从戊戌年间一直到解放以后，他始终认为"水利与民生有关，铁路为新政之要"（《续修滕县志序》）。他懂得作为国家大动脉的铁路对国防、国计民生、甚至教育的重大意义，国家要富强必须建设铁路。但他反对帝国主义涉足插手。现在人们都知道张元济在进入二十世纪后一心扑在出版事业上，却很少有人知道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路权，他也曾经和四条铁路有着关系。

在戊戌年（一八九八）六月十五日，光绪根据总理衙门奏摺下令组织矿务铁路总局，由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张荫桓兼理，张元济也在该局兼差。一开始大家以为这个局是戊戌新政，其实这个矿务铁路总局是根据大买办盛宣怀的鼓吹设立的。他主张"统招中国及各国股份，聘请总铁路司、总矿务司，〔其〕职分权力悉如总税务司。"企图把全国已开、未开的矿藏，全国已筑、未筑的铁路，地上地下，全部像海关那样完全置于外国人手中。这个鬼蜮伎俩很快被张元济知道，他无力反对皇帝已经

决定的事，但他可以不为之卖力，所以在八月三日致光绪奏摺中提出辞去这项兼职。

矿务铁路总局成立后不久，清廷颁布了铁路章程，名义上允许中国人可筹资自筑铁路，实际上便利了外国资本家。他们勾结我国一些败类，由他们出面组织所谓的“华商”公司申请筑路，譬如，一九〇二年龚心铭，次年由沈文孙和日本人勾结企图在杭州筑路。一九〇三年李明和外资勾结申请筑京张铁路。徐步清与美商勾结的闽赣路，丁宪章与美商勾结图谋浙赣路。陈日翔先与法国，后与日本勾结拟筑闽潮铁路。那位写《老残游记》的刘鹗和郑清濂起草有一份空白秘密合同，联合 豫皖 苏 三省“士绅”，愿意和任何外国人合伙办开封至浦口的开浦铁路，等等。

一九〇四年初，德商荣华洋行勾结浙江一些纨绔出面，以所谓华德商人合资，图谋铺筑由上海浦东起至浙江乍浦海口、乍浦至杭州城外湖墅的墅浦铁路。这个计划已被浙江巡抚批准。这项消息刚一见报，张元济就给“墅浦铁路”“总理”沈守廉一封信，晓之以理，指出：“洋股非不可合，而在我主权日削、外力增进之中国则不 可合，而 强 权自逞，凌厉无前之德人，尤不可与之合。”他以德国

强占山东为鉴，指出如果和德国合资，将“未见其利，先受其害”，劝他趁合约“将定未定之时设法拒绝”。还指出，如果华股的确已经筹集，可以将这部分资本“或兴工艺，或修农业。”他一面进行调查，知道确实是德商勾结无赖，假称“德华合办”，就请《中外日报》详细剖析墅浦铁路的不可办，一面缮发节略，揭露所谓“合伙”浙江“绅士”都是无赖：“其父祖均在，何以不由父兄出名？谓其父兄不与闻，则其事必不可恃；谓其父兄与闻而不肯出名，则其事尤为诡秘”。并运动浙籍京官设法阻止主管铁路部门批准。德商的计划落空了。

美资美华合兴公司，又称协丰公司，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在华的一个投资公司，他的代表人柏许（A·W·Bash），又称倍次，一八九五年就来我国活动，准备“修筑中国现在急待兴筑的一切铁路”（转录《中国近代铁路史料》页371）。他在福建受到日本的排挤后，想以浙江为中心先筑从杭州至衢州至常山到江西的浙赣铁路计划。一九〇五年初，外务部请他到浙江找当地士绅商量。柏许在浙江洋务道许鼎霖、沪宁路总办沈敦和陪同下，三月十九、二十四两天在上海和浙北平原各府在沪代表

人物会面，与会各浙人都拒绝了柏许的要求。张元济以嘉兴府代表的身份出席这次会面。

三月，驻杭美国领事照会当地政府，捏造说“前在上海会集浙绅，佥云建造铁路于本地大有利益”云云，并利用当时湖州教案要挟。张元济、汤寿潜、夏曾佑、张美翊四人在四月二十二日《中外日报》上发表公开信，驳斥柏许和美国领事的捏造，同时号召全浙士绅：集资自办浙江铁路，彻底阻止帝国主义抢夺浙江路权。同时指出：“以弟等愚见度之，事必有济，则食其福者，岂仅区区一浙江哉？”还提出“自愧绵薄，不能稍代贤劳，然果以华款办事，弟等虽不肖，亦断不敢如近人所讥之旁观派也。”

这个意见得到浙江人士的拥护，很快筹集了一定数量股款，成立了商办全浙铁路公司。七月二十六日商部根据公司呈文代奏，很快得到清廷批准。公司全名商办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简称全浙铁路公司。从一九〇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公开号召到筹集一定资金、制订章程、计划，到清廷批准，前后只花了三个月，可以说极为顺利。

既然是为了杜绝外国人在浙江插手，铁路公司不仅在名称上挂上“浙江全省”，而且在公司章程

中严格规定了不容外国人插手：第一，规定股票“均惟华人自购，不附洋股”（章程第四节）；“工程师先延华人，如须延东西国人，本公司当妥订合同，规定权限”（第七十二节）；“路工所须之材料，如有土产适用，价亦相当者，必尽数先用”（第七十七节）。这样的章程确有民族气概，与有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章程大不一样。

浙路公司的计划刚订好，英国公使萨道义（Satow，Sir Ernest Mason）照会外务部，请即议订已失效力的所谓英国承建苏杭甬铁路正约。苏杭甬预定线路正和全浙铁路的初期计划相同。

外务部对萨道义的照会不但不拒绝收受和据理驳斥，反而认为全浙铁路公司“侵犯”了怡和洋行的利益，马上发密函给浙江巡抚聂缉椝，命令全浙铁路公司另定线路，把杭州为中心的浙北平原的筑路权送给英国人，清政府的买办性是何等清楚！

英国对苏杭甬筑路权的提出虽然十分无理，因为他是清廷的主子，寸步不让。全浙铁路公司手中也有“皇上批的圣旨”在，“奉旨办路”。各阶层民众和江苏，特别是苏州商会也支持，这就形成了沪杭甬废约运动。浙江、江苏士绅要求清政府废除与怡和所签草合同，光绪在八月二十五日同意这个要

求。后来英国方面虽然一再施加压力，清政府一直不敢与英国开议正约。

在维护苏杭甬路权问题上，江浙人民团结一致，十分坚决。全浙铁路公司也励精图治，积极招股、勘探征地，筑路进程迅速。浙江巡抚在筑路问题上亦顺应浙江人民。外务部和邮传部知道硬顶解决不了，改用迂回的办法。用浙江人瓦解浙江人和拆全浙铁路公司台的办法。拆全浙铁路公司台的办法之一就是设法把张元济拉出铁路公司。三月二十八日，岑春煊以邮传部新尚书的身分打电报给张元济，请他到邮传部当官。四月三日瞿鸿禨向朱尔典交了底以后，就让岑春煊再以瞿的名义打电报给张，要他到北京。陈璧接岑春煊任后，又多次打电报，声称“必得而后已”。自三月一日至八月三十日，我们现在可以找到的记录和原报，就有十个电报。其间由瞿鸿禨、岑春煊、陈璧、于式枚等七个人游说“劝驾”，在晚清历史上实属罕见。并不是清廷求贤若渴，——请他出任一个并无实权的清闲差事丞、参。他们的中心是起码要张元济不管全浙铁路公司的事。因为他是以办事认真、讲究实效著名的。而全浙铁路公司，当时“该省绅商经营此路，不遗余力”，办事十分神速。一年多时间，自

手起家，嘉兴至上海一百公里铁路即将完工；杭州附近一段已经运行几个月了；剩下嘉兴至杭州一段八十多公里完成后，任何力量，任何理由也打不进浙江筑路了。

张元济当然能识破清廷这个阴谋，毫不为之所动。清廷拆破全浙铁路公司的阴谋始终不能得逞。

张元济先担任全浙铁路公司“股东代表”，即没有招够一定股额、未能召开股东大会前行使董事职务；后任董事。除决策公司大计外，征地遇有洋人“丁子户”，他出面交涉。

但江浙人士的努力并没有能收到阻止英国掠夺的预期结果。汪大燮六月接办谈判后，这个“明白人”提出了“借款、筑路分为两事”的办法。原来是英国借钱给中国，并由英国人来筑路和监督。现在江浙人已经自己拿钱出来筑路了，不管你有用处没用处，英国仍然要借款给中国，一应利息，手续费，好处仍然要付给英国，一文不少；路由中国人自己筑，包括“借钱”以前已经筑好的路在内，都属于英国的抵押品而由英国人来监督财务。新上任的外务大臣袁世凯很欣赏这个主意，英国主子也同意，九月十四日进奏，马上得到慈禧的批准。于是

已经告一段落的苏杭甬铁路废约运动重新起来，转为江、浙两省反对强迫借款的斗争。这场斗争当时称为“拒款运动”。拒款运动开始是浙江绅士王文韶、陆元鼎、张元济、庞元济、盛炳伟、陶克宽、冯丙然、杨晨江等一批人具禀，请军机处和浙江巡抚代奏：“懔遵浙路归商自办之前旨，深察不愿承借外款之舆情”。九月二十日以后，上海和各省团体纷纷集会和致电外务部，斥责并警告他们。九月二十三日马相伯发起了认股，接着发展为认股的群众运动，两省各府县，男女老小纷纷参加。个人认股数多的有十几万元，少的有寄宿小学生以节省菜金聚拢的钱。王文韶讲：“佣贩妇竖、苦力贱役亦皆激于公愤，节缩衣食，争先认股，举国若狂。”两省一共新招认股三千二百八十万元，是英国逼借的一百五十万英磅的三倍半。其中，十月初五日由张元济和周金箴主持在浙江旅沪同乡会召开的一次会，有一千一百人到会，共认股二千二百万元。张元济在会上讲述了这件事的利害，提出了三条意见：“一、力请清廷收回成命，二、叩阍（向皇帝请愿），三、江浙路事定见（按：定见，方言，表示非如此不可的一种极强的犟劲）由江浙人自办。”《北华捷报》的报导说，“参加这次会议的

人都表现了极其惊人的一致性和决心。”

这个拒款运动迫使外务部不敢和英方签订已经慈禧批准的借款合同。

后来外务部请江浙巡抚出面，邀请全浙铁路公司和江苏铁路公司代表到北京商议。苏路派许鼎霖、王同愈、杨廷栋为代表，浙路派孙廷翰、张元济为代表。代表们临行时向送行人保证，“事不成，誓不生还。”十月下旬到北京，和外务部大臣袁世凯、那桐交涉，提出“部借部还，与路无涉”等九条要求。起初袁世凯等一丝不肯退让，后来“事不成，誓不生还”的话传到了慈禧耳朵，她怕酿成大变，命令“无论如何为难，总须稍事变通，以顺舆情。”（《申报》，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三日）几经交涉，改为由邮传部向英商借款，再由邮传部将款子存储在苏浙两铁路公司，不仅不能以江浙铁路为抵押品，也不许国家以其他权益或收益作抵押，也不许英国人查账。除了借款利息等经济损失外，路权总算保住了。这就是拒款运动的大概。

上述四条铁路的保护和收回路权斗争，和当时其他各地掀起的收回路权、收回矿权活动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初步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开展的，反映了这个阶级力图挣脱帝国主

义压迫的枷锁，和对清朝政府的反抗。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资本的积集，推动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爱国运动。

收回权利运动之所以取得胜利，或因帝国主义之间在华利益的矛盾，或因有广泛的群众参加，或因其他地方抗捐，抗税和武装起义等牵制了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而有的“胜利”也是比较小的。这些，这个运动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不可能看到。

本章主要引用资料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中国交通史·路政篇》

盛宣怀：《愚斋存稿》

《张元济书札·致沈洁斋信》

张元济：《请中止墅浦铁路节略》

《浙赣铁路资料》

邮传部电报

《商部代奏浙绅筹资筑路摺》

《商办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章程》

墨悲：《苏杭甬铁路资料》一、二

《申报》光绪三十二年八月至三十三年二月

《中外日报》光绪三十二年八月至三十三年二月

十

辛亥革命时期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正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当时有些人已经感到这种变化及其深刻性。王韬就认为当时变化非常大。曾纪泽也说，当时的变化是五千年来最大的变化。丁日昌认为这次中西接触的扩大将引起千载未有的变化，是明代西方传教士进入所没有超过的那种变化。张之洞也认为是上古以迄当代，前所未有之变化。李鸿章称之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有这种认识而又有文字可稽的，在同治、光绪年间不下四五十人。后来当然更多，“三千年一大变化”，已是老生常谈。辛亥革命是这种变化的一个阶段。

辛亥革命前的十年，大致可以说是它的酝酿时

期。这十年间，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力量进行着组合、斗争、分化，新的组合、斗争、分化……。在这个十年里，张元济的政治活动、政治态度也有所变化，特别在游历十四国回来后，变化更大。

辛丑“新政”开始，曾经给一些人一种希望，很快人们就看透了“新政”的本质。海外的维新人士在一九〇二年底就开始抨击“新政”。如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二十二号上转载了《香港维新日报》的《论伪改革之证据》。黄遵宪的《驳革命书》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政”徒以“媚外人而骗吾民也。”在国内特别象受着革职处分的张元济，不能那样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们是完全能理解的。他用另一种办法。在一九〇三年初，把一九〇二年商务出版的《帝国丛书》中的《埃及近世史》单行出版，特意作了序。序言里以埃及的伊斯迈媚外政策为鉴，指出，“必有至诚恻怛之意而后可以言变法，必有卓立不移之慨而后可以言维新。否则未有不召乱而速亡者。”这几句话是在识透了侵华各国的侵略野心后而发的。他说：“帝国主义以推广势力为尚，故不妨逞强以凌弱，……他国崛起，有害于己之权利，则思有以遏抑之。遏抑之不甘，反而自新，欲师我之长以补其所短，则又思有以诱

惑之。至悟为诱惑，慨然于外人之不足恃，转而谋抵制之策。甚者，屈极求伸，欲尽恢复其已失之权利，则又思有以钤束之而摧残之。”又说帝国主义办事“苟可以利其国而惠其民，虽墟他人之子女，亦所不恤，盖悖理蔑义之行而为名正言顺也，久矣。”两段话在当时讲确是很深刻地描绘了帝国主义的一个侧面：他们不容许既得利益的减少，不容许被侵略国家自强；他们与东方国家的交往，都是海盗的掠夺。他从埃及沦落为殖民地的历史中感觉我国正面临着同样的危险，而清廷同伊斯迈的政策又非常相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都是以“可以得欧人之欢，来欧人之颂者，无不极意迎合；惟以不获盼睐为惧”，不知侵略者贪得无厌，“列国窥伺，长无已时。即事事受命，终必藉端生衅，以求遂其大欲。”

埃及曾经讲求新法，立法、自治、办学校、筑铁路，最后非但没有摆脱贫穷落后，反因此而外债累累、经济崩溃以至主权全部丧失。张元济认为埃及所搞的“洋务”，“不务其实而务其名，徒以为涂饰耳目、娱乐外人之用。未行之先不暇推究，既行之后遂无一不与国势民情相触”，因为清廷的所谓辛丑“新政”，正是缺少那种“至诚恻怛之意”

和“卓立不移之概”，即发愤的精神。“新政”，包括兴学校在内，积习难改，上下都是一种敷衍，并不能革陋立新，人民却增加了负担，国家增加了外债。清廷正走着和埃及沦亡前相同的路，不能不使人担心。当时张元济不可能洞察帝国主义的本质，但在这篇序里他对帝国主义不容许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愤起自强的描绘，已是非常精彩，在当时实属罕见。他知道自强之不容于帝国主义，觉得“至诚恻怛”和“卓立不移”是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他希望有这种新政。他想用合法的，和平的手段推进祖国，防止祖国的沦亡。他相信“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序《戊戌奏稿》）。我们不能忘记正统的儒家思想和几十年的动乱所给予他的影响。他充分地利用了新闻、出版工具。除了商务印书馆外，还有《外交报》和《东方杂志》。

《外交报》前面已简单提到过。《东方杂志》创刊于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正月，是旧中国连续出刊时间最长——四十五年，有相当影响的期刊。因为它创刊于立宪活动兴起的年份，有人说“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加强舆论的鼓吹，这年，有两家重要的立宪派报刊在上海出版，一是《时报》，是梁启超协助狄楚青创办的；一个是

《东方杂志》，是由出版业资本家、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创办的。夏也是立宪派，后来加入预备立宪公会。这两家报纸成了立宪派的重要舆论阵地”。（《中华民国史》第一篇上册第240页）。这个说法并不确切：《东方杂志》诚然有大量立宪内容，那是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后。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是政体的变化，张元济是因“上书妄图国事”的“罪名”革职的人，岂能随便公开议论。《东方杂志》是一九〇三年十月商务印书馆和日资合股后年底的一次编译所会议上由夏瑞芳所提出，要有一个“联络东亚”的刊物，所以命名“东方”，张元济赞同。刊物的章程第一条就讲：“本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当时日俄战争开始，我国舆论完全支持日本。尽管政府宣布中立，而“大臣中主〔亲〕俄者日以减，主〔亲〕日者日以增”（《东方杂志》创刊号社论）。创刊号三篇社论，第一篇是夏曾佑（署名别士）的，认为二千年来中日间或战或和不仅于中国、且于世界的关系极大，希望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不再来回变化，而以联日拒俄为宗旨。署名闲闲生的社论批评了政府的中立政策，提出对日本要“稍分尺寸之劳，以完此对于同洲同种之天职也。”都说明了这个期刊当初主要是

为中日关系而不是宣传立宪。

立宪运动经历了一个长时期，有几个阶段，有广泛而不同的人，以不同的目的卷入。要具体分析。正式算起是光绪三十年春，即《东方杂志》创刊后几个月才开始的，先是驻法使节孙宝琦等上折奏请立宪。到次年，官吏奏请立宪的渐渐多起来，重要督臣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袁世凯都以立宪上奏。《外交报》、《东方杂志》在这段时间，主要是围绕着抨击新政，反对外国人到处插手。《东方杂志》的社论，特别是时评栏，比较集中地表现了那些保路权、保矿权的态度。自然也会提到宪法的必要性。

二十世纪初开始，到了张之洞等一批官僚上书，在慈禧周围的一些倾向于略作变革的大臣以日本、德国等为例说服她，立宪后可以"君权永固"以后，这时候《东方杂志》才直接谈论立宪问题。

自从慈禧也要一个宪法以后，我国可以说举国上下都愿意要一个宪法了。只是各阶级、阶层、派别所要的宪法大不一样。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七月十三日，清廷颁发上谕，宣布预备立宪。在此前后资产阶级立宪派团体出现。在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郑孝胥、

张謇、汤寿潜等在上海成立“宪政研究公会”，第二年十一月一日，即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三个半月，这个会改名为“预备立宪公会”。又十个月后，即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向民政部呈报备案。这个会是宪政团体里成立最早、活动时间最长因而影响最大的一个。它的成员前后有三百多人，多江浙人士，多新式企业资方和退职官员。会长郑孝胥、副会长张謇和汤寿潜。另有张元济、王清穆等十多人为会董。张謇是这个会的灵魂。

这个会的宗旨，说是恪遵七月十三日上谕“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以预备立宪国民之资格”，以推广宪政知识为己任。它说“本会向以开通智识、使人人有立宪国民之资格为主义”，它前后出版过八九本讲解宪法、自治等常识的书籍。它举办过会员参加的国会问题研究会，定期讨论、编纂法律草案，提供会员讨论和当道者参考。曾经调查和编辑各国商法，供政府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份该会二百多人的会员名单中，我们发现有十四名会员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方和高级编辑，其中张元济、高梦旦、陆尔奎都是会董，孟森是会务人员，杨廷栋是该会联络工作的骨

干。这一点似乎可以解释自从光绪三十二年起到宣统三年止，商务印书馆集中出版各类政法书籍的原因。商务印书馆在这五年多中出版各国宪法、宪法介绍、各国民法、刑法、议院制度以及我国咨议局、资政院章程办法的解释以及讲解城镇地方自治的书籍达七十多种，其中《汉译日本法规大全》是八十册一部的大书。这些书有利于宪政的推进。我们承认宪政是清廷被迫逐步推行的。这些书籍的出版和发行有助于资产阶级了解和掌握政治法律知识、民主政治知识，和清廷作合法斗争，较之“人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至于在估价预备立宪公会的意义时，我觉得我们要把它和江浙人士争苏杭甬铁路路权的斗争联系起来：会的筹备时期正是全浙铁路公司和江苏铁路公司筹备的时候。会的领导分子正是两个铁路公司的领导分子。两个铁路公司集中全力进行的第一期工程，正是英国企图强占的苏杭甬铁路前端（全浙铁路公司成立后半年之内筑好了杭州到嘉兴的铁路；江苏铁路公司成立后马上进行嘉兴到苏州的路基购地，填土）。

清廷所谓预备立宪本是经过苦心筹谋才弄出来的应付立宪派的办法。到一九〇八年春立宪派各翼

联合组织了国会期成会，进行请愿活动。请愿活动持续到一九一〇年底。通过实践，立宪派越来越看清了清廷是“假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到一九一〇年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高潮之后，竟以赤裸裸的暴力对待他们，从此立宪派中许多人对此产生绝望情绪，提出“势非另易一办法不为功。”在绝望和愤慨之下，一些较激进的立宪派骨干表现出赞助革命的倾向。

我们在第八章里提到，一九一〇年张元济正在欧美考察，那次考察中他懂得了“仅言兴学，学固不能兴也”。原先他认为人民的知识不足，无法理解，因而抵制朝廷的各项政治，包括新政。所以他一直主张国民“姑且返求诸己”，“使人人有立宪国民之资格”的，而那年他开始转向抨击清廷，除了在国外看到的以外，清廷镇压请愿运动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原因。

他在十二月从国外回到上海后就着手筹备组织创刊《法政杂志》月刊。我们从十二月二十八日他给梁启超的信中可以看出，十二月十日左右他在神户见到梁启超时还没有这个计划。至辛亥年三月初，又积极筹组创刊《时事新报》。前者在二月出版，后者在四月二十日出版。

《法政杂志》有一个沈钧儒、林长民、陈叔通等二十四人的“编委会”，而是以陶保霖为主编。陶保霖，浙江嘉兴人，那时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作张元济的助手。他虽只是秀才而极有名。

在浙江《法学协会杂志序》里张元济讲述了他办《法学杂志》的缘由：因为清廷“近年所颁法令，其不利实行者，实不胜枚举”，而对此，“社会于法令之颁布尚无加以研究而纠正之。”有些法令之不合理并非起草者无知，是“政府意旨所在”。刊物有责任纠正和指责。刊物揭露官吏错判，“可以防止官吏曲法之害。”《法政杂志》将“上助宪政之进行，下为社会谋幸福。”

《时事新报》是张元济和高梦旦等合资创办的，请汪诒年主持。汪诒年是著名的《时务报》经理汪康年的弟弟。光绪二十三年汪康年同时办《中外日报》，就是汪诒年主持。光绪三十年《中外日报》亏蚀，几至殆尽，难以支持，张元济和夏瑞芳投资维持，订明一切笔政仍由汪诒年主持而不加干涉，可见他们的志趣极为相投。

至于《时事新报》就更进一步，在禁止组织政党的年代公开提出是为了建立政党而办这张报纸的。在此之前“有志于组织政党者凡数起矣，而结

合似亦不固。为党员者似亦可出入，与寻常泛泛之集会无大区别。”他们认为政党的成员应该有相同的政见，才能组成巩固有力的团体，而政见是否相同首先应该交流。

交流政见用日报而不用习惯用的期刊形式。他们说了，期刊讨论旷日持久。他们嫌以往报刊“多政谈而鲜政策”，现在当然要多论政策。那时政策一词的意义是指行政计划。报刊谈论政策是要造成舆论干预朝廷决策。从《时事新报》的创刊宣言所附的征文题目里，清廷刚刚宣布的“铁路国有问题”，处在极显目的地位，也就懂得他办报纸的目的了。

张元济对当时的报界的状况极端不满，也是自己办报的一个原因。他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三日致书汪康年，就批评汪办的《刍言报》“稍偏于旧派一面”；同时曾给梁启超信，不满意当时报纸都为个人政见服务。

五月十七日，学部尚书唐景崇奏任张謇为中央教育会会长，张元济、傅增湘为副会长。会议的大概已经在第八章里讲过。他因为觉得清廷还在“谋教育之改良”、“所拟章程未必尽是，而用心尚属可嘉”。那时他还不能和清廷决裂。

在会议期间，他去见了庆亲王奕劻。

上一章里，我们提到张元济在北京参加中央教育会期间，曾去见了内阁总理大臣奕劻。除了提出“移买枪炮钱办教育”而外，张元济还在奕劻面前批评了清廷自宣布预备立宪以来三年间所“行新政，大都有名无实。”指出清廷所谓新政，是种“敷衍粉饰之计，病国病民，莫此为甚。朝廷亟宜下诏罪己。”——直截了当地要朝廷承认错误。指出三年来虽名为新政，上谕、法令公布极多，而独独没有宣布取消旧制，以致“新旧杂陈，两不相容，必一无所可。”

他批评是温和的，和当时群众有一段距离，至少在铁路国有问题上，一进入六月，湘、鄂、粤、川的保路运动已经相当深入，而他还停留在“收回官办，然不可不清还商本，以免国家攘夺商利之嫌”。

清廷的镇压，保路运动很快发展为武装革命，武昌起义爆发了。

八月十九日武昌新军起义。二十一日起义消息传到上海。二十三日，张元济通知商务印书馆各部门，除掉英语和汉语读物外，其他一切在编、在排、在印书稿全部停止进行。是对政治形势的估

计。二十七日，他和高梦旦一起，要蒋维乔、庄俞、王云五（这位和后来的那位是同名同姓）立即收集材料，编写出版辛亥年粤、鄂、川三省革命纪。接着又编写革命党小传（均见蒋维乔日记）。如果我们考虑在八月二十七日，除了武汉新军在孤军苦战，还没有第二个起义城市的话，组织编写三省当时革命史实，同时还出版其他有关书籍，表明他已和清廷决裂。九月下旬，他出席了各省都督代表会议。所以有人说他对辛亥革命能否成功持观望态度，是毫无根据的。

武昌起义的炮声唤醒了全国人民。最先起来响应的是湖南。九月一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为首发起了长沙起义。武昌起义后的一个月里，内地十八行省中便有十四省举起了义旗，宣告独立。九月二十一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通电各省都督府提议召开临时国会，建议实行美国联邦制，商议选举外交代表、各省军事行动联络方法、对清皇室的处置方法。这件事的策划者是江浙立宪派首领张謇和幕后人物赵凤昌。他们二十一日和庄蕴宽、杨廷栋、沈恩孚几个江苏立宪派骨干商议后决定，再给江苏都督程德全电报请求追认，以两人名义发出。在赵凤昌个人保存的文件卷

第一〇七册里找到了这通电内容一字不易的原稿。原拟名《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以樊增祥、宋教仁、于右任等十九人为发起人。十九人名单中有张元济和高梦旦，张謇、赵凤昌当然也在内。另外，第一〇七册第一件是一份有二十二人名字的名单，名单中有张元济、史量才等。

这个名单的性质不明。严独鹤在《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闻界动态》中提到，武昌首义后，“各省从政治上进行活动的代表人物集于上海，开会地点在赵竹君家，即惜阴堂，成为讨论国事的会场。会议内容都是有关全局的大事件，如国体问题。参加会议的人，从那时到会签名来看，其中有赵竹君、张季直、汤寿潜、张菊生、黄任之（签名用韧之）、温钦甫等，史量才也是经常出席的一人。”严独鹤显然根据赵凤昌保存的文卷推断的，但把事混淆了。有人根据严的这段文字，来论述张元济，未免失实。赵凤昌参与的是上述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代表会“借上海西门外江苏教育总会为会所”，（见《民立报》1911年9月24、26、28日消息）至于赵凤昌家里，是张謇住在那儿，两人密谋（见《啬翁自订年谱》《张謇日记》），两处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一是“阳谋”，一是“阴谋”。至

于名单，原件上有“字”的都用字而不用名，且是一人笔迹；而且当时名单上人汤寿潜、姚吾刚、岑春煊、宋教仁也不在上海，汤寿潜本身是都督，不参加代表会议，此件非“到会签名录”可想而知。

赵凤昌处另有九月二十六日晨汤寿潜致赵信，其中讲“大局岌岌，公与诸老左右之，直得逍遥事外，颇妒之也。致菊老函抄尘大察。”所附汤复张元济信，谈在会上应取之基本方针。可见汤与这个“事外人”赵凤昌的关系要比与张元济深。张仅是作为姚梧刚的代表而已。开了两天会后他坚决辞掉。

刚才已经提到，上海的都督代表会议却是张謇和赵凤昌一手策划的，他们想以先发起的身份把新政权的筹建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在二十二日江浙代表的提议里这种企图十分明显。他们规定“各省旧时咨议局”和“现时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企图把以前的咨议局联合会代替所谓都督代表会议。规定“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可以强制后来的多数追认先来的少数。当时袁世凯已经从清室接收了全部权力。从辛亥五月张謇访袁世凯于洹上后他们一直联系不断，张謇发起各省都督代表会的真意还在袁世凯那边。张謇不仅不避讳这个目

的，还始终宣传这点。他也是二十三、二十四两天会议的参加者。我们没有找到那两天的会议记录，但从赵凤昌藏札和《张謇日记》、《啬翁自订年谱》里可以看出他是会透露这个目的的。其他立宪派人可以接受袁世凯，张元济不会接受。这不是一个戊戌党锢人员对袁世凯的个人恩怨，而是他正直的性格就难以容忍两面三刀的叛卖行为。他始终认为国家因为戊戌变法夭折而遭受了一系列事变，不甘心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与此有关的人，极合乎情理。

张元济在认定一个目的后总是一往直前去做，从不计较个人利害。如果碰到合作者中间有"反对派"无法说服的时候，他宁愿离开，决不违心迁就伙在一起。他在二十六日给浙江都督汤寿潜电报，辞掉代表职务。汤寿潜虽然函电交催恳求他继续与会，他毫不为之所动，他在复电里说："千言万语，非笔墨所能尽达，公明眼人，想亦无待弟之赘也。"——会议里有一个明眼人能看出的问题所在。

另外，都督代表会议提出了仿照美国大陆会议的办法来进行联合的磋商，也使张元济忧心忡忡。当时独立省份集中于东南，这种联合有和广

袤数千里的北方、西北分裂的危险。他历来主张保持我国领土的完整和消融一切民族歧视压迫。远在一八九九年冬，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来我国“考察”时游说东南十省独立，他就坚决而委婉地拒绝了这种“好意”。他说，他同意内藤的看法，如果南方不负担北方，它确实能够很快地富裕起来。但是他说，他不能想象，在中国，谁愿意脱离或独立。后来内藤离开的时候他特意送内藤一首诗，告诉他东南半壁是和北方、西北唇齿相依不可分离。这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维护国家统一和争取统一的民族市场的进步要求。

历史不能总如人意，常有曲折。辛亥革命的果实终于被袁世凯篡夺。袁世凯一开始就视民国为私产，独断专行，排除异己；英国军队藉口护侨入藏，久久不退；俄军侵占伊犁；六国银行团提出监督财政。清室虽退位，内政外交一仍其旧。张元济对这一切十分悲愤。当时梁启超准备回国，和朋友们作了书信接触，很多人赞成他回国，也有人反对，张元济是其中之一。他在民国元年阳历八月二十五日的信里建议梁启超不必急于回国，还在信里向他倾诉了这种悲愤，说神州“设竟陆沉，宁勿悲痛”。

往從吾兄周年祭去年六月從秦帥與
弟通訊後數及一載世事滄桑々十後可談
故人々而通音問乃前月七日
書開緘捧誦為之嗚咽吾輩誠不能早
從且看子孫從生其間設竟陸沈痛切心
痛發於萬々士不為之中思所以拯救之策
都忘殆非濟以武力不能使十年以前吾
輩早廁身於古官善據則今其器能

弘衍少年馳驅角逐事，飛上雲而乃為雲
一旦墜羽來此，陸沈數次，每趨之晚相同
今亦歸隱，偕為我代達問
吳思歸甚切，去國十餘年，而下筆多難着
懷鄉土，當代志情，然而窮以為出早發
似亦隨之矣，不揣良陋，輯史集日大難哉
然有用之身事
著自繁重
弟 張元濟
八月廿四

他在国内问题上一直主张“和平改革勿伤元气”，这时也有了新的变化。他认为中止这种局面，非以武力不可：“殆非济以武力不能。使十年以前吾辈早厕身士官学校，则今日亦尚能与诸少年驰骋角逐。事非竟不可为，而今已矣！”——他已经四十六岁了。

次年，袁世凯赶尽革命党人，由参加戊戌变法的熊希龄组织所谓“人才内阁”，熊请张元济出任教育总长，他当然不会为袁政府服务的。

本章主要引用材料

《埃及近世史·涉园主人序》
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戊戌奏稿》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篇
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下册
《东方杂志》第一卷至第八卷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孙中山自述》，载于《Revolution of China》，1912年，商务印书馆
《预备立宪公会报》第1—11期
《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录，职员录》
《郑孝胥、张謇等为设预备立宪公会致民政部禀》

《张元济书札·致梁启超》
《外交报》1904年
《法政杂志》1911年
《时事新报宣言》
《民立报》1911年正月十六日北京专电
张元济《上庆王摺》
蒋维乔日记，辛亥年
《赵凤昌藏札》第一〇七册、一〇八册
《张謇日记·辛亥年》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辛亥年》
张元济：《在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上的致词》
侯宜杰《袁世凯的一生》
《辛亥革命材料·汤寿潜、张元济辛亥九月往返电》
《Modern Asian Studies》Vol.16：3
丁文江编：《梁启超年谱长编》

十一

夏瑞芳之死

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我国开始使用阳历，张元济在他的书信、日记里也都使用阳历，这本小书从这儿开始也就用阳历纪月日了。

民元开始，出现了中华书局。一开始它就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劲敌。当时出版业里资本超过十万元的不少，像张謇、沈恩孚的中国图书公司；商务的资本是八十万，实际财产超过一百万。中华书局开办时资本只有二万五千元，为什么一开始就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劲敌呢？中华书局有一个极强的班子——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得力干部。

中华书局的创办发起人陆费逵，字伯鸿，号少

沧，浙江嘉兴人。他和当时的新派人一样，也是幼学诗书，以后自学史地、算学、外语等新学。1905年他在武昌参加日知会，担任评议员。后来和张汉杰等办《楚报》，任主笔。不久《楚报》被封，他逃到上海，任昌明公司支店经理兼编辑，后进文明书局。因为参加上海书业商会活动，和商务印书馆高梦旦接触，高欣赏他的才能，1908年聘请他进商务，在编辑所国文部工作。后来陆担任编译所出版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和讲义部主任。商务印书馆兼任几个部门和杂志主编的人，都是极受重视的。高梦旦知道陆费逵不甘久居人下，于是由他作主把他大哥凤歧的幼女君珈嫁给陆费逵，想让他好好在商务工作。辛亥革命后，陆联络沈知芳、戴克敦、沈颐、陈宽等五、六位商务的得力中层干部和高级编辑，白天继续上班，晚上集会筹组中华书局并且进行书稿编写工作。一进入民元，他们向商务辞职，亮出了招牌。这几个人不仅能干，“行当”齐全，而且深知商务印书馆的特点和弱点。所以中华一成立，商务高层里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纷纷责怪高梦旦，当初不该把陆费逵引进商务。只有张元济知道高梦旦一心为商务，劝大家不要责怪，说“梦翁失算，赔了夫人又折兵，不必多所责

备。”

商务印书馆截至辛亥年，虽然共有出版物近千种，但主要依靠大量发行的小学教科书。中华书局一开始也出教科书，但它并没有像蒋维乔后来所说的“暗中预备全套适用之教科书，……民国元年，中华书局突然成立，〔适合〕中华民国之各种教科书，同时出版。”我们从一九一二年的《申报》上商务、中华两家宣传小学教科书的广告可以看出，中华先出《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不久商务出《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第一册。很快商务出的新课本种数就超过中华的种数。教育部在一九一二年元月十九日通令和三月六日通电里有关于民间通行教科书的处置办法，商务原来的《最新教科书》属于可以继续发行的。教科书有它的继续性，我们在第七章里也谈到，在《最新教科书》里并没有忠君思想，也没有尊崇清朝廷的文字。所以中华教科书本身并没有使商务感到狼狈。多一个竞争对手总是好事。

民国元年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并没有象有些文章所说因为中华书局的出现而没有销路。民国二年四月商务印书馆股东年会，董事会报告民元以来营业，提到现有机器设备不足，至“去今两

年教科书销路稍畅，即有供不应求之患。各省分馆及同行函电添书，日必十数。不得已兼开全夜工，已历数月。即以教科书而论，尚缺其半，学校生徒停课已待，责问频来。”民国二年初，“因小学教科书销路大旺，印出书坯假如上海现有之装钉作坊尽钉本馆之书尚难济事”。股东会决定原有资本八十万，升值四十万，再招三十万而为一百五十万。这些都不是教科书没有销路的迹象。

相反，教育家吴研因在《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一文中说：“民国元年，中华书局崛起，发行一套《新中华教科书》，这套教科书，文字反不简明，虽然因为政治的关系，很被小学教育界采用，但是不旋踵就自然消灭。”

最头痛的是商务有日股这件事被揭露，正打中商务竞争中的弱点。辛亥革命，民族自信心提高。

沈知芳是一九〇三年和日方同时投资的股东。商务规定得力职员可以投资，陆费逵、沈颐、戴克敦等因而都有股份，尽知合资底蕴。

商务印书馆有日股，在有些地方成为推销教科书的障碍。商务董事会在给股东的关于清退日股的报告中说：“近来竞争愈烈。如江西则登载广告，明肆

攻击；湖南则有多数学界介绍‘华商自办’某公司之图书；湖北审查会则以本馆有日本股，故扣其书不付审查。”每遇到一次抨击，商务当轴必须费无数精力口舌向有关方面疏通、周旋。不仅精神上痛苦不堪，而且对正常业务分心、掣肘也太多。所以在民国二年初即作了收回日股的准备。前面提到的民国二年股东会提议新添三十万元股东，高梦旦说“公司现在并非无钱而添股”，钱是准备偿付日本股东用的。九月，董事会正式议决收回日股，十月派夏瑞芳到日本，和日方股东磋商。

我们在第六章提到了一九〇三年商务印书馆和日本金港堂合资的事。商务印书馆和金港堂合资各出资十万，订明“用人行政一律归华人主持，所有日本股东均须遵守中国商律。”开始时中日各二名董事，随着中国投资的增加，三年后董事改为中三日二，再改为中四日一，从宣统元年（一九〇九）起，日方不再担任董事。

商务印书馆的创业人高凤池说：“自从与日人合股后，于印刷技术方面确实得到不少的帮助。铜版雕刻、黄杨木雕刻、五色彩印，日本都有技师派来传授。”商务虽然一开始就对技术讲究，乐于使用先进技术、设备，但在中日合资前，它始终只能印

单色凸版印。到收回日股时它已经是国内技术最先进的凸版、平版、凹版印全能印刷厂。

夏瑞芳到日本和日本股东商议后，日本股东同意退出商务印书馆。十一月，派代表福间甲松到上海商议退出的条件。经过双方商议，在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元月六日签订了清退日股协议，条件是多付日方股本的21%，近八万元，作为账面资产价值低于实际价值的补贴。也就是说日方十年内共投资十五万元，除历年分得官余利，有过一次升股，收回时得到四十五万，增值三十万元。

商务印书馆与金港堂的十年合作，经过实践，应该说是互利的，成功的。中日双方资本家都得到了经济利益，商务的业务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印刷技术、机械设备有显著提高、充实。

香港《大成》杂志1982年林熙连载文章说："本来一国的人民和另一国的人民合资作生意，只要它经营的不是犯法的勾当，都得到当地政府一视同仁，受法律保护的。""商务印书馆和金港堂合作，并没有不是。金港堂并非一个侵略机构，只是商业机构，国人要分别清楚，不能受宣传影响而盲从的。"

在受人欺凌的旧中国，商务印书馆和外资合

作，并不因此受束缚，最后在日益兴旺的时候把外资全部甩掉。一九二二年杨铨在《五十年来之中国工业》中这样说过："有人以该馆曾用日资为病。不知中日合办之实业甚多，能如该馆之出淤泥而不染，卒收回自办者，何可多得。此正该馆之不可及之处也。"

一九一四年一月六日退清日股协议签字，一个竞争中的难题解决了：商务印书馆也成为"华商自办"了。

一月十日报纸上登出了商务印书馆"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购回"的广告，一场收回日股的公案方告结束。不料当天傍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在上海河南路发行所门口突然被人暗杀。枪弹从左肩背进入，从前胸斜穿而出，正中心脏，还没送到医院就停止呼吸了。夏瑞芳年仅四十三岁。这是对商务印书馆的严重打击。

因为夏被暗杀和收回日股广告凑巧在同天，社会上颇有误传。据我们所知，夏的被暗杀和收回日股毫无瓜葛。

夏瑞芳是下班离发行所走出大门，上马车时被刺的。马车夫胡有庆正在旁边，就大声呼喊，追捕凶手，凶手被前方警察抓住。凶手叫王庆余，又叫

王庆瑞，山东人。凶手供认是由周栖云所指使。凶手在二月二十日下午被处决。《申报》一九一四年元月十一日至二月二十二日的本埠新闻版有详细报道。我们从张元济日记中知悉，周栖云到一九一七年七月十日才捕获。租界工部局问商务要马车夫胡有庆的下落，以便对质。张元济不主张追查，说："千万不可告知，只言现在不知去处。此事于粹（夏瑞芳）无益，于粹夫人有损，于公司亦有损。千万不可游移。"

传说夏瑞芳被杀前几天收到有勒索巨款的恐吓信。被杀后上海富商丁汝霖也接到恐吓信，说是民国二年夏天丁不应该和夏一起拒绝陈其美的摊派。

既然没有追究唆使犯，传说的一些被杀原因都只是传说而已。当时报上也以"局外之谈助"的标题报道这些消息。好在我们所研究的夏瑞芳之死，是这件事使张元济失掉了事业上的重要助手所带给他的麻烦。

商务印书馆在我国文化事业上的贡献当然不是张元济一个人的功劳，是无数人共同劳动的成绩，其中在时间上长久和重要位置上的助手是夏瑞芳、高梦旦、陈叔通、王云五。

夏工人出身，有胆识、有事业心而气度又大，

工作能力和活动能力都极强。他尊重张元济，遇事不掣肘而支持他，使张元济的很多计划能够实现。从办《外交报》到清退日股，十多年间无事不支持张元济。商务印书馆的成功，有一位识潮流的张元济在稿件组织上的认真负责外，没有夏瑞芳在印刷、经营上的配合也是难以想象的。

夏瑞芳个人在一九一〇年初因为参加橡皮股票投机失利，损失十万余元，接近破产，所以打不起精神来办事。张元济写信给日本股东，说鉴于夏对商务发展的贡献，建议由中日老股东个人分摊这份损失，使夏能有兴趣安心为商务工作。日方原则上接受了这个意见，以低息贷款的方法间接承担了这笔损失，这也是夏极有功于商务的一个证明。

有人说："如果不是张元济这样好的知识分子来主持出版，只靠夏瑞芳、鲍咸昌、高凤池等出身于排字工人阶级，商务未必会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机构。"这诚然是对的。但反过来也是不会成功的。文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就是例子。而据后来参与商务最上层活动的人回忆说，张元济先生每逢事情不顺手的时候总要唉气，想到他们（夏瑞芳、高梦旦）死得早。

接着，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推选张元济当总

经理，他拒绝了。因为这个职务要和政府打交道，他早已打定主意“名不入公门”，不和这个政府打交道。于是改推印有模为总经理。两年不到，印有模病故，总经理一职由高凤池担任。张元济任经理，兼编译所长。我们从张元济的日记上可以看出，从此，他把相当大的精力从书稿的组织转入到经营管理，一般书稿组织完全交给了高梦旦，他只顾问重点书稿。

高凤池多虑而寡断、徇情面、吝啬，“局面”不大，和张元济、夏瑞芳的性格正相反，而且脾气别扭。原来张和夏共事如鱼水，现在和高相处，意见不同又不能决裂，经常要以隐忍两字强压自己，他是个性极强的人，非常痛苦。只有许夫人知道，他回家后叹气，今天必定碰到不顺手的事，又在想念死去的夏瑞芳。

本章主要引用材料

《中华书局七十周年纪念·中华书局七十年大事记》
蒋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
《申报》一九一二年、一九一四年一、二月
商务印书馆股东年会民二年报告书
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中国出版

史料补编》）
商务印书馆民三年股东特别会报告书
高凤池：《商务创业史》
林熙：《从张元济日记谈商务印书馆》（香港《大成》106期）
杨铨：《五十年来之中国工业》（《最近五十年》，1922）
《张元济日记》一九一七年七月；一九一八年二月
《访问俞明岳记录》
张元济致原君信
张树年一九八二年谈话录音

十 二

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

夏瑞芳同张元济的关系如鱼水，夏瑞芳的气度，从当年商务准备购买皕宋楼藏书这件事足以说明。

清代藏书家陆心源，曾办理过福建盐政，搜括了不少钱。乘时局动荡，书价便宜，收购故家藏书。他有书十二三万卷，其中近百部宋元版书，另有元明版书误定为宋版的几十部。宋版之稀贵，我国藏书家的历史上罕有超过一百部宋版书的私人藏书家。所以他将保藏这些宋版书的地方叫“皕宋楼”。意思是藏二百部宋版书的地方。陆心源去世后，他儿子陆树藩不能守业，要卖书。日本人闻讯后，仅岛田翰一人就多次到皕宋楼翻看。岛田翰看到这批书实在太稀见，决心使这批书流入日本。因为

索价太高，开始没有成交，他回日本去找买主。夏瑞芳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向张元济表示愿筹集八万银元买这批书。当年商务印书馆实际资本只有四十万零三千元，因为营业好，资本周转率极高，按当年实际计算，资本年获利率是73.8%，用资本的五分之一买一批善本书放着，从经营上讲是没有理由的。张元济亲自去找陆树藩，陆坚持起码要十万元。张先生答应马上设法再筹款，并特别晓以大义，叮嘱千万不要卖给日本。他先力劝管学大臣荣庆拨款购买，由筹建中的京师图书馆收藏。荣庆毫不理睬，张只能自己想法。时为一九〇六年。等商务筹齐款项，陆树藩已经以十万零八千元的价格，通过岛田翰把书卖给日本财阀岩崎的静嘉堂文库了。当次年夏，皕宋楼的书运到日本时，日本汉学家惊喜莫名，岛田甚至说这是日本一大胜利。张元济等人虽然没有能阻挡住这批书的流出，但这件事足以说明他们当时求善本的着眼点之所在。

张元济当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以后，为了编译书稿的需要，陆续购置一些图书。随着出版物品种的增加，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年又创刊了《绣像小说》、《东方杂志》等几种期刊，就要较多的书刊资料来保证质量。前面讲过商务印书馆自张元济参加以

后，出版物比较讲求内容质量，舍得花钱买书参考。在《张元济日记》里随处可以找到这类记载。日积月累书籍多了。一九〇七年上海闸北宝山路总厂落成，这些书搬进编译所三楼，就成为一个图书馆。一九〇九年，图书馆起名叫涵芬楼。

涵芬楼以收藏古籍善本著称。由于集中收购了几个藏书家流散的藏书，精品不少。前后收进四笔大宗藏书：绍兴徐氏熔经铸史斋、太仓顾氏謏闻斋、乌程蒋氏密韵楼和扬州何氏。此外秦汉十印斋、意园、持静斋等等的藏书散出时，涵芬楼都买得其中善本、精品数十百种。缪荃孙、蔡元培、伍光建、胡适都代为介绍购买过。傅增湘当时在北京，张元济和他交往极深，讨论版本、托买古籍之来往书信极多。张元济和傅增湘这两位著名的版本、校勘家的书信，不仅记录了涵芬楼部分古籍采购时的情节，而且"胪版刻之源流，举文字之异同，……所采者皆前人未见之书，故其论定者，多千古未发之覆，阅之关开节解"，是版本校勘学的重要著作。一九八三年商务印书馆将搜集得的张、傅二氏自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七年间通信六百二十二件编辑出版，书名《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对版本学和辛亥前后古籍聚散感兴趣的读者不妨翻翻那本

书，这儿就不作介绍了。

涵芬楼所藏善本，主要在一九〇六——一九二四年九月购进。当时帝国主义除政治、经济、领土外，还掠夺我国珍贵文物。从敦煌石窟所藏的唐代写经、早期印刷品、壁画，一直到新疆沙丘挖出的文书，皇家宫苑的珍宝、秘笈、名人字画，出土的铜器到殉葬明器，件件都是帝国主义者所觊觎。他们抢、骗、偷盗，无所不用其极。罕传古籍也是他们所垂涎的。清廷及北洋军阀对各界人士吁请保护文物的呼声不闻不问。（一九一五年底，宁波卢氏抱经楼藏书将散，傅增湘曾建议袁世凯拨款收购，拨交京师图书馆，以免散失。袁世凯也不予理睬）许多爱国人士只能破产竞买，以阻止珍贵文物落入侵掠者手里。商务印书馆花那么多钱买善本书，编书参考固然是，但不是主要目的。胡适，一九二一年七八月间在商务印书馆考察，七月十九日日记上记载，他在涵芬楼看到“善本书颇不少，不能细看，今天见的有一部黄荛圃藏的宋本前汉书二十册，价二千元。其实二千元买一部无用的古董书，真是奢侈。”这说出了另一面，即编书用不到这种珍本，编书，三元钱一部石印本前汉书是够用了。说明涵芬楼收购这些书相当大的一个原因是为阻止帝国主

义文化掠夺尽一分力。张元济认为保存文化，不使湮灭，“事关国脉，士与有责。”缪荃孙在负责筹备江南图书馆时，主张图书馆只要买些通行书就可以。张元济在给缪荃孙的信里说：“难得之旧本，若无公家之保存，将来终归澌灭。”缪荃孙接受了他的意见，并抄录王夫之《儒统论》一篇，勖勉有加。

涵芬楼藏书日益增多。一九二四年五月在宝山路总厂对面专门为它建造的占地二千六百平方米的五层大楼。将涵芬楼的藏书全部迁入。一九二六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三十年，作为纪念活动之一，经张元济提议，董事会决定，将涵芬楼改名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为社会服务。善本书藏于三楼，仍名涵芬楼。

张元济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倡导者之一。我国公私藏书事业虽然发生得很早，也非常发达，但都秘不示人，传统以藏为宗旨。虽然远在北宋就有人愿意将藏书供给他人阅读。如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记述了庐山李公择把书存放在寺院里，供他人阅读的事，但终属少数。清末同光之间，西方近代图书馆的一般常识传入我国，虽有人宣传，并无人实行。十九世纪九

十年代末，有些学堂有以用为目的的图书馆。但他们都不叫图书馆，或称藏书院，或称图书院，而且仅限学堂里的人阅读。前面第二章里讲到的张元济等人办的通艺学堂，他们一八九七年，有《通艺学堂图书馆章程》十二条。第十一条规定非学堂人员亦可借书。他们是我国有文字可据，使用“图书馆”三字最早和实行对外开放最早的图书馆。

一九〇九年，张元济在给版本目录学家缪荃孙的信里讲，他“劝商务印书馆抽拨数万金收购古书，以为将来私立图书馆张本。”可见他早就打算办一个公开的图书馆。

商务将图书馆开放，既不影响自己使用，又可取得社会声誉，增加与同业竞争的力量。

涵芬楼的、也是东方图书馆的藏书除善本多以外，地方志齐全也是它的特点。地方志收集始于一九一五年《辞源》出版之后。当时，为了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中国人名大辞典》，需要从方志上找材料，便广事搜罗，不仅上海就地收购，各地分支馆也协助搜罗。到一九三一年，已有方志二千六百四十多种，二万五千六百册，其种数之多，当时国内外无与匹敌。二十年代，有些地方修订地

方志时，要找旧版地方志参考，大都到东方图书馆借抄。

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的藏书，除了保证商务编辑工作的参考外，从一九一六年开始还进行影印。商务利用这些善本，配以国内其他公私收藏，再加从日本拍摄回来国内已失传图书的照片，陆续影印了《涵芬楼秘籍》、《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在为古书续命，使宋元善本以及精刻名抄得以传布而免至湮没，为研究人员提供原刻原抄方便研究工作等方面，其贡献是人所共知的，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应予表彰的一件大事。

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张明养同志回顾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年代时说，商务印书馆是一个培育人才的大学校。他说："一个培育人才的大学校，至少要具备两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一是拥有学有专长的热情的导师，二是有做调研工作所必需的图书资料设备。除了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外，商务编译所在这两方面都有它独特的有利条件。"他所指的图书资料，就是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的众多的藏书。沈雁冰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在商务印书馆不为利不为名，只贪图涵芬楼藏书丰富，中 外 古 今齐全，借此可读点书。在他给他母亲的信中也谈到涵芬楼藏书丰富，

便于研究学问。叶圣陶说，商务培养出不少人才，除了他们自己的勤奋外，那么多中外古今齐全的图书也是一个条件吧。

旧中国图书馆事业极不发达，至于有规模的公共图书馆更少。东方图书馆的开放，使其丰富的藏书能供上海读者应用。据当时统计，每年约有三万至三万六千人次去利用。于光远同志曾谈到他青年时代利用图书馆的情况："东方图书馆我是一个常去的读者、阅览者，一直到'一·二八'被烧为止。我家住上海南市，每天徒步到那儿去。"

五十多年前，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军进犯上海。闸北正是战区，商务总厂被六枚燃烧弹掷中，二月一日东方图书馆又被日本浪人纵火。大火形成的巨大上升气流夹带着纸片、纸灰布满整个上海及其四郊上空。东方图书馆的藏书除宋元精本五百七十四种因一九二四年时局不稳定移藏金城银行保险库而得幸免外，其余四十多万册中、西、日文图书、画册尽成灰烬。

一九三三年三月，曾聘请社会名流组织过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计划募集图书基金，但收效甚微。虽然商务印书馆每年有四万多元拨款，但仅够买书，馆舍没有着落，一直没法开放。

张元济不仅是出版家，也是位藏书和版本校勘家。“一·二八”一役，三十多年为商务精心收集的图书毁于一旦，他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所幸五百多部精品得以留存，他怕再有散失，对这些书陆续进行著录。题为《涵芬楼烬余书录》，但是久久不愿付印。解放后经李宣龚一再动员，他才将原稿交付排版。不久他不幸瘫痪，李宣龚请顾廷龙同志帮助整理出版。

根据《烬余书录》统计，五百七十四种精品共一万七千一百三十卷，六千一百二十册。其中宋元版一百八十二部。而最精美和罕见的“镇库之宝”是：

《六臣注本文选》六十卷六十册，宋建阳刻本。刻工稜角峭厉，是建阳刻本之至精者。后来印入《四部丛刊》。

《史记》宋黄善夫家塾刊，存六十九卷。这个刻本，稜角峭厉，傅增湘赞为“是建本之最精者”，不仅精雕，而且是初印本。国内几百年的公私目录没有记录过。是光绪年间从日本流回来的一个残本，共流回七十五卷，书贾将之卖给三个主顾：涵芬楼买到六十九卷，潘宗周买到五卷，袁克文得到《河渠书》一卷，

《南华真经》搀配本，一至六卷南宋阳建坊刻本，七至十卷北宋早年刊本。罕见版本，我国各家目录从未记录过，也是光绪年间从日本流回来的。

《资治通鉴》宋刊元修本。宋版资治通鉴极罕见，国内完整的只剩一部，另一部以六个版本凑成的“百衲本”，这个本子有二百八十六卷宋刻本，名列第三。

《春秋左传正义》宋庆元年刻本。《春秋公羊传解》宋淳熙年抚州刻本。《后汉书》宋绍兴年刻本，都属凤毛麟角。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的文教政策和保护文物措施，使张先生大为感动。经他提议，商务印书馆董事会通过，这五百多部精品，除《永乐大典》二十五册献给政府外，其余均由中央文化部收购，现藏北京图书馆。从此，这批图书获得安全的保管和充分的利用，实现了张元济不使珍贵古籍流散、湮没的夙愿。

本章主要引用材料

张元济：《东方图书馆缘起》
《张元济日记》

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序》
《张元济书札·致缪荃孙和顾廷龙跋》
《胡适的日记》一九二一年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华阳国志》
《通艺学堂章程》
张养明：《怀念和感激》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
于光远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一日讲话录音

十 三

办函授学校

我们在第四章讲到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大都出身贫寒，因为有清心书院而学得文化和一技之长，并且逐步发迹。他们都比较热心于社会文化教育公益事业。鲍家后来在宁波办有小学，夏瑞芳办小学和孤儿院，张桂华支持清心书院，等等。张元济虽与这些人社会地位不同，但他更是热心于教育事业，他加入商务印书馆时和夏瑞芳约定“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所以商务印书馆有举办社会文化事业的传统。后来随着扩大招股，股东成分复杂，虽然文化事业的项目有所减少，但还是非常可观。

前面我们提到了师范讲习班和师范讲习社，都是辛亥革命以前办的事业（师范讲习社到一九一八

年才停办），还有养正幼稚园。辛亥革命后，商务办有东文学社、国语讲习所师范班、暑期班、励志夜校、同人子弟学校。影响大的除了东方图书馆以外就数函授学校。

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在一九一五年七月创办，开始叫函授学社，张元济是社长，先办英文科。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里讲，一九一六年八月上旬，他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一开始就被张元济分配到英文部，具体工作就是批改函授学生的作业。同事胡雄才告诉他，英文部编辑周越然“是创办函授学校的建议人，为商务印书馆开辟一条新的生财之道，宣传之路。”这个说法完全是真实的。商务印书馆所办的文化教育事业，几乎都有助于推销它的图书。毫不奇怪，任何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直接间接有利于出版事业的发展。商务确实利用这些文化教育事业做宣传自己书刊的阵地，从而使日益复杂的股东成份对办文化事业无话可说。

商务早期师范讲习社的做法，我们说是函授教育的滥觞，是指只有一般辅导和终了时的考察，而没有个别辅导。函授教学应着重在个别辅导，即批改学生作业和解答学生提问。

一九一五年以后，上海滩上函授教学如雨后春

笋一般，机构之多难以想象，单单美国人办的就有两所：万国函授学校和商业函授学校。我国人自己办的就更多。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微乎其微。商务函授学社从一九一五年办起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才停办，前后三十年；科目从原来的英文一科发展到算术、商业、国文、国语、图书馆学等几科，是所有函授学校难望其项背。张元济从不挂名，他是一位极其负责的校长。他的日记，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记有他处理函授学校的情况：他告诉英文部主任邝富灼，函授开办十一个月，有八百名学生，从经济上并没有亏损，应该推广。他建议再添一名批改作业的人，邝推荐周越然的哥哥周由廑、另外再添一位写信的人。八月七日日记："平海澜愿任编译，邝君拟约至英文部，月薪百元。"沈雁冰也是这个月上旬进商务到英文部，半个月进三个人，还有原有人员，不可谓不多。而当时开办不久，"学生英文程度不一，最高的不过相当于中学二年级"，配备这些高的和比较高水平的编辑改卷子，当然是比较负责的，到一九三四年英文函授有十二位改卷员，和当时其他一些仅仅收学费卖讲义的所谓函授学校大相径庭。

据一九三〇年六月一日纽约时报的报导，商务

印书馆的“函授学校，三万二千个中国人曾在那儿毕业。”这可能有一点吹牛，三万二千可能是入学人数，不是毕业数。毕业的大概有几千人，主要是英文科的。“毕业后有考取税关及邮务电报局等办事员者，有任汇丰、中国、交通各银行办事员者；亦有新入各专门大学，进求高深学问者。”旧中国海关、邮电、银行要求职员的外文水平比较高。

培养出几千名学生，即使是单科，对社会文化也不无小补。对于无力专门进学校读书的职业青年，也是一极好的提高机会。比如我国的教育思想家杨贤江，他没有机会进修外文，一九一七年浙江一师毕业后进南京高师任事务员，虽然可以旁听，总不能系统，他参加了商务印书馆函授英文科，经过苦学，取得极好成绩，可以从事翻译外国教育学论文。

本章主要引用材料

《商务印书馆志略·历年筹备公共教育事业一览》1929年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张元济日记·1916年4—8月》
贺世友：《杨贤江年谱》
《纽约时报》1930年6月1日，转引自《出版月刊》
16期台湾商务印书馆

十　四

梦里也惦着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历来设三大所：由鲍咸恩、鲍咸昌弟兄主持的印刷所，由张元济主持的编译所，实际由夏瑞芳主持的发行所。三所都是独立而并行的。因为商务是由小到大，经营管理除编译所外，始终由夏一手管理，所以缺少制度，无非因循习惯做法而已。夏瑞芳十分尊重张元济，鲍家兄弟又十分佩服夏，所以三所自然而然由夏瑞芳来统筹沟通，多年来也相安无事，张的意见能够贯彻。夏瑞芳去世后，没有了“中介人”。印有模担任总经理，一则他不懂这摊业务，二则他的大部分个人事业在纱布业，商务总经理一职挂名而已，实际由经理高凤池担负，张元济协助。

陈叔通回忆说：高凤池“是顾全大局的，但脾气很别扭；而张元济是不让人的”，总希望自己的意见能被别人接受，办事认真而又不放心别人。所以张虽无抓总的职务，天天到发行所（发行所楼上是全馆中心机关）了解和处理全局性的事。编译所在闸北宝山路，发行所在河南路。陈叔通说，那时张元济每天“在编译所下班后再到发行所，辛苦忙碌之极。”

陈敬第，即陈叔通，一九一五年初进商务印书馆。他是浙江杭州人，光绪癸卯科（一九〇三年）进士，后来留学日本。光绪末年他留学回国，经汪康年的介绍，和张元济认识。因为志同道合，十分投契。辛亥年中央教育会开会，陈叔通是浙江学界代表，他和张元济不仅一个多月开会在一起，从上海到北京还同坐一条船，接触当然很多。这时候张曾邀请他到商务印书馆，他没有答应。辛亥革命后他被推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在北京当议员的时候陈办《北京日报》，任经理。报纸是辅助议院活动的一种工具，报纸反袁，很快被袁的爪牙所注意。陈叔通的哥哥陈仲恕怕弟弟被害，请张元济想法让他回南方，张派李宣龚到北京邀请他进商务。这时国会已被袁世凯解散，筹安会的丑剧已经

上演，报纸在袁的压力下也办不下去了，陈就回到上海进商务。张元济又得了一个重要的助手和终生的朋友。

陈叔通在商务考察了一段时间，提出成立总务处的建议，以协调三所。这个建议马上被张元济接受，但并不能被印刷、发行两所接受。三所不协调，受影响的是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从短期看，无求于编译所，照样有饭吃，有了总务处，岂非有个婆婆。经过一段努力，建立总务处的意见得到了三所的一致同意。

总务处不是领导机构，而是个会议机构。一切大事、三所关系，统由总务处会议讨论。总经理、经理和三所负责人当然参加。商务三所下各设若干部，需要时，有关部长也参加会议。意见一致便执行；若不一致，会下或下次会再商量，总之以协议一致为原则。在这个基础上协调三所关系，编订统一计划和彼此了解、协同一致。并且逐渐拟订出许多规章制度来，商务成为一个当时著名的制度健全的企业。此后商务一直实行这样一种合议制的领导体制。三所受总务处会议决议的约束，又有包括用人在内的自主权，又能彼此协调。这是陈叔通对商务发展所作的一项贡献。一九三〇年聘请王云五为

总经理，作为条件之一，取消合议制而实行总经理独裁制。这是后话。

总务处成立以后，特别是印有模病故、高凤池担任总经理，张元济担任经理后，编译所的工作实际由高梦旦担负，张的工作转入全面管理。从此，他再没有时间象当年编最新教科书那样自己写书，不能象当年编《辞源》，后来编《中国人名大辞典》那样和编辑们一道参加编写词条，也不能象当年林纾译《玫瑰花》，由他逐一校改古僻字。如果我们翻一翻这段时间他的日记，在“编译”一栏里经常是空白，或仅仅记载一些代传件。只有教科书和函授学校教材，还是他具体关心的内容，其他，只能作一般的关心了。他的大部分精力被一个庞大的出版、印刷、发行联合企业的无数琐碎事务所吞噬。而这些琐碎事务合起来就是使一个出版企业得以正常运转所不可缺少的组织活动。一个出版工作者，一个编辑，尽管他们可能没有写过一本书，没有改过一本书稿，他们对文化所作的贡献和一位著名作家是同样值得称赞的。正是这种默默无闻的劳动，使作家的著作为人所知。

在以个人名利为中心的旧社会，对自小接受儒家传统教育，有一定学养的人讲，做到这点是

非常难能可贵的。

从一九一四年初夏瑞芳被刺到一九二〇年张元济辞经理职，他一直处在组织全馆活动的岗位上，处理日常事务。这七年间商务出版了一批相当好的工具书，象《辞源》、《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医药大辞典》等；中国近代第一批学术著作，象贾士毅的中国财政史等书；我国第一套以白话编写的课本。这些书，有的他编写过，有的设计过，我们都一笔带过，作一总的交代。

他始终不放松的是聘请编辑和安排干部。到一九二一年，编译所里有一百六十名编辑，中间有一批在学术上相当有成就，或者编辑工作相当有经验的编辑。集中这么多知识分子，除了几个著名大学以外，国内公私机关企业无一能望其项背。造成此种优势的原因有三：军阀当道，他们根本不办科学文化，知识分子或学有专长，或留学归来，都不愿和他们在一起，此其一。其二，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殖民地正在火并，在这个空隙里，我国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发展，社会经济活跃，文化出版事业可以容纳下这些人。其三是商务采取少收外稿，自编为主的方针，需要

大量的人才以保证稿源和质量。

民国元年六月八日股东年会时，股东金伯屏建议用招徕外稿的办法编辑百科全书。张元济告诉他，“本有收来稿办法，因历年所来求售各稿绝少佳著，退回答复且有许多为难，故近来于收稿办法不甚注重。”商务编辑郑贞文曾同胡适讲：在东京时他卖稿给商务，每千字三元或四元，后来在商务编译所拿薪水写出的书稿每千字平均合十元以上。大概慢工出细活。

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小印刷所发展到出版事业中执牛耳者，和它网罗人才的活动分不开的。为网罗人才，张元济历尽甘苦。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日，他请王显臣吃饭，席间王显臣谈起用人之难：“稍得力者即易脱去自营，与我竞争。又言，欧美用人，凡登报招人应募者，很难得力，由于其人不知足之故。凡不知足人最难用，做事不肯用心，稍满又思他去。又，办事曾不几时，即历多处者，其人必不可用。云云。”王显臣的话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第二天在事务日记上记录了这席话。

这席话是符合旧社会的情况的，绝大多数人只谋求自身的利益，稍有能力的都不甘久居人下。虽然象高梦旦、陈叔通、杜亚泉、邝富灼这样的人前

前后后不少，把企业看作自己的事业，勤勤恳恳服务。但象沈知芳那样羽翼一丰满就飞，临别还在你背上插一刀的又何尝少。除了辛亥年沈知芳一批人外，后来周锡三也重演了一次。

周锡三原先在上海青年会商学院当讲师，一九一四年进商务后在英文部当编辑，后来主持西书部，兼理英文函授学校。他英文相当好，张元济当他人才看待，他提出的种种要求都满足：要求红股，答应；要求企业不论盈亏，他都有花红，答应；要求无息借款，答应。后来他不愿主持西书部，也答应。为了挽留人才，对周锡三百般迁就，真可谓不薄。但周仍然不领情。到一九一八年九月，欧战已经结束，估计西书发行将大有可为，商务正准备发展西书的时候，他突然辞职，准备和人在外滩开一家专营西书的书店。他掌握购买商务西书的全部客户名单，在正式辞职以前，他发出一大批极不利于商务发售西书的信给这些客户。

得人才难，是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因为用人难，没有合适、放心的干部，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商务的银行存款长年在六七十万左右没有出路，——当时出版和印刷的发展和社会需求

量比较已经饱和，在书稿和印刷机械设备上已无法容纳这一笔资本。总务处会议和董事会经常议论的一个发愁的题目就是这一笔闲置款项的投资方向，使之能增值。当时财政部有一个造纸厂办不下去要出让，希望商务能接办，终于因为派不出合适、放心的干部而作罢。后来决定投资地产，——用不着人去经营，可以坐等地产涨价。正好南京路有一块值十六七万英镑的空地要出卖，合八九十万元，正好消化掉这笔存款。双方几经交涉，前后有半年左右。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准备答复卖方条件的总务会议上，为买地与否，张元济与高凤池发生了冲突。又召集临时董事会决议买地与否。决议以后，张元济讲，因为很多事和高凤池意见很难统一，实在难于共事，决定辞职。当时高梦旦正奉命到北京找胡适和梁启超，请他们在北京协助商务编书的事。如果高梦旦在场，他能在两种意见冲突的时候进行调和，冲突不致变成决裂。

张、高的冲突由来已久，两人都忍耐着而已。实际是商务开创时的教会派和后来加入的被称为书生派的冲突，中心是干部问题。夏瑞芳时矛盾还不突出。后来教会派的资金力量都增加得慢，缺少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如郭秉文，又不愿在商务工

作，而去当东南大学校长。高凤池和鲍咸昌不愿异己力量扩大。比如南方政府邀请商务印书馆到广州或香港设厂，张同意，而高、鲍总不同意，费尽周折才通过。当时商务上海的工厂全部在闸北地区，张认为当时政局不稳定，狡兔尚有三窟，应该分一部分到租界。对此高、鲍也不同意，理由是设厂，分厂后管理不易统一，实际是因为设新厂和分厂都派不出教会派骨干能胜任厂长。

人员的冲突上是很早的，在一九一七年初就有过一次。高凤池主张用老人，张元济因为旧人里不能办事的人已不少，主张用年轻人；高主张用平素熟悉的人，张主张用能干的人，不论熟悉与否。张元济语重心长地说，用人能不能推陈出新，是一个企业或盛或衰的根本。

对那些沾亲带故的人营私舞弊采取什么态度，也是两派分歧很大的事。张认为“办理公共事业，则不能不分别功过。赏罚不公，无法维持企业纲纪，”不能“念旧隐恶”，把私人间关系、感情带到公司事务中来。

“五四”带来的新思潮巨浪已经冲破了我国的平静，商务也正酝酿着新旧交替，张元济和高梦旦正在进行这项工作。《东方杂志》已经改版，《小

说月报》已着手改良，但整个编译所的问题刚刚着手。他们想组织第二编译所，专门介绍新思想读物，还没有落实。如张元济离开商务，这出戏就难唱好了。他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商务在文化界的地位，远不是高凤池所能支撑的。董事会不断派人挽留，劝张不要辞职，但都不起作用。高梦旦这时已从北京赶回来，董事会考虑张素常极爱听高的意见，请高从中斡旋。高梦旦找陈叔通商量。他们二人都知道张有言必行，行必果的脾气，而且又宣布过决不复职，单纯的劝说是没有用的，要针对他的弱点"攻心"。

陈叔通提出仿照永安公司办法，在总、经二理之上另设监事会，张元济担任监事，可以既不复职又不离商务事务。又知道他不愿居位于高凤池之上，所以必须高凤池也辞职，两人同任监事。这个意见被高凤池接受。高凤池忖量自己在事务上可以应付，但在社会文化界完全没有号召力，所以同意陈叔通的意见，也退居监事。陈叔通评价高凤池能顾全大局，就指此事而言。

陈叔通又找张元济谈，说，你是晚间做梦也想着商务的人，怎么摆脱得了商务？这一句话正击中他的弱点，张无言以对。陈叔通这才把设监事会的

意见讲出来征求他的意见。于是高、张同退经理职，同任监理。商务在转折期间的一件难事就这样解决，由年龄较轻的鲍咸昌和李宣龚继任总、经两理，年龄较大的高、张退居监理，仍在一起搞商务印书馆的事。以后，张的主要精力放在物色人才和为涵芬楼收购古书上。

本章主要引用材料

陈叔通：《回忆商务印书馆》《文化史料》第六辑

陆费逵：《京津两月记》《教育杂志》第三年 第八期

顾廷龙回忆张元济的谈话录音

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

《胡适的日记》一九二一年

《商务印书馆股东会记录》

《张元济日记》

《张元济书札·致高凤池》

十五

五四前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列强致力于战时生产，进入我国市场的舶来品显著减少，民族工商业获得一个发展的机会。大战结束，侵华列强重返我国市场角逐，民族工业又面临困境。辛亥革命后，虽然有了民国的称号，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的经济、封建的政治和封建的思想。不断的内战，两次复辟帝制，日益加重的帝国主义侵略。这些社会状况使许多人对于辛亥革命前后的理想发生了怀疑和动摇，又一代知识分子重新探索拯救中国的真理。俄国十月革命，“无产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中国的历史掀

开了新的一页。

五四运动开始于一九一九年前三年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启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学生爱国运动使新文化运动更加蓬勃发展。新文化的浪潮冲击着社会的每个方面，也冲击到商务印书馆。

对五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多年来有着截然相反的评价。有人根据郭沫若在三十年代说林纾所译小说应算作五四潜流期，就把商务在五四说得非常进步，似乎是“五四之源”。忘掉了五四是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国外有学者根据戴季陶代拟的孙中山先生的一封信，说商务那时反动和保皇。两者都以张元济为例。谁是谁非，还是以具体材料来说话比较好。

张元济当年的日记：

“陈重远来募孔教会捐，余婉却之。”（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康长素要求〔商务〕代售《不忍》杂志，及其所著书。已婉复。”（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康长素来函询，能否代售《不忍》杂志、《共和平议》。作函却之。”（一九一八年三月二

十六日）

这三条足以说明他是反对尊孔和反对复辟的。

张元济日记一九二〇年三月四日："日本某君来信，言觅得日本寺内内阁谋我国及借款之较计一书，并附来目录。与梦翁商，虽不免招当局之忌，然不能顾。可先问价，嘱寄十分之一之稿来。"寺内即寺内正毅，在一九一六年九月至一九一八年十月间任日本内阁总理。他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迎合北洋军阀武力统一中国的企图，大量借给附带有政治条件的贷款。他下台时曾宣称，他的内阁对北洋军阀的"投资收益"，将"十倍于二十一条"。一九一八年五月秘密的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正是这种"收益"之一。

日记另一处也十分引人注意：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和驻日使馆朱绍廉商量，准备出版介绍俄国社会主义书籍。

五四标志着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反帝和反封建正是资产阶级所愿意进行的。特别在当时，从袁世凯开始的尊孔读经

运动有增无已，甚嚣尘上。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重新和加重压迫，民族资产阶级首当其冲。所以在这个运动的第一、二两期，即从五四运动开始到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前，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爱国知识分子加入到这个统一战线中来是毫不奇怪的。虽然商务当局有反帝和反封建的倾向，但整个编辑部并不都能跟上时代的节拍，特别是几个期刊，受到《新青年》、《新潮》的批评。虽然这种批评有过于苛求之处，但张元济和高梦旦还是认真考虑。因为改组整个编辑部是已经决定了的事，杂志的改革比较方便，只要换合适的主编，不妨先做。

《东方杂志》最先换人。它本来是个资料性刊物，辛亥年初改为发署名文章的综合性刊物，古今中外，飞禽走兽无所不谈，唯独避开国内时事。新西兰宋曼瑛女士的一篇论文中说，这个杂志“对南方和北方写不同的社论。因为当时中国南北方正处在敌对的军阀政府的统治下，杂志要使双方都感到满意。”宋女士在论文中没有举出任何例子来支持她的论点。一个涉及人声誉的问题这样写，就这点讲，是比较草率的。因为当时只要不得罪军阀即可，不必去讨好他们。而且无论张元济或高梦旦，

或者杂志前后主编杜亚泉或陶保霖，他们的品德使人相信不会做出如此无聊的政治投机的事。更何况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〇年，《东方杂志》十年间根本没有发过社论或编辑部言论。解放前张元济在商务提倡称作“在商言商”的宗旨，——不仅绝对不卷入中国政治的漩涡，甚至连一般是非圈子都尽量避开。树大怕招风。商务在解放前的五十年，社会政治经历如此频繁的变化而仍然保持了它的独立性质，在某种意义上，“在商言商”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商言商”，避开政治的做法也使它在历史的进程中不能发挥更多的作用，自身也非常被动。例如一九一九年四月，孙中山先生派卢信到商务印书馆接洽出版他正在写的《孙文学说》。张元济和高梦旦商量后，觉得孙先生虽然早已退出南方政府，但北洋政府并未取消“通缉令”，遂于四月十四日告知拒绝出版。后来朱执信和汪孟邹商量，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汪孟邹一九四七年八月在《大公报》撰《我与新书业》，说：“那些大出版家不免畏首畏尾，我们胆子就比较大些。记得民国八年秋天，中山先生要办《建设》杂志，同那些大出版家商量代为印刷和发行，每家都拒绝了。后来朱执信

先生来同我们商量，我们答应了下来。另外还有小册子，如《孙文学说》，也是我们印的。”

《孙文学说》亚东出版后不久，不仅北京大学翻印，连北洋政府段祺瑞为了对抗总统冯国璋，和给予南方政府陆荣廷等某种压力，表示可以和孙中山先生“合作”，他的安福俱乐部也出面翻印这本书，搞一箭双雕。孙先生后来对商务当初拒绝他大为恼火。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张元济和高梦旦、陶保霖商量改组《东方杂志》，由陶保霖接办。陶保霖是任过陕甘总督，两广总督的陶模的儿子，日本留学生，攻政法。后来和张元济一起参加预备立宪公会和《法政杂志》活动。他准备接手后，就发表了《中国杂志界应有之标准》，以答复《新潮》杂志《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对商务各刊物的全面抨击。到次年，一九二〇年一月，正式接办，并部分采用白话。

但是，陶保霖除了改月刊为半月刊，删除转录文章，使杂志显得精干以外，就是请沈雁冰每期供给一两篇文章，压缩高君实小姐的稿子，别无太明显的改变。他在《中国杂志界应有之标准》里已委婉地拒绝了《新潮》批评“《东方杂志》这个上下古

今派的杂志，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声称杂志本有大杂小杂之分，《东方杂志》就是“大杂”，研究一切学问，所以“自不必以不纯为嫌，亦毋以杂乱自慑。”《东方杂志》虽有沈雁冰按期供一些稿，胡愈之也在那时进入杂志编辑部，但都不足以改变杂志面貌，因为刊物掌握在陶保霖手里。陶虽然一反杜亚泉和高君实小姐那种认为只有工业和东方道德结合起来才能走上康庄大道的主张，写一些诸如《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谈社会主义，谈“阶级斗争”。但他自己也是一位理想主义加法治主义者，谈这类问题总有点隔靴搔痒，和时代的要求仍不合拍。

杂志改革最成功的，是《小说月报》和《学生杂志》。

《小说月报》的阵地久为鸳鸯蝴蝶派所占领，这和当时新文学还刚刚萌芽有关。忘记这个历史实际而过分责备，不妥。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张元济日记里，我们了解到他曾同高梦旦商议过《小说月报》不行，要改变。当然不会有结果。一九一六年八月沈雁冰进商务编辑部，逐步表现出了他的才干，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间，商务除了英文杂志以

外所有杂志都拉他写稿、译稿，一九二〇年一月间他"半改革"《小说月报》，得到了读者的强烈反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在中国国土上获得空前发展；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酝酿着新的革命；反映时代节奏的现代文学已经破土而出。现在《小说月报》改革的主客观条件成熟了。

张元济和高梦旦选定沈雁冰接办《小说月报》，答应了沈提出的包括给予全权办事，不干涉编辑方针在内的几项条件。沈很快和在北京准备组织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等人结合起来。从此，《小说月报》宣传"为人生"的艺术观，刊载清新向上的有着浓厚生活气息的创作；介绍外国，特别是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把以文艺为娱乐的鸳鸯蝴蝶派清扫出去，为新文学提供了阵地。刊物还经常发表具有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创作和论文，广泛地介绍了我国文学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是现代文学有影响的刊物。可称我国现代文学建设上有重要意义的一根支柱。当年和沈雁冰一起在商务的胡愈之老人说："由沈雁冰代替王西神主编《小说月报》，可说是新文学运动取得胜利的一个里程碑。"

《小说月报》改革后，先后由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主编，直到一九三二年初因战火被迫停刊，

十一年间始终掌握在文学研究会手里。但它不分畛域，不把它变成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一开始，沈雁冰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日《讨论创作致郑振铎信》里就提出，《小说月报》“现在发表创作，宜取极端的严格主义：差不多非可为人模范者不登，这才可以表现我们创作一栏的精神。……自己所登的创作，更不可以随便。”叶圣陶老人曾多次谦虚地否认他是人才的发现者，他说他当初主编《小说月报》，“只是仔细阅读来稿，站在读者立场上取舍而已。”确如他所讲，巴金、老舍、丁玲等作家的成功，是“由于他们开始就认真，以后又不懈地努力”的缘故。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他们并非文研会会员，处女作能在这样一份杂志上发表，杂志的非宗派性可以说明。这种非宗派性，使刊物获得深厚的基础。六十年后沈雁冰讲：“这十一年中，全国的作家和翻译家，以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者，都把他们的辛勤的果实投给《小说月报》。可以说，‘五四’以来的老一代著名作家，都与《小说月报》有过密切的关系。”的确是实情。

不仅是《小说月报》，商务的其他刊物和整个编译所，在接受稿件上，有比较重视质量而不讲究

关系不讲究著译者名气的传统。费孝通、王力、张明养、谢菊曾、于卓等等相当多的学者的回忆里都提到，当年他们还都是毫无名声的学生，和商务毫无瓜葛的情况下投稿商务而获得发表，有的从此结下了不解的笔墨缘。杨贤江就是一个例子。

一九一五年杨贤江还是一个二十岁的中等师范学校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向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投稿。以后，他不断写作，经常在《学生杂志》和《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一九二〇年底商务酝酿改革期刊，决定邀请他进《学生杂志》当编辑，实际主持《学生杂志》，使《学生杂志》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造。所以说"比较彻底"，因为究属杨贤江刚当编辑，原来主编朱元善仍然有最后决定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杨贤江不仅成为一个有经验的编辑，而且一九二二年夏天参加了共产党，《学生杂志》终于成为和原来面貌完全不同的期刊。原先《学生杂志》是标准的课艺杂志，现在已经变为教育青年走向社会，走向生活，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抨击军阀的卖国黑暗统治的政论性杂志。杂志已经公开教育青年要参加政治活动，参加政党，进行革命。向青年指出，面对军阀的黑暗统治，不是用游行请愿，而是用教育发动群

众、教育群众的方法干预政治。这个变化是多么大呀！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以后，上海区党组织设立了国民运动委员会，领导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运动，杨贤江和恽代英都是委员，负责学生方面的工作。《学生杂志》变成委员会组织、教育青年的重要工具。李一氓同志回忆说："代英同志对青年工作的实际指导多，而贤江同志则对于学生的教育工作多。当时比较进步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大体上都受《学生杂志》的影响，而实际则是贤江同志的影响。"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反帝反封建要求，张元济、高梦旦这样一批知识分子追求国家富强的理想，党的青年成员的不懈努力，使党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政策在商务印书馆得到强烈反响。商务印书馆容纳了一大批共产党人、进步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左派。除了《小说月报》、《学生杂志》以外，《教育杂志》、《妇女杂志》也改由李石岑、章锡琛主编。全部杂志直接、间接都在年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手里。他们组织了编译所里和编译所外一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进

步知识分子写稿，党的国民革命运动主张在这些刊物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事变，以张元济为首的商务当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的步伐和时代是协调的。突出的是给了这些期刊编辑这样大的自主权，使这些期刊“具有罕见的进步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

然而整个编译所的改组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改组编译所是高梦旦出的题目，张元济极力支持，但是这份“考卷”已经很难答好了，虽然两个人一起同心协力在作答案。

在新文化潮流面前，高梦旦因为自己不懂外文而深感力不从心。如果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因为自己跟不上而没落，和他决心从事出版工作的初衷是违背的，他决心让贤。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晚上，他找张元济，“说公司大局及一己去留甚久”。

从《张元济日记》中可以看出：半年多时间里他们商量过好几个方案。后来进行活动的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在北京“拟设第二编译所，专办新事。以重薪聘胡适，请其在京主持。”这件事后来并未

谈妥，改为由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北大教授组织一部《世界丛书》。当时梁启超、蒋百里、张东荪等正在酝酿组织学术团体共学社，一面编译新书，想从稿费中扣除一部分做团体基金，支持家境清寒学生出国留学。和商务商量，当然一口答应。共学社的宗旨是系统介绍西方文化。后来在商务出版《共学社丛书》。共学社是研究系的组织。

另一个内容是请人担任编译所长，目标是胡适。这已是一九二〇年下半年了。高梦旦前后几次到北京，终于在次年暑假，把胡适请到上海。胡适在商务编译所和各层编辑接触了一个半月，虽然觉得"这个编译所确是很要紧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但他觉得他自己"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而不愿到商务来。后来他荐王云五以自代。

王云五当时确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因为他在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八年）曾担任过上海中国公学英文教员，学生中有胡适、朱经农、杨铨等人，而这些学生当时都已留学得学位回国，很有名声。特别是胡适，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人物。大名鼎鼎的胡适郑重推荐他的老师，商务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请他当编译所副所长，三个月后当所长，高

梦旦自愿当他的下手。

王云五，原名元端，小名日祥，派名鸿祯，后来改名云五，号岫庐，笔名出岫、岫庐、龙倦飞。广东中山县泮沙村人，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阴历六月初一生于上海。光绪二十九年入上海守真书馆学英文，次年入同文馆。同年冬，离同文馆，一面教授英文，一面为《南方报》译稿。后任教中国公学。民元任总统府秘书，主管接待，后来到教育部任专门司科长。民国五年下半年到六年秋天任苏粤赣禁烟特派员。一九二〇年为公民书局编译一套《公民丛书》，约十二三种，先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后来改由公民书局自己出版。有说公民书局是他所开，不确。

王云五一九二一年九月进商务任编译所副所长，三个月后，张元济等董事同意高梦旦辞所长职，由王云五任所长。高梦旦的“让贤”完成了，但他与张元济原来改革编译所的设想并未全部实现。

商务当时面临的任务是，它原来以出版中小学课本和词书为主，现在应该转到出版学术著作。这是学术界、读书界和商务编译所内“新派人”所迫切要求的，民族文化总是普及和提高两条腿。商务

当轴也万分希望出版学术著作，一九一六年贾士毅著中国财政史，张元济多次交涉希望由商务出版。但是编译所成员的构成和知识结构不适应这种新的要求。原有老编辑在十多年的编辑生涯里很少有系统地补充新知识的机会，已落后于时代。商务的不成文规定，编辑在班上连报纸都不许看的。沈雁冰说，五四的风潮竟然吹不进商务的编译所。张、高原先所设想的是找一个有学问的所长，他能领导一批编审，而将大部分编辑变成自由撰稿人和改稿人。这个意见得不到新派编辑和胡适的欢迎。王云五还不是位里手。但是因为《世界丛书》和《共学社丛书》的出版，以及社会的推动，商务在五四后终于完成了走向出版学术著作等高级读物的转变过程。

王云五进商务后不久任编译所长，一九三〇年担任总经理兼编译所长，直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参加国民党政府辞掉商务职务为止，在商务前后二十五年，有各种值得一写的事，可惜不是这本小书讨论的范围。

本章主要引用材料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杨默夫译本，龙田出版社
《张元济日记》
叶宋曼瑛：《张元济与新文化运动》（《图书馆杂志》1982年2期）
汪家熔：《东方杂志是否有“南方版”“北方版”？》（《图书馆杂志》1982年3期）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
汪孟邹：《我与新书业》见汪原放回忆录。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
胡愈之：《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人民日报》1981年4月25日）
茅盾：《讨论创作致郑振铎信》（《小说月报》第12卷第2期）
叶圣陶：《记我编小说月报》（《文汇报》1983年8月24日）
茅盾：《影印〈小说月报〉序》
茅盾：《忆杨贤江兄》（《光明日报》1949年8月9日）
李一氓：《纪念杨贤江同志》（《光明日报》1949年8月9日）
《胡适的日记》
关国煊：《王云五小传稿》（《传记文学》35卷3期）
刘涛天：《出版业经营家王云五先生传略》（《同舟》3卷7—8期）
吴泽炎：《一个商务人看商务》录音

十　六

看似容易却艰辛

一九一八年，张元济卸掉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只担任经理职务。

一九二〇年，他卸掉经理职务，改任监理。

一九二六年，他年满六十，辞掉监理，改任董事长。

年纪慢慢大了，似乎逐渐在卸担子。他卸下了一副担子，又挑起了另一副担子：商务印书馆影印古籍全面铺开，挑大轴的正是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出版古籍，像《五经备旨》、《左传》、《读通鉴论》等十多种书。一九一四年开始以汲古阁本为底本影印《唐四名家集》（《窦氏联珠集》、《李贺歌诗编》、

《唐风集》、《唐英歌诗》），《五唐人诗集》、《唐六名家集》、《唐人八家诗》、《元人十种诗》等五种小丛书。一九一六年辑印《涵芬楼秘笈》。这是影印和辑印善本古籍的开始，到一九四〇年影印汲古阁精抄《稼轩词》，是为解放前商务影印古籍的最后一部。二十七年间影印古籍极多，此外还有一些精选排印本，如宋人小说二十八种等，都是张元济所主持。其中《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用力之勤，难以想象，特别在一九二六年他退休以后。

有人说，张先生是维新人士，早年讲求西学，介绍西方学术于国人，为什么特别在晚年，化大力气影印古籍。

其实他从来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是从振兴中华出发介绍“西学”的，从来没有把“西学”和传统文化对立起来。他主张各取其精华，两者结合。我们在第四章里谈他教育思想的时候引用了他在一九〇二年初发表的《答友人问学堂事书》。里面除了教育观，还可以了解他的“中西观”。他针对当时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文化，鄙薄中国固有文明，办新学洋化的风气，指出：“中国开化甚早，立国已数千年，亦自有其不可不学之事，何必舍己

芸人。窃谓……必学为中国人，不学为外国人。然又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谓也。……吾之意在欲取泰西种种学术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耳。”他认为，教育总要从自己固有文化出发，“一以国民精神为主，故学成之辈无不知爱其国、卫其种。”他在《影印四部丛刊启》里讲：“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知新温故，二者并重。”他自己把这件事完全讲清楚了。他是从爱国主义的高度而不是国粹主义来处理教育和文化的。

我们在第十二章说到涵芬楼的时候，也说明了当时张元济主持收购一些珍本和善本古籍是求民族文化的保存。古籍保存最好的方法是“化身千百”。“化身千百”的手段，以前是翻刻，有了照相石印之后就是影印。

这些罕见图书之所以值得保存，在于他们本身的价值。但是因为少，学者无法利用，不能发挥作用。《廿二史异考》是钱大昕竭毕生之力的巨篇，其考核精详为世所公认。但因为他未能见二十二史各古本，所以于《旧唐书》关内道地理，对实际并没有错的文字，作了毫无必要的考查。可见做学问

离不开这些古本，而古本一般读书人难得。张先生在《题朱遂翔抱经堂藏书图》里，他“叹读书者购置惟艰，流通之责匪易”，说“中原文物凋残甚，欲馈贫粮倍辛苦。愿祝化身千百亿，有书分饷读书人。”说明他影印古籍一为挽救文化遗产，使其免于湮灭，一为学者解决求书困难。

一九二六年张先生退休以后，专心从事影印工作。在1927年1月21日致信傅增湘，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百衲本二十四史》就是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完成的。

很多人都认为有了照相石印之后，更别说照相胶印，翻印古籍变成一件很容易的事了。“照相新法，纤细无疑，无鱼鲁之虑”。拿一个底本，不用刻版排字，自然不会有鱼鲁猪豕之讹，交印刷厂照印即可，闭着眼睛就能出书。

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

自从照相石印在清末传入我国，直到解放，影印古籍何止万千，可以说影印容易。可是有多少影印书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呢？我们从文献学著作中

看，提到的影印书，无非是《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几部书。解放后海内外以影印书作底本，丝毫不动原样照印的，是《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以及其中的《太平御览》、《嘉庆一统志》，还有《说郛》、《涵芬楼秘笈》、索引本《佩文韵府》、《韵史》等等。除《古今图书集成》外，无一不是商务当年影印。解放后点校整理各书，以商务影印本作底本的远较其他影印本为多。一九八三年中华书局以世界书局昔日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作底本影印，付印前校出当年世界书局影印时"割裱"贴错、丢漏三百余处。可见影印不是一件容易事。相当多粗制滥造的影印书和粗制滥造者一起烟消云散，无影无踪，只有在当年报纸广告缝里还留下一些"精印"之类的词句。翻印、重印、影印，都是文化积累的一种手段，那些转眼烟消云散的影印书在文化的延续上没有起到"接力赛跑"接一棒的作用，于文化何益。两相比较，不能不承认影印大有学问。

另篇小册依靠丛刻而得以保存。南宋俞鼎孙、俞经编《儒学警悟》，开创了丛书先河。到明清、丛刻难以数计，仅现在还能见到的古代丛书就有三

千多种。古代丛刻总数大、类型多，但所有底本都仅限于汇刻者本人所藏。个人所藏精品究属有限，所以即使专门丛书亦极难系统，这是学问家最遗憾的事。张元济组织影印，突破了这点，所用底本不限于一家所藏，广借国内外藏书，使丛书成为系统。

从《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中可以看到，当年商务印《涵芬楼秘笈》就借用别人藏书作底本，并非全属涵芬楼所藏。1918年9月18日张致傅："汲古抄本《雪庵字要》，弟在京日已还与孝先，但乞借我印入《涵芬楼秘笈》。"后印入《秘笈》第八集中。《续古逸丛书》以印行海内外孤本为宗旨，前后印四十七种，底本自非一家所能有，广借才得以完成。蔚为大观当推《四部丛刊》。

一九二八年郑鹤声、郑鹤春著《中国文献学概要》，首先将《四部丛刊》与《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并称"四大编纂"。《四部丛刊》一、二、三集共收书四百六十八种，四千册，近二万卷。卷数超过《古今图书集成》，几及《永乐大典》。虽仅及《四库全书》四分之一，但在私家编纂丛书史上确是空前巨篇。《四部丛刊》所用底本，除涵芬楼自有外，有案可查，借

用国内外五十二家公私藏书，仅整部图书即达二百七十七种，占全书种数的百分之六十。至于其他另篇散页，以补充短缺卷次、页次和序跋的，数量无法计算。其中借自瞿家铁琴铜剑楼最多，七十一种，其次借自江南图书馆藏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藏书三十九种，再次是傅增湘双鉴楼藏书三十种。从日本静嘉堂文库借来原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四种。此外，潘宗周宝礼堂、清宫内府和后来故宫的珍贵版本都有借出。巨大的组织工作保证了《四部丛刊》既有一定系统性，又用很好底本。

向那么多人借那么多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按现在的讲法叫“难度很大”。沈雁冰当年参加过《四部丛刊》的影印工作达十个月之久，他在回忆录中说：“收藏家如果把善本借给商务影印，则他们所藏的原本的身价会相应缩小。”有些书是藏书家世代相传的珍品，借出以后万一有个闪失，藏书家要被亲戚诟骂的。

能借到那么多书，最重要有摄影这个技术条件，此外商务有一些做法。

第一是建立信用。在印《四部丛刊》前商务已借别人的藏书作底本影印过一批书，借别人藏画印过一大批名人字画，都能如期完整无损归还。口碑

好，为后来《四部丛刊》工作打下了基础。有些书是藏书家的传世之宝，如瞿家铁琴铜剑楼，不敢随便处置。商务就派人运发电机、照相机到常熟瞿家拍摄。每天早晨打借据逐页点交一部分书，由装订高手拆书，记录好钉线走向。傍晚拍摄完毕，用原来的线、原来的包角装订好。“整旧如旧”，再点交归回。藏书家瞿启甲先生非常满意和放心，慢慢就容许商务借回去拍摄。后来因为军阀战争，瞿家藏书移到上海，由风起先生保护。启甲先生特地告诉风起先生，商务要借什么就借什么，不必去信常熟征求他意见。可见信用之重要。

一是表彰藏书家和给予一定经济补贴。在影印书内封后页，仿宋刻之必有牌记，恭楷记录所借藏书家室名。借印各书，一般按印数５％——15％付版税（见《尺牍》第 250 页 附编译所出版部 致 傅增湘借书版税计算办法）。但是也有过分需索者。如湖州张石铭有大半部清人钱曾影宋抄本《说文系传通释》二十九卷。钱曾自诩为“惊人秘笈”，也确实是好。商务向他借，他提出的条件是要涵芬楼所藏宋本《容斋随笔》、《续笔》，是洪迈侄孙洪伋所刻，“字体端严，写刻绝精”。为了丛刊里加一精品，只能忍痛割让（见《张元 济 日 记》1921年

1月13日至15日)。还有更吓人的，为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向李盛铎借宋景祐刻本《汉书》、《后汉书》、《晋书》。“木老（李盛铎）允借两汉晋书，索酬万元”（见1927年10月15日张致傅信）。

保证书籍安全。所借图书，均请主人申明书价，由商务向保险公司投保，以防万一遇有水火闪失（1933年12月27日张元济致潘承厚、承弼信）。根本的办法在于时时注意借来图书的安全。在商务内部，物品交接一直有极严格的责任和手续，防止发生差错。多少年影印工作和涵芬楼向藏书家借抄图书多得无法计数，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丢失事故。只有在印《丛书集成》时向葛嗣浵借一部《今献汇言》，编辑部以为为是涵芬楼藏书，在上面批了页码，把书弄脏了。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吴战争前，从北方借来有一批珍贵史书，有上述李盛铎的宋本《晋书》，傅增湘的宋本《欧阳修集》、《晋书》、《金史》等二十多册，又有吴梅辑《奢摩他室曲丛》底本，在紧张时已先行移出。或存银行保险库中，或转移安全处所。一·二八开战后商务受了极大损失，而这批借来的书安然无恙。这点十分重要。一·二八时东方图书馆的书除掉早已移出的五百多部珍本书外烧得片纸不留。一·二八后辑印《四

部丛刊续编》（1934年）、《四部丛刊三编》（1935—1936年）。接受委托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国藏善本丛书》等等，没有这种保护别人书籍先于保护自己书籍的信誉，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国印刷术在唐代就很精细了，主要用来雕刻佛经。经过五代，到宋，印刷术主要用来刻书。当时经济发达，刻版、印刷用工用料都很讲究，形成了我国印刷史上的一个高峰。几乎每一页都可以当艺术品来欣赏的。明代学者王世贞在《宋刻本汉书跋》里讲宋版书："桑皮纸白洁如玉，四旁宽广，字大者如钱，绝有欧柳笔法，细书丝发肤致，墨色精纯。"清代学者孙从添在《藏书记要》里讲宋版书："字划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经过几百年而还能被人感觉到墨香，可见宋版书魅力之大。以"佞宋"——嗜宋版书——自称的藏书家不少。藏宋版书者往往翻刻，因此，长期以来藏书家和刻书家是二而一的。象明末的毛晋，清代的黄丕烈。因而藏书家刻书有重底本的版本，不太注重书的实用的风气。

张元济则推崇宋版而不佞宋。因为能够广泛使用其他藏书家的珍本，有大量版本可供选择，才能注重选目，不拘泥于自己和少数藏书家的藏书，使

读者得到更多的实惠。

当年商务出版古籍，分别不同读者对象来选目、选版本。大致有三档。

供中学生用的选本，以《学生国学丛书》为代表，都由今人选注，加标点铅印。

供大学生用的，以《国学基本丛书》为代表，不加删选。经部、子部书籍清代有人整理过的，一律用清代人的本子。清代有一大批学者对古籍进行梳理、校勘、训诂，比明代流传版本要好读得多。比如《易经》，用孙星衍《周易集解》、《论》、《孟》用刘宝楠、焦循《集解》。集部则酌选历代作品，直至清代同光间作品。门类齐全，加标点铅印。这两种可算一档。

六开影印本，以《四部丛刊》、《二十四史》为代表，供专家用。以实用为主，尽量讲究版本。这是一档。

《四部丛刊》经部里不收理学家著作；《国学基本丛书》里只有朱熹和二程的几本书，而有大量清代汉学家的书，可以说是继承顾炎武等所提倡的"通经致用"的合理倾向。

保存和欣赏为主，以《续古逸丛书》为代表，原大精印海内外孤本。包括《涵芬楼秘笈》，虽然

不是原大。当然算高档了。

影印书的真功夫首先在选择底本上。选用版本当然只讲究一个好字。什么算好，就十分复杂了。

“书经三写，改鲁为鱼”，所以没有人能反对书贵初刻的原则。张元济也十分重视初刻。在他的校跋里，我们经常能见到，当他以罕见的初刻本校勘通行的翻刻本而校出翻刻刻误，总是击节不止，以极喜悦或感叹的文笔在跋记里写：“古书之可贵，从未有不贵其最初之原本，……”。见到初刻，同见到企慕已久的人是一个感情。我们不需要举例子就可以说，选择初刻是他首先考虑的一个原则。

他贵初刻而不拘泥于初刻。很多书初刻并不好。如陶宗仪编的《说郛》，最早是陶珽在崇祯年所刻，当然是初刻。但清代以来做学问的人从来不看重这个版本。

一九一九年冬张宗祥主持京师图书馆，见馆中有明洪武抄本几卷，以陶珽刻本对校，发现刻本错误指不胜屈，决心校复陶宗仪原编旧貌。以洪武抄本为底本，遇到明抄本，缺者必借抄，重者必借校，前后找到七个明抄本，花六年时间才恢复旧貌。弄清楚了陶珽刻本杜撰书名，伪标作者，揉杂

窜乱之严重（张宗祥：《说郛序》、《冷僧自编年谱》）。1924年张元济向张宗祥要了这本整理的本子由商务出版。

初刻难得，只能退而求翻刻本。翻刻本一般刻在先的好，自然不能一概而论，但经过校勘的翻刻本，质量是后胜前的。比如清武英殿刻二十一史，校正了明代监本的许多错误，并且附有相当详细的考证。如果不是用清代民族压迫的观点擅作改动，武英殿本就胜过明监本。《法苑珠林》有明万历年刻径山藏本，但它没有二百年后道光十七年常熟蒋氏刻的好。择善而从是选择翻刻本的原则。如《周礼郑注》和《仪礼郑注》，明代有徐刻仿宋三礼本和翻刻岳珂九经本。《周礼》翻岳本比徐刻好，《四部丛刊》用翻岳本；《仪礼》徐刻本比翻岳本好，用徐刻本。

张元济的另一个绝对原则是，宋明人的著作尽量不用清刻本。因为清代统治者掀起过几场极残酷的文字狱，以至不论官刻私刻，对宋明人著作有"违碍"的都删改，不存本来面目。

比如，《四部丛刊》本宋人晁说之《嵩山文集》是用影抄南宋乾道年刻本影印。张元济以传抄本《四库全书》与之校勘，发现四库"馆臣泥于时

忌，遇原书诋斥金人词句，无不窜改，甚致颠倒序次，变易意义。其不易更动者，则故作阙文，或加以删削，有多至数百字者”（《嵩山文集跋》）。并以其中《负薪对》一文，举两本异同附在书后，说，“读之可以推知全书，并可悟朝廷禁令之失，宜足以摧灭斯民之忠真无遗焉。”书出版以后，鲁迅先生举这个对照表，说：经四库馆臣删改，“仿佛宋臣晁说之，已在对金人战栗，嗫嚅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这种删改也许有几十百字，也有仅二三字，但却把“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气节全部删掉了。鲁迅先生说，这种删改了的古书，“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难道不是民族文化的失坠！鲁迅说，“‘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以上三段均引自《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张先生还用准备影印的宋刻本《容斋随笔》和清代坊刻本对校，发现五胡乱华、北狄俘虏之苦、北虏诛宗王等条，因清代“深讳‘胡’

'虏'等字，刊者惧罹禁网，故概从删削。"可见宋明人著作是不太能依据清刻本的。

选择版本的原则是很简单的，辨别版本却是很有学问的一件事。因为古代每次刻版不一定有新的序跋，而沿用旧序，特别是坊刻本。还有作伪。有书坊刻书时作伪；有书贾贩卖时作伪，撤掉后刻序，裁掉牌记，以劣本、后出本冒充旧刻、旧本。这种书极多极多，可以说没有一个藏书家没上过书贾的当。如《宋史》，元至正六年初刻本，到明初就极罕见，朱英得到二个好本子后在成化十六年刊刻，写有序。书贾每将朱英序抽掉冒充至正刻，骗了不少藏书家。

选择版本不仅要对版刻有判断力，能背得出几十本书志、目录，还要有广博的学识。张对此是造诣极深的。沈雁冰在他的回忆录里讲："在中国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最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衲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书的跋，可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修养。"除辑刻涉园丛刻外，在编印《四部丛刊》续编，三编和初编再版换版时，张先生也撰有

无数跋，大都从选本版本的角度写的。这些跋文，连同二十四史各跋，一九五六年由顾廷龙编纂成《涉园序跋集录》。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除掉各史跋文外，在一九三八年还在校记中选一百六十四则，编成《校史随笔》，对武英殿所刻史因为校订人对典章制度、字学不熟悉，以致错误百出作了摘发，与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互为发明。张元济还有《涵芬楼烬余书录》、《宝礼堂宋本书录》，著录宋元善本千余种。从这些跋文和书录中可以归纳出他选择版本的方法之一就是搜罗各书版本，考究其源流。一本书的版本源流清楚以后，最有价值的版本就出来了。但是在为《百衲本二十四史》选择版本时，每史还都硬校后才确定的。

影印所选底本是一本初印本，字迹清楚，墨色均匀，影印起来就比较方便。但也会碰到原书纸张有破洞，笔划就会有短缺，另外污迹、霉迹经过照相会把字迹盖没；有的字墨迹淡，底片上，就笔划不全，都要修版。

修版一直是由工人进行的。沈雁冰参加过《四部丛刊》的影印工作，他回忆说："他们文化不高，有时会把一个字的点、捺、横，也当成斑点涂去，造成某些字的缺笔，会与真正避皇帝讳的缺笔

混淆不清。所以又必须有人把修饰过的底片复核一次。”《四部丛刊》初编借江南图书馆藏原丁氏八千卷楼善本，拍摄后工人修饰过的底片就由沈雁冰复校。

为了既要修版，又要减少错误，张元济和工人一起作了长时期的研究和改进，尝试过各种办法，煞费苦心。

先是用仿写。从藏书家董康家里请来擅仿各体宋人字的刻书工人徐之谦，将薄纸罩在宋本模糊字上影摹出来，校对无误后一起照相制版。这样比工人修版好。《四部丛刊》宋刊《盘洲文集》、宋刊《小畜集》都是用这个办法印的。但是能写各体宋人字的人极少，又费工（胡文楷：《张菊老校书琐记》）。

后来又改用“再落石”或叫“套字”的办法。照相后先落在铅皮版上，有模糊字、缺笔各页用浆糊纸翻出，再在其他各页找出同样的清楚字，也用浆糊纸翻出，将这字剪下，盖在模糊短笔字上。再将斑点等其他不要的痕迹用水性白粉涂掉。校对过后把这修改好的浆糊纸落在铅皮版上，用水洗掉原来负载字迹的载体——纸和浆糊，新的版就制好，可以印刷了。这比仿写省事得多。《四部丛刊》

的《金华黄先生文集》等都用这个办法，也成为影印中修版的主要方法（胡文楷：《张菊老校书琐记》；丁英桂一九八一年五月访问谈话）。

但是遇到很多页都很模糊的，这两种方法都不能用，就找其他本子，找到不模糊的页子，叫“补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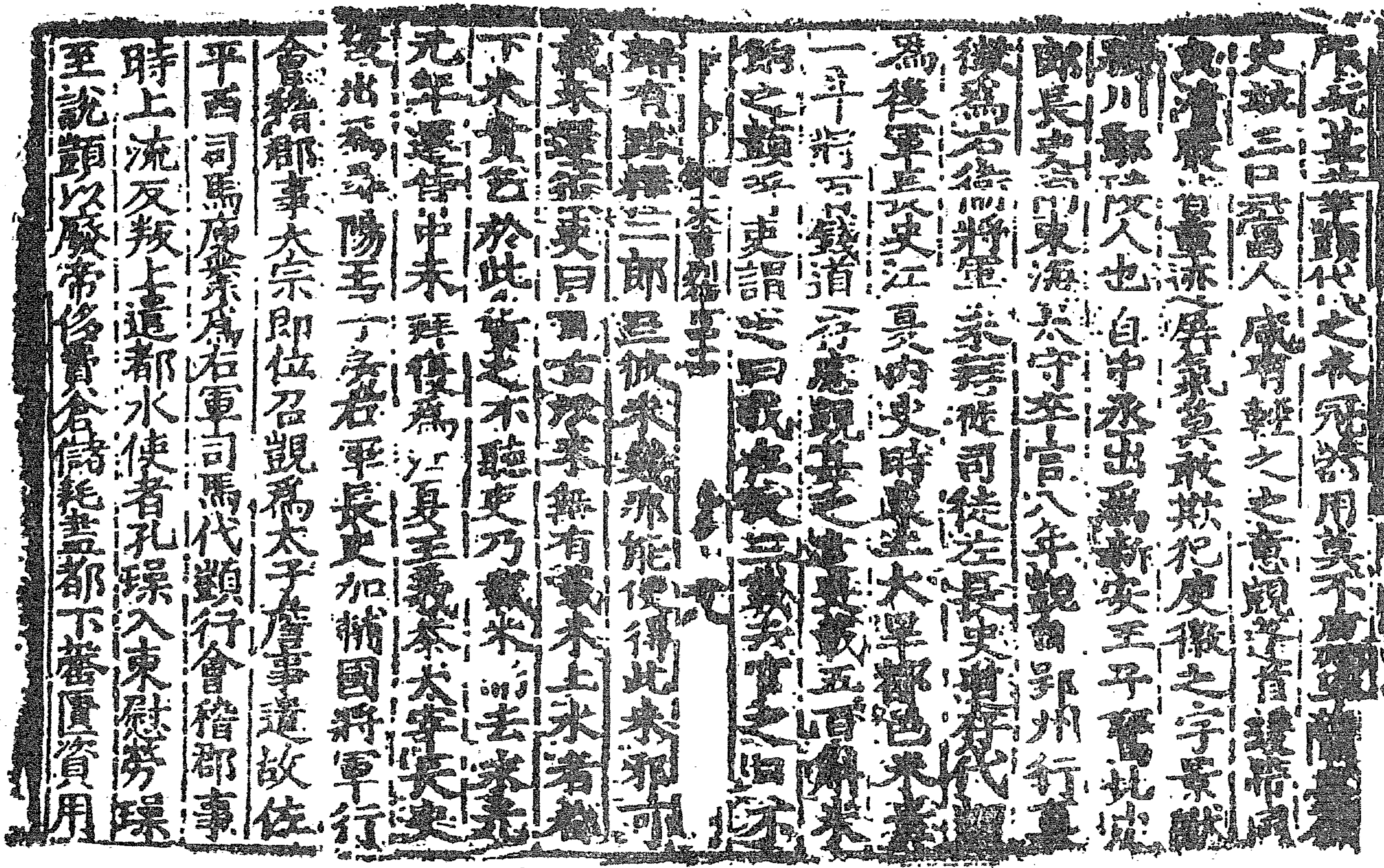
也有根本找不到可以补配的。于是就有用拍两次照的传真版的发明，即所说“描润”。原书拍照以后，印出底样，用白粉把不要的脏点涂掉，有断笔、缺笔、墨迹花淡的笔，用硃砂描好，复校无误后用这修改过的底样再照相，就得到完全改观的底版（张元济：《记影印描润始末》；胡文楷：《张菊老校书琐记》）。二十四史眉山七史用这个方法才得以印成。请对照224—225页附样。

手稿又有手稿的特点。《四部丛刊》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是用顾炎武手订抄稿影印，因而比当时所有传抄本的价值要大。但是影印时极费工。《天下郡国利病书》手稿先由顾的学生抄录，再由顾炎武自己手订。手订时有大量眉批。眉批字极小。制版时采取每页书先照两次相，一次缩小，将原稿缩至六开本大小，照顾顾炎武学生的笔迹。一次放大，照顾顾炎武后来增加的小字。这一缩一

放，两种大小不一的字体就基本一致。分别印出底样，根据原来文字段落次序，作好注码，将放大了的眉批按码贴好，修饰后校对无误以此再拍第三次照（丁英桂一九八二年七月访问谈话）。我们能见到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如果不和原稿对照，完全看不出当初经办人员的辛勤劳动和商务的不惜工本。

张元济主持的影印工作应该一提的是找回了一大批失逸书，同当年黎庶昌、杨守敬辑《古逸丛书》一样，只是数量要多得多。

一九二八年十月，他以中华学艺社名誉社员身份和郑贞文、周昌寿东渡日本访书。中华学艺社是留日学生组织的学术团体，和日本学术界有良好的关系。其中很多基干社员周昌寿、杨端六、何公敢、郑文贞（总干事）、陈承泽、江铁、林植夫等都是商务的重要编辑，商务当局对中华学艺社也多方支持。后来中华学艺社提出，由商务出资，以他们名义向日本借印一部分书，一小批内封牌子印“中华学艺社向日本借印”，非卖品，供学艺社员用；大批内封牌子印“商务印书馆转印学艺社印本”，公开发行。日本方面默认这个办法。商务当然求之不得。因为可以打开日本图书馆界对商务一



所乘坐輦[illegible]代之衣冠器用莫不[illegible]
史孰三日爲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覬之[illegible]謂帝[illegible]
[illegible]演之[illegible]謀[illegible]辱氣冀敢欺犯度微之字景獻
[illegible]川[illegible]陝人也自中丞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
郎長史[illegible]東海太守[illegible]八年[illegible]郢州行事
[illegible]爲右衛將軍[illegible]徙司徒左長史[illegible]代[illegible]
爲後軍[illegible]史江夏內史時[illegible]太守[illegible]
一斗[illegible]錢道[illegible]覬之[illegible]五百[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吏謂之曰[illegible]
[illegible]三郎[illegible]能使得此耶[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有[illegible]未上[illegible]
下[illegible]於此[illegible]不聽吏乃[illegible]去[illegible]
元年[illegible]中未[illegible]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
[illegible]出爲[illegible]陽王子[illegible]君平長史加輔國將軍行
會稽郡事太宗即位召覬爲太子詹事遣故佐
平西司馬庾業代爲右軍司馬代覬行會稽郡事
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璪
至說覬以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

传真版书修版前面貌

服玩甚華顗於之我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
史奏三日前啚人咸有輕之之意顗遂首緩帶風
與濟殷異事跡辭氣莫敢欺犯庾徽之字景猷
潁川鄢陵人也自中丞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
郎長史帶南東海太守孝官八年覬自郢州行事
徵爲右衛將軍未拜徙司徒左長史道存代顗
爲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
一斗將百錢道存慮顗甚之遣吏載五百斛米
餉之顗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

辦有路糧三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邪可
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
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米光
元年遷侍中未拜復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
復出爲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加輔國將軍行
會稽郡事太宗即位召覬爲太子詹事遣故佐
平西司馬庾業爲右軍司馬代覬行會稽郡事
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璪
至說覬以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

传真版书修版后面貌

直封闭的大门。

商务编印续古逸丛书时经叶德辉手（郑贞文说经董康手，误），借印静嘉堂所藏我国失传已久的北宋刻本《说文解字》。这本书日本视为至宝。因为事前没讲清，印出后引起日本汉学家不满，相约不再借书给叶德辉，并防止日本所藏再落入商务手里。

张元济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收集、研究日本各藏书单位的书目，弄清了日本所藏我国失逸图书和版本的清单。到日本后，在日本宫内图书寮、内阁文库、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京都东福寺、足利学校等处浏览了这些珍本。按照事前的协议，对其中近五十种图书摄照了底片。此后还通过信件代为拍摄各善本。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这个关系才中断。

这批书摄照来后有的马上就影印，如《吕东莱集》、《平斋文集》。有的陆续印行，如宋版《太平御览》、《武经七书》、《群经音辨》等等。有的到解放后才出版，如《古今小说》、《二刻》。有的因故一再反复至今没有印成，如宋版残本《册府元龟》（但是这个本子的明刻所删的部分一九六〇年中华影印明刻时已经补入）。

把一批散在各家的残本拼凑齐全，使之“破鏡重圆”，也是一种找回失逸。这种书很多。影印宋本《太平御览》是以日本宫内图书寮、静嘉堂文库、东福寺三处残本和国内原有的残本拼成的。《说文解字系传》张石铭有第1—29卷影宋本，铁琴铜剑有第30—40卷宋刻本，由商务为之两相匹配加以影印。黄善夫刻史记，是国内三家、日本两家，五家藏的残本拼全影印的，不说一部书拼齐要花多少心血，就取得这些藏书情报，也要有相当能耐。

《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张元济影印古籍用力最劬的一部大书，共三千三百零一卷，分订八百二十册。准备工作用了十年。一九三六年九月他致朱希祖信：“敝馆辑印古本正史，弟从事于此几及十年。近渐就绪，拟即开印。”一九三〇年开始印，到一九三六年完成，共用十八年。

清末民初二十四史流行本都是清朝武英殿本和它的翻印本。武英殿本仅两汉、三国、晋、隋五史翻宋元刻本，其余以明监本二十一史作底本，刊刻时校正了明监本的许多疏漏、错误。但没有校尽，象《史记》三家注，明监本删去一千九百四十九条，清武英殿本大都把它们补入了，但仍脱落一

百多条。武英殿本还以满族的民族压迫观点对一些史文作了窜改。所以武英殿本和明监本都不是使人放心的版本。要一个接近祖本的版本。《百衲本二十四史》从这点出发，各史选最好的版本影印成一部版本最可靠的史书。

现在还保存有大量涉及辑校二十四史的往来信件，还有一些其他材料。归纳起来，在准备阶段，大量的工作是搜罗各史古本，并进行校勘，在校勘后确定某史用某一版本印。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五日张致傅信，谈《晋书》情况，他说："此书弟已校过四种，可谓一无善本"。又，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信："承假南齐书，去腊校读一过，撰有后跋，谨呈阅。又校阅魏书，宋书、陈书、齐书均已竣事。亦各撰有后跋。各书均另有校记，多者至千数百条，并呈上。"可见比较版本，硬是逐一校勘后选定的。这事由他一人进行，别人无法插手。

虽然影印二十四史准备工作前后达十年之久，集中工作是在一九二六年退休以后。在前，他自已闷声不响在准备。退休后，在一九二七年三四月间，与朋友们的信里已谈到"影印全史"了。在一九二七年十月，第一次拟用版本目录已经出来。其中《宋书》、《梁书》、《陈书》、《新五代史》

已经校过。次年初，说：“影印旧本正史，极拟于本年内发售预约。迩来一意校勘。”（见《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77—178、185页）。

全史后来印成时的底本情况和一九二七年初次拟目变动极大，变得更完善。他在总序里说：“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每有所觏，辄影存之。后有善者，前即舍去。积年累月，均得有较胜之本。”如《史记》原拟用涵芬楼、宝礼堂、双鉴楼国内三家所藏黄善夫本七十五卷，以震泽王氏刻本配齐。后来从日本借来残本，全部都用黄刻。

唯一后来以次本付印的是《周书》。本来准备以涵芬楼所有眉山七史本付印。这个本子十分之七八是以宋版刷出，印得极精。一二八时正在工厂摄制，被炮火焚毁。后来用潘承厚所藏元明补版较多本子印。

一二八时二十四史已制好的底版全被毁，幸好校本都存在张先生家，没有损失（《尺牍》283页），后来可以重新制版印刷，全书才得出齐。

一九三〇年开始印刷，第一期出《汉书》。《汉书》底本好。第二期书是《辽史》、《金史》和《新五代史》，底本印刷模糊，改用前面提到的

描润办法修版。张元济撰有《记影印描润始末》一文(《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已收该文),详细叙述描润办法和手续。修润模糊的字先要知道这字应该是什么字,它是什么字。修润后要校对是不是修成这个字,所以要一再校核,事务极繁。于是成立校史处,由蒋仲茀、姜佐禹先生主持,帮助他进行。他自己仍任总校,每一页书,他至少亲自校三遍:修润前他逐页批出应如何修(见《书札·致丁英桂》各书制版规则);修润后他校一遍;重新照相制版后他再校一遍。最后付印时他一页一页签字。胡文楷先生说:"菊老校百衲本二十四史,逐页签名,填注年月日;复样时,逐页批可印,然后付印。全史无一页漏去。"加上他在选择版本时的校勘,一共要校多少遍呀!

他"校书极速,《汉书》校样六页(六页为印刷的一单位),快者十八分钟,迟则二十三分钟。"校样一天两批,"每天校样上午十时由商务送出〔至他家〕,下午三时〔由他家〕送回。下午四时由商务送出,明日上午九时送回。无一批搁积。前后六七年,未曾脱班。菊老在庐山避暑,则由邮局递寄"(胡文楷)。当时商务还在编印《四部丛刊》二三编,相当多的书由他校勘,写跋,以及调度。

他说："近为商馆校勘四部丛刊最后数书，夜以继日，忙冗异常"（《尺牍》206页）。从《书札·致丁英桂》各信看，当时工作量之大，令人钦佩。

一二八之后复业，商务樽节开支，裁掉校史处，他的事情就更忙。"影本既成，随读随校，有可疑者辄录存之。每毕一史，即摘要以书于后"，即写跋。每史跋文除交代底本来历外，都还讲述该书的版本源流，该本和武英殿本大致的校勘所得。有些版本历史上曾有过误会的，通过校勘所得，有所澄清。

二十四史完成以后，他撰有《校史随笔》，记述校史所得一百六十四则。是本极值得一读的书。在有线装书的图书馆里极易找到：里面除了讲述版本的条目外，读起来非常有趣，诸如鸣衣、述职、钩鱼、沟者等条，对典章制度的了解会有好处。霜俭、皇甫政杀妊、舌中血出、鬻纸等条，以及大量摘发明、清刻书多错字的缘故，读了对做学问的方法会有所启迪。

张元济对书籍的形式也很有研究，也讲究。他在《宝礼堂宋本书录·序》里颂扬了我国宋版书写工、刻工、用纸、装订的讲究质量，使人"每一展玩，心旷神怡"。他对书的印装讲究，要"惟其

精”。他曾对丁英桂说："书板上下左右，俱宜宽展。否则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此于人生，甚有关系，不仅系于书之格式也。望诸公注意”（见《书札》237页）。他反对“藉口于推广文化，谓出版之事，不惟其精而惟其廉。”他说书籍字排得密密麻麻，纸粗墨次，装订陋劣，不是推广文化而是剗灭文明（《宝礼堂书录·序》），十分有道理。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里讲："予任其劳而使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人乐其易，不亦善乎。”张元济主持的影印工作使人受益不浅，他和其他从事这一工作的人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

本章主要引用材料

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
张元济：《影印四部丛刊启》
张元济：《题朱遂翔抱经堂藏书图》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郑鹤声等：《中国文献学概要》
《影印四部丛刊卷》
张树年一九八二年谈话录音第六盘
瞿凤起：《答友人问》

《张元济日记》
张元济：《跋今献汇言》
张元济致吴梅信（1932年）
孙毓修：《四部丛刊书录》
张宗祥：《说郛序》、《冷僧自编年谱》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鲁迅：《且介亭杂文·病余杂谈之余》
沈雁冰：《我走过的道路》上册
胡文楷：《张菊老校书琐记》
丁英桂：《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访问谈话》
张元济：《记影印描润始末》
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张元济与长泽等日本友人往来信（1936—1937年）

十 七

闲暇和情操

前面一章提到《说郛》因为卷帙浩繁而失逸。类似的还有《夷坚志》。《夷坚志》是编写《容斋随笔》的洪迈的另一部笔记小说。《容斋随笔》注重经史百家、文学艺术和宋代掌故。《夷坚志》是他晚年消遣之作，著录神怪故事、异闻杂录。其书收辑故事一味炫示怪异，以多为胜，不加抉择，非常芜杂。后来周密批评他"贪多务得，不免妄诞"。虽是志怪小说，其中亦杂有一些现实故事和轶闻、掌故、方言、民俗、医药等足资考证的材料，也是研究宋代社会的有用材料。《夷坚志》篇幅大，分《志》、《支志》、《三志》、《四志》四大集，每集一、二百卷，共四百二十卷。洪迈编写时，完

成一集就传抄或刻版流传一集，始终没有合刻过。元代编《宋史·艺文志》，《夷坚志》著录仅一百四十卷，可见当时已有所散逸。清代编纂《四库全书》，仅著录《支志》的一半，即五十卷。明清两代虽多次刻印，都没有超过一百卷。

辛亥前后，政治变化，引起大户藏书重新散聚，各种罕见书籍时有出现。《夷坚志》有六个不同版本的残本出现。目录学家缪荃孙曾以清代藏书家黄丕烈校定旧抄本一百卷校正明代人吕胤昌刻本和清代周信传刻本，建议商务影印。张元济考虑：一本书散失掉是很可惜的，应该尽可能复原，而缪荃孙校勘并未从恢复原貌出发。所以想自己动手校辑这本书。他的校辑和缪荃孙正好相反。他以湘潭刘思亮所藏上述黄丕烈写定旧抄本一百卷和严元影宋手写本八十卷为底本，而用其他本校正。因为“严黄两氏均校勘专家，下笔审慎”，而且有案可查，两个写本都是根据宋本，比前述吕、周等后刻本自然可靠得多了。又以各后刻本和严黄两抄本核对，辑出与两抄本不重复部份二百七十七则成《夷坚志补》二十五卷。又在《宾退录》、《诗话总龟》、《桯史》、《名医类案》等十多种书里辑出已失逸的三十四则成一卷。名《再补》。这部新本

子称为《涵芬楼校辑本》，成为通行本子中最完备的本子。

由于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极忙，不可能有整段时间辑校，于是他利用在轮船上、火车上以及夏季避暑时间进行。前后进行了将近十年。校辑完毕后付排前的整理工作是由胡文楷经手。胡回忆说："菊老编校洪迈《夷坚志》用力最劬。余曾见其校稿，朱墨灿然。有注云，'某年月日，在赴港轮中，又校一过'。或注云，'某年月日，在火车中校毕'字样。计其前后，已逾十年，民国十六年，方始付印。"

他的闲暇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

他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什么嗜好。他家住在极司非尔路的时候，有一个小花园，请一位花匠，他早上起来散散步、看看花，偶尔也帮着剪枝、剪草，喜欢花。

除了工作和读书以外，张元济还偶尔听听昆曲。他认为昆曲是最文雅的剧种，能够陶冶性情。他听昆曲总喜欢带一本《集成曲谱》，即"听"而不是"看"戏。或许是这种爱好，或许是对我国文化的深刻了解，在非常困难的时候，他主持了《孤本元明杂剧》的出版工作。

在元明，杂剧流行，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尤其是杂剧的成就更高。因为文人历来轻视戏曲，“不登大雅之堂”，明代臧懋循编《元曲选》，其余的湮没极多。明人赵琦美在臧懋循之后收集和抄校有一大批杂剧，称做《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这批收藏远比《元曲选》为多，是研究戏剧史的重要材料。赵琦美后，这批杂剧先后被钱谦益、钱曾、张远、季振宜、何煌、黄丕烈、汪士钟等藏书家辗转收藏，在书录、书目上都有记录。汪士钟后，就去向不明了。郑振铎在抗战前曾千方百计打听过，始终不得要领。一九三八年五月，这批书突然在苏州发现。郑振铎听说后马上动作，已经落到了一个古玩商手中。后来代当时北平图书馆化了九千元买到了这六十四册抄本。

这批书赵琦美手校时有三百多种，现在六十四册只剩二百四十二种，三百年来丢失了一百另一种。经过清理，这二百四十二种共有稀世孤本已经失传的一百三十二种脚本，实在是十分可珍贵的。郑振铎认为只有敦煌唐写卷的发现可以与之媲美。为防止湮没，经过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书信商量，由商务印书馆选择其中孤本校订排印。

一九三九年四月初把这批书郑重移交给商务，

张元济阅读一过以后，五月开始照相，提出初校意见，请王君九进行校订：确定是否孤本，考订著者，并且订正体例和误字。然后由姜佐禹责任编辑复看。到次年六月开始发排，又一年，一百四十四种孤本脚本出版，定名《孤本元明杂剧》。王君九根据校订所得，撰有各剧提要，同时出版。《提要》排版后，姜佐禹看过校样后再请著者王君九看。前后两年，张元济居于王姜之间，每有授受，他都要看过一遍再传递，那时是抗日战争期间。上海租界已成孤岛。在孤岛校排孤本，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从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每年印书要用三十万令纸。但是很难想象的是指挥这么大一个每年营业额上千万，盈余百多万元的出版社的张元济，除了社交信件以外，都是用纸边，或者用背面空白的废纸写信和拟草稿；内部传递，一个信封要用几次。他办公桌"案上木插内之废纸，抽屉内之旧信封，及椅背之绳索"从未断过。他的忘年文字交顾廷龙后来问过他，为什么一个信封还要翻过来用。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海运受阻，进口物资缺乏。那时纸张大都靠进口，很困难。从那时养成了利用废纸的习惯。恐怕在他少年丧父以后，他

家的生活就比较艰苦，养成俭朴习惯，也有关系。

他在给他侄儿树源和儿子树年的信里就讲到年青人读书时“能吃一番苦，日后必有受用之处。”后来七七事变，平津大学生流亡到上海南京，他写了一篇《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文章除了主张安顿学生使得有书可读，和主张沿海各省应尽早迁校内地外，检讨了他所参与的四十年来提倡新教育的缺点，“就是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的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结果是，“造就了许多新人才，做成了许多新事业，国家受了不少的益处。但是在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佚、贪污、诈伪、鄙贱、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使我们国家糟到这样的田地，不能不说也是它的结果。”

他所指的“人格”、“德性”的教育内容很大程度上是指俭朴。他认为当时繁华的上海不宜于办学；清华大学浴室存放衣物的柜子要从美国进口，南京中央大学那种宫殿式的房屋，都不是办学的正道。“人们物质的享用太过，久而久之，目的只是金钱，其他什么都可以不管。这种纨袴的教育，傀儡的教育，真是亡国的教育。”他俭朴，但不吝啬，更不主张吝啬。当用，“虽费万金固无伤于俭德，否则即糜一文亦不得谓之非奢也。”

他是涓滴不苟取的人。他写私人信不用公司的信笺信封，而只能让公司占他便宜。一九二六年他退休后，义务为商务编校了十年的古籍。他对伍光建讲，《四部丛刊》等尚称有利，其他旧籍利虽不厚，但这些书却能长期销行。商务在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因为影印古籍而提高了声价。但他完全尽义务，甚至书出来后连样书都不要。后来总经理王云五、经理夏鹏、李宣龚联名请他收受二千元津贴，他坚决不收。

张元济退休前，遇有身体不好，精力不够，上班而不支全薪。请假有扣薪制度，好办；至于精力多少是无法衡量的，发半薪"于法无据"，董事会决定不能扣。而他决定了的事是从不改变的，坚决不拿。会计只能把这笔钱按存款处理，到一九二五年底本息已有五千一百多元，大部分是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一七年的。我们查《张元济日记》，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一七年他处理的事并不少。一九二五年底商务停止办理一般存款，请他提走。他说公司既然不收回，我更不能收，建议拨交商务印书馆扶助职工子女教育基金委员会，充作基金，作为低薪职工子女入大学的补助（公司补助基金仅限于补助中学）。他说："常见有贫家子弟资质聪颖，限于生

计，不能受高等教育。世间憾事，至为不平。吾终盼吾公司同人俸入至薄、生事较艰者，其子女有大学毕业之一日。”

当时工人的工薪很低，能有机会念中学的子女不多。职工子女教育基金大都是低薪职员享受。一九二九年他在教育基金会报告上见到有三名工人子女领取中学补助金，十分高兴。他写信给委员会主席庄俞说：“真正工人之子已有三人，补入中等扶助额，闻之甚喜。弟及生倘能见吾工人之子在大学毕业，则此愿偿矣。”二十年代有这样的感情，应该说是很可贵的。

解放前一般说来商务的职工福利比同业要好一些。比如女工产前产后五十六天照发工资的产假，在一九一三年上半年就开始实行。这在旧中国是比较早的。这是张元济在同年四月一日向董事会建议而被接受的。商务上层比较多的人主张对工人的福利略多一些，高梦旦也是这样主张的。

在《同舟》一九三四年二卷十期上有一段文字：“商务印书馆有一种极好的风气。都是几位前辈先生所养成的。什么风气呢？就是先公而后私，轻利而重职。夏、鲍、高、张诸先生，在公司办事时，每日必先众人到馆，后众人出馆。偶然及时不

到，必然因公在外奔走。散值时又将馆中未了事件实之皮囊，携回家中办理，翌晨到馆，即将批阅文件，或批就文稿，分交各主管人员。张先生不在馆中办事已有多年，其实每日在寓为馆所办之事，比之在馆时，有过无不及，而对于报酬分文不取。就其亲自校订之书，出版后送其一二部作为纪念品，亦必谦逊不受。遇公司有重要问题时，立即挺身而出，尽力帮助。平时疾恶如仇。数十年来不知不觉养成一种风气，稍知自爱者，无不翕然成风。”

先公后私、轻利重职、疾恶如仇，商务一些人确有这样一个作风。就张元济讲，“疾恶如仇”四个字后还要加“不畏强暴”。最被人称道的事是一九二三年为乐志华案件和租界外籍侦探斗争的事。宁波人乐志华在一个租界巡捕房西籍侦探家服务，才上工三天，那个侦探说丢失了几百元钱，说是他偷的，把他抓到捕房，自己动手严刑拷打。乐志华已经屈打成招。张元济知道后，为他请了律师，自己也出庭作证。经过辩论，乐志华当场被开释。他看到乐志华的遍体伤痕，不禁为之泪下，请医生为之验伤和治疗，一面动员上海宁波同乡会控告巡捕房。结果胜诉，捕房赔偿乐志华医药费和疗养费一千元。这个案子哄动一时，——租界上中国人和外

国巡捕房打官司，打赢了，十年后还有人谈论。

一九三八年七月间，租界捕房抓了商务印刷厂宣传抗日的几名学徒和工人。八月七日，张元济写信给商务经理李宣龚，说："本馆被拘学生工友久不释放，如此天气殊可忧虑。"后来有两位被判强迫出境。八月十九日，他写信给印刷厂长丁英桂，问："贵厂同人被捕房强迫出境。蒋文桂宋希文二君，其家属如何情形？月得工资若干，在公司共有若干时日。乞示。"后来安排他们在香港工作。

他是比较关心工人的。

工人里他最熟悉的是石印制版工人。共有五十多人，每人技术高下他了如指掌。徐震冰技术最高，"能凭空摹仿宋元旧刻字体，惟妙惟肖。"影印难修的字都由徐震冰修版。徐震冰后来患瘫痪症，无钱看病，由张元济出钱治疗。

商务印书馆前后有三位独当一面的人：夏瑞芳、张元济、王云五，职工在背后称呼夏老板、菊老、王云五。据多年和张元济和王云五接触的商务老职工讲，三个称呼反映了商务职工对三个人不同作风、性格的看法和感情。

"老板"，不仅是指资本家，还指一个人的气度和魄力大，是一个赞赏性的亲昵称呼。夏瑞芳出

身低层，了解工人的疾苦。想搞出版而自已文化低，对编辑比较尊重。传说他规定工友一律尊称编辑为老爷而不称先生。

“老”不单是年龄的表示，意味着德高望重。一般说来，称人“老”，都带有敬和爱的感情。但据多年和张元济接触的人讲，称“菊老”时，敬的成分多而较少爱的感情。这和他对人要求过严有关。然而他之受人尊敬正在于他所要求于人的，自已都极严格地做到。

直呼其名，按解放前的习惯总是不太尊重的。这和王云五太讲求“实际”有关：在名利观念上，他和张元济截然不同。在他掌握商务的实际活动以后，“王云五主编”五个字是商务出版物封面和内封上的“最常用字”。而在张元济，他从来不这样干。商务有四大辞书：《辞源》、《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这四部工具书张元济都顾问整个编辑工作，具体工作分别由陆尔奎、臧励和、谢观主持。书籍出版时，都由这几位具体主持的人署名或署主编。前两种他参加具体词条的编写，他的姓名和其他编纂者一起，按姓氏笔划多少排列，后两种他没有做具体工作，就不署名。

《四部丛刊》他花了多年心血编选，有一个发起人名单，他名列最后。《续古逸丛书》完全是他一个人编选的，他根本就不列编选人姓名。

在《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里有三封有关《丛书集成》的信，清楚了谁是这部丛书的发起人，商务的内部材料说明，《丛书集成》选用一百部丛书，一百部丛书中的重复部分何书选用何丛书本作底本，这个关键性的工作是张元济负责进行的，助手是东方图书馆中文编目主任翟翥。《丛书集成》原来准备缩印原本的，后来改为断句排印和缩印原本各占一定比例。我们现在还能见到张元济给馆外校点者指出断句错的信。但是在《丛书集成》的各册上，我们在内封上只能见到那花力不多的五个最常用字："王云五主编"，而找不到为这部丛书花极大精力者张元济的名字。

本章主要引用材料

涵芬楼辑本《夷坚志·校例、跋》

胡文楷：《张菊老校书琐记》

张树年一九八二年谈话录音

郑振铎：《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劫中得书续记》）

孙楷弟：《也是园古今杂剧考》
张远：《无闷堂文集·卷七》
《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卷》册一至册七
《张元济书札·致丁英桂、致高凤池、致宁波同乡会》
王君九：《元明杂剧提要·序》
顾廷龙：《一九八二年讲话录音》
张元济致伍光建信
张元济：《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
张元济致商务印书馆扶助职工子女教育基金委员会信
张元济致庄俞信
高凤池：《本馆创业史》

十　八

在民族灾难面前

《百衲本二十四史》出齐以后，正在准备的《四部丛刊》四编和《国藏善本丛书》的影印工作，由于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迫使全部停顿。

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百年里，在我国国土上，战火从未停过，对商务影响最大的是一九三二年一月的“一二八事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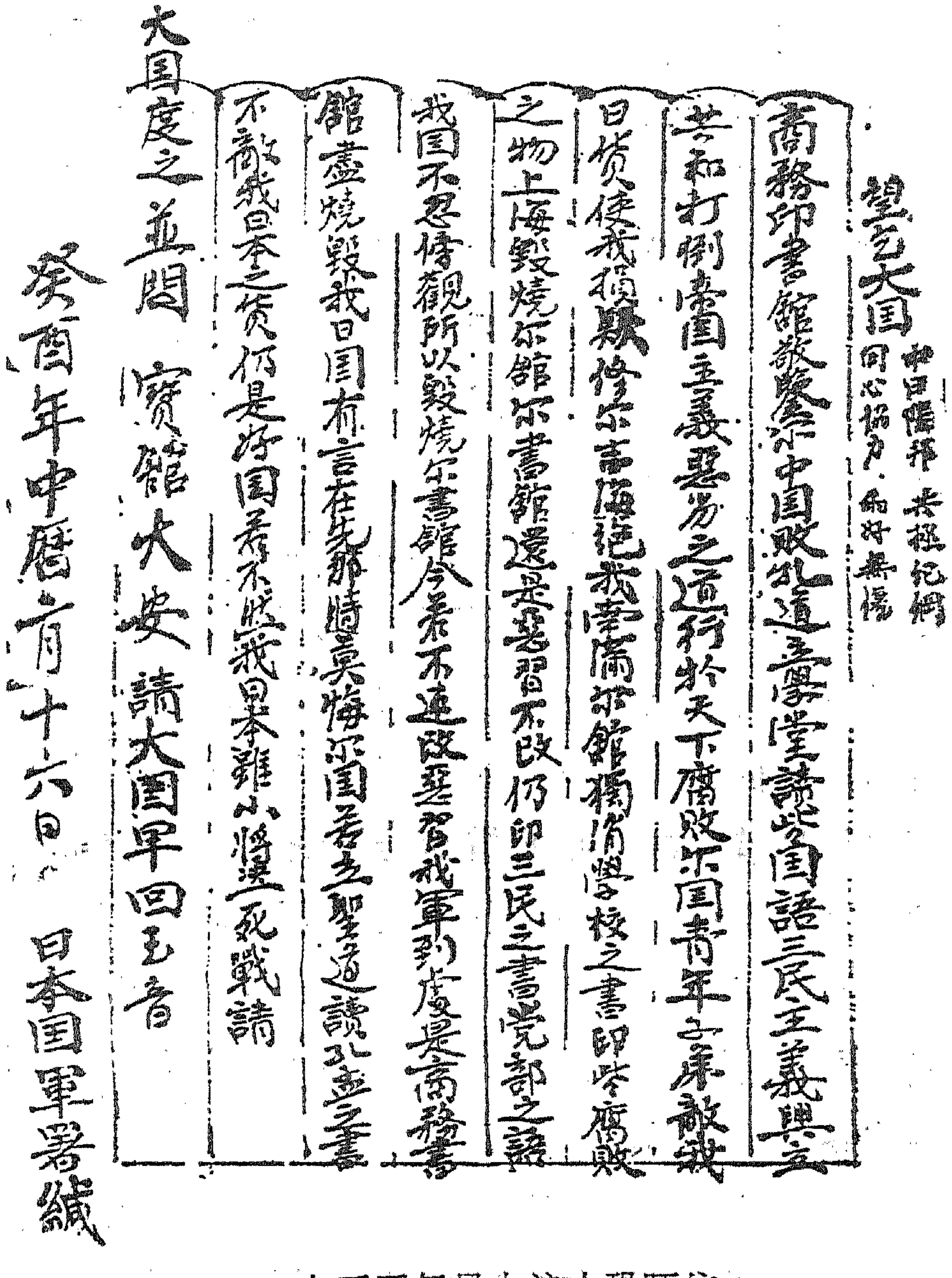
一月二十八日晚，日本在闸北燃起了战火，三四个钟点以后东方发白，商务印书馆这个和平的文化教育事业机构突然成了日军飞机的军事目标，飞机在商务的厂区投掷了六枚燃烧弹。枢纽机关总务处、印刷总厂第一、二、三、四印刷厂和纸库、书库、存版房、附属尚公小学都被烧毁。次日，厂

区刚刚烧尽，编译所、马路对面的东方图书馆和研究所又被日本浪人纵火燃烧。

实藤惠秀在《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一书里讲，商务“是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在上海事变之前，每年新版书在四千册左右，大部分的抗日教科书是它所印刷。上海事变时，它是中国部队的据点，因此成为我军的轰炸目标，这是大多数读者记忆犹新的。”

实藤先生想把日军焚烧商务印书馆归原于“它是中国部队的据点”，变成一种军事对抗而减轻其罪责，是极不严肃的。因为商务厂区并无驻军；投掷燃弹和纵火，不是军事杀伤。“抗日”教科书是一个原因。当时日本浪人的恐吓信承认了这点。（见249页恐吓信）

无法以数计的纸张、油墨、书籍形成的火的强大的上升气流，把已经变成灰烬、正在燃烧着的纸片带上天空，再飘落在四处。整个上海的天空布满了纸灰，冬天的阳光竟难以透过，黑沉沉的纸灰把闸北的枪炮声都盖住了。中文的、外文的报纸，中国的和外国的通讯社都报导这场大火，每个正直的人都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可能这就是一种“吸引注意力”来遮挡东北正在上演的傀儡剧。



望乞大国 中日儒邦 共极纪纲 同心协力 希将无隐

商務印書館教養小中国敗北道之學堂讀此国語三民主義與交

共和打倒帝国主義惡劣之道行於天下腐败尔国青年之序敵我

日货使我損失修尔商海絶我常偷尔館獨有學校之書印些腐败

之物上海毀燒尔館尔書館還是惡習不改仍印三民之書党部之語

我国不忍傍觀所以毀燒尔書館今若不速改惡習我軍到處是商務書

館盡燒毀我日国有言在先那時莫悔尔国若走聖道讀孔孟之書

不敵我日本之货仍是尔国若不然我日本雖小將以一死戰請

大国度之並問 貴館大安 請大国早回玉音

癸酉年中曆三月十六日 日本国軍署緘

一九三三年日本浪人恐吓信

大火中烧毁的可以计算的物质财富，合银元一千六百三十三万元。无法计算的，有无数正在排版的书稿，东方图书馆里未及运走的四十多万册中外文书和几部稀世孤本。“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

林换劫灰。”在这场炮火面前，我们可以想象这位惨淡经营商务三十年，苦心为涵芬楼搜罗精本图书的老人当时的心情。

商务虽然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张元济并没有灰心，更不悲观，决心重新干起，虽然他已经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了。他在答复朋友们的慰问里说："国难方亟，后顾茫茫。长此以往神州且将陆沉，敝馆区区更何足惜，元济一身尤不足齿数矣。""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很多人鼓励商务印书馆的恢复，有愿以低息借款的，有愿借给房子恢复东方图书馆的。恢复商务，是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表现出不屈的民族气概。他说："元济一息尚存，仍当力图恢复，"谢绝了一切支援，收拾烬余，半年后商务印书馆终于复业了。

他懂得，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步步进迫，正是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结果。商务印书馆的命运不能离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决定恢复的时候他就讲："所最望者，主持国事、皈依三民主义之人真能致民于生，而不再致民于死，则吾辈或尚有可措手之处。否则，摧灭者岂仅一商务印书馆耶。"

“九一八”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更高了，但国民党当局倒行逆施，在白区，加强了法西斯统治；对苏区，加强了“围剿”。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宣传抗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国民党密令查封。张元济是素来主张言论自由和抵御外侮的。在上海，很早就会感觉到国民党对言论自由的摧残。在一九三〇年四月给朋友的信里，他就忧虑地说：“恐怕‘革命’成功之后，统一专制局面又要回来了，学术思想的自由仍旧无望。这怎么好。”《生活》在宣传抗日遭到封禁，他非常愤慨。

辛亥前，他就发誓不和官府打交道，叫“名不入公门”。这时他破戒去庐山见蒋介石，希望能对《生活》启封。蒋介石对他敷衍一番，《生活》仍然没有被启封，他也无可奈何。后来，救国会七君子被捕，他亲自到看守所探望被捕人士，表示抗议。

一九三五年，继“塘沽协定”以后，国民党政府又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接着冀东事变、“华北政权特殊化”、“华北反共自治运动”、“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危机达

于极点。另一面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了有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奋斗。“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形成了新高潮。

人人都在考虑。张元济在给黄齐生的信里讲，国土接连沦丧的原因是国民党治国诸公“只知有身家，不知有国”，因而“图存之术”“唯在吾民”——救国大业只能依靠人民自己了。

一九三六年初，商务极核心的几个人商议适应时局变化的方针。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的董事会上，请追认三个月来作出，并已经在进行的重大决定：一、保兵险；二、在长沙购地建设印刷厂；三、疏散上海存书，除教科书外，以百分之五十五派发至各分馆和香港分厂。但是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四分馆不发；汉口和香港作为商务的“分栈”而“特别多派”。这个布局很清楚地看出，商务准备适应进一步变化的局势，立足于长期抗战。

由于商务比较早往香港和西南一带疏散存书和机器，东南沦陷后，那一带有相当一段时间有书籍供应。这批资产往西南移动，加强了商务后来在西南抵御战火创伤的能力。是非常高明的决

策。

这些决定是在张元济和高梦旦、李宣龚作了一次“四川之游”回来决定的。四川之游在年初本来准备和叶揆初一起去，后来叶换李。这四位都是商务董事，张、高、李都是决策人物。四川之游不是单纯的旅行。他们在重庆和成都作了较长时间的逗留，和卢作孚等实业界人士作了广泛的接触，特别对四川手工纸的质量、价格、产量和提高质量、产量的可能性作了详细的调查，对经营长江航运的民生公司也作了相当的了解。七月初回到上海后就作了前述长沙建厂、疏散等三项决定。

四川之游回到上海后不久，高梦旦逝世了。

> 归途，高梦旦患肺炎，到上海后住宝隆医院治疗，肺炎很快痊愈。因为晚上失眠和焦躁不安，医生用安眠药过量，发现后又不及早抢救，以致身亡。

高梦旦从一九〇三年进商务印书馆以后，一直是张元济的重要助手和参谋。不单业务上，而且因为他处事待人方中有圆，待人以诚，不论新旧老幼都处得和洽，正好弥补张元济过于认真和个性强的缺点。

有位和他多年接触的老人说：“张菊老之要

求严，很多人是受不了的。一个好处是他对自己严，否则更不行。他在一个封建社会，出身于上层，内心中间很骄傲，实在是很看不起人的。……而且脾气非常暴躁。有时提出使人难堪的条件。章锡琛离开商务，他（张）有很大的感情作用。但平心而论，他使商务成为一个正派出版社。”

高是商务高层里不可缺少的“和事佬”，因为他而保持了高层几十年的一致。他的逝世，张元济如同失了左右手。俞明岳先生说，后来，直到解放前，他遇到不顺手的事情，总是习惯地叹口气，说一声“可惜”。慨叹夏瑞芳、高梦旦先后离开了人世。

那一段时间，他熟悉的人离开人世的不仅高梦旦一个。一九三四年五月，他夫人患肺病逝世。

在他写的《告窆文》里他讲，他夫人在弥留之际同他讲，那天正是他们结婚的三十九年，如果能多逗留一天，就可以算四十年夫妻。可见他们夫妻之间三十九年的共同生活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夫人支持他的事业，在他决定投资商务印书馆以实现他用出版物辅助教育的主张时，毫不迟疑地把结婚时带来的首饰拿来变卖，也支持

他提倡薄葬。

庄俞、徐珂等多年在一起的商务同人，陈三立、熊希龄、蔡元培、丁文江等早年事业上的同志和汪兆镛等学问上的朋友逐一凋谢。他说：“乱世失相知，凄绝听丧钟”，“良医良相尽，此事最堪哀。”民族灾难加上亲友物过留给他的伤感，他几乎没有一天愉快过。这时期写的书信，更不说挽联一类文字，渗透着他的双重悲愤。唯一例外的，是他挽陈三立诗，表露了他的希望。

陈三立，字伯严，别号散原先生。光绪己丑进士，吏部主事，戊戌变法时和黄遵宪、江标、熊希龄等帮助他父亲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政变时革职。

挽陈三立诗作于一九三八年，七绝四首。其第四首：“频年烽火隔乡关，满地残花色自殷。为报返戈同杀敌，应教泉下一开颜。”陈是江西人，正是十年内战打得最频繁的地方，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敌。陈三立虽然已经过世（陈殁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时，一年后音讯才传到上海），还应该告诉他这消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位戊戌老人对盼望已久的国共合作终于实现是那么多的欢欣。

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和商务的行政负责人王云五再次研究应变方针，决定搬运上海闸北地区机器物资到租界；加速长沙建厂速度和扩大香港工厂；动员工人到香港、长沙工作；出版适合战争需要的读物。

随着战争的推移，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迁到长沙，但是董事会仍在上海，利用香港作中转，指挥方针大计。提升北平分馆经理孙伯恒为襄理，就近节制东北、华北各分支机构

应该提到的是，在沦陷了的北平有京华印刷厂，不接日伪印件，没有生意又不关门，仅仅排并无力量出版的丁福保和周云青编的《四部总录》，因为不开工日寇就要征用机器、铜、铅、纸张。上海工厂：“上海方面因环境关系，所接外来件范围较狭”。所以“狭”，是不接日伪印件。

一九三七年郭沫若别妇抛子离开日本回国参加抗日，行前作有《归园杂咏》：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表达了他“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的救国热忱。张元济见到这首诗后，有《和沫若先生归国书怀并步原韵》：

报国男儿肯后时，手挥慧剑斩情丝。
孤怀猛击中流楫，远志徐搴旭日旗。
甘冒网罹宁结舌，编规泽袍更陈诗。
惭余亦学深宵舞，起视星河泪满衣。

这首诗表达了张元济钦佩郭沫若在国家垂危的时候，不顾自己一身一家的精神，也表达了他也要投入抗日洪流的心愿。虽然年过七十已不能跃马横刀，但何处不是骋驰的战场。这段时间他有时间写一些诗，讴歌抗日英雄。

歌颂英雄和谴责国民党与汉奸是他文字中经常出现的内容。一九四三年题黄花岗图：

男儿死耳曾何惜，为拯斯民水火中。
太息英雄长已矣，谁怜深热陷重重。
我尝瞻读新阡表，猎猎西风留墓门。
举目山河浑不足，诸公何以慰英魂。

还有一个画龙点睛的注：“壬戌之春，余有事于粤东，精卫导余至其地一游。俯仰凭吊，且遍读

其所书铭碣。追思往事，回首黯然。”

“壬戌之春”，是指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到广州重新组织起军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二次护法运动开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见孙中山，向他提出联合工农和建立革命军队的建议以后，广州军政府决定招商务印书馆在广州或香港设厂，解决广州军政府的印刷需要。张元济一九二二年三月在广州作了二十天设厂调查，汪兆铭（精卫）负责接洽，在三月二十日陪同瞻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烈士墓碑是当年汪兆铭所写。而一九四三年汪兆铭早已在南京当汉奸了。

爱国之士对民族败类是最所不齿的。张元济和汪兆镛是关系极密的朋友，对他的弟弟汪兆铭的胆识早年也是很佩服的。但是汪在一九四〇年三月签署完“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时，张马上想再版自己三年前出版的《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他写信给胡适求序：“弟于三年前辑有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选自左传、国策、史记，凡十余篇。译为白话，意在供中小学校学生之诵览。颇慨叹近来人格之堕落，思从少年身上加以挽救。不料近来堕落日甚，上海各报时借是书发言警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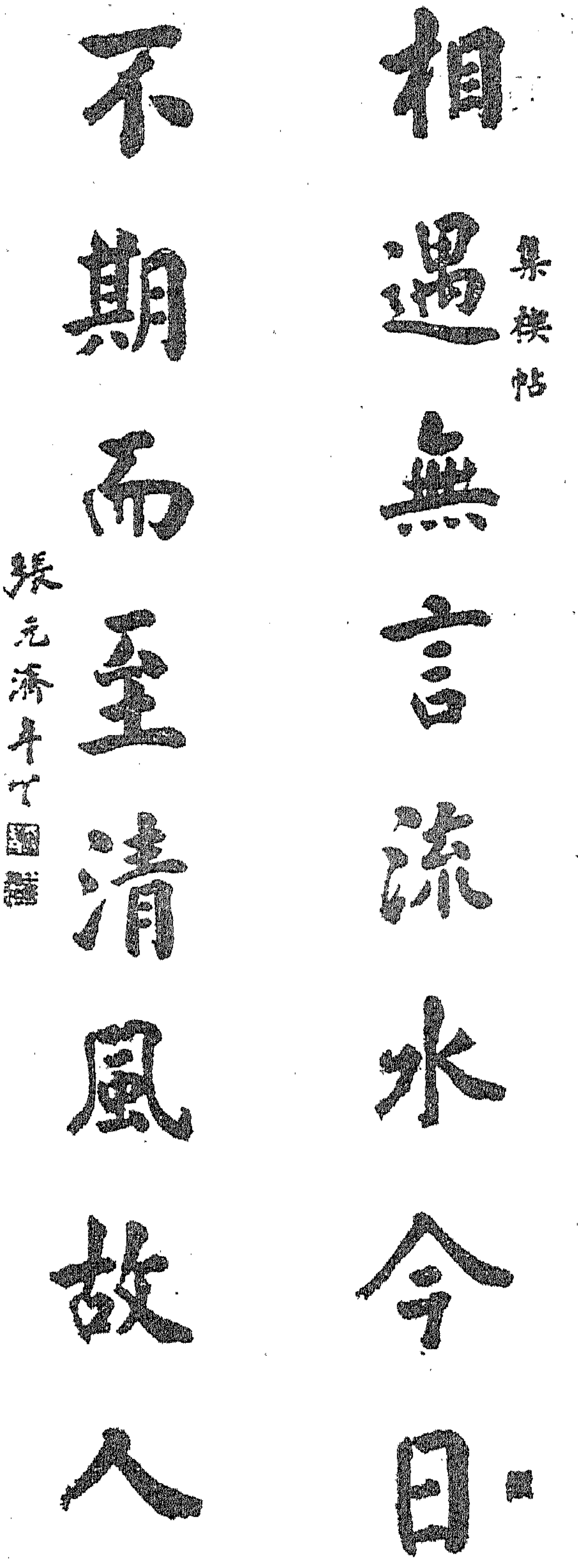
那本书是在一九三六年编的。当时国民党所作所为，可以拿"求生以害仁"亦即"人格之堕落"来概括。他从古书里选择了十几则杀身成仁的事，意思是中华民族历来"有杀身以求仁"的高尚人格，你们衮衮诸公"无求生以害仁"，那么我们民族就有复兴的一天。

他就是不求生以害仁的。在珍珠港事变以后，侵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孤岛沉没。有一天有两个日本军官坐汽车去他寓所，拿出名片要见他。他毫无畏惧地在名片背面写了"两国交兵，不便接谈"，让家属把名片退回，拒不接见。

自从一九二六年他辞掉监理以后，他的收入只有每年二百元董事车马费和股息。他的股份不多，股息收入极微（一九〇一年他投资只有四千元股分）。平日已经要略为挖一些积蓄，抗战以后停发股息，物价更是飞涨，很快就把积蓄挖空。一九三九年底，把自有的住宅卖掉，在霞飞路租了一幢房子。这时他开始以鬻书作为维持生活的手段，一直到解放。俞明岳说，他那时还要接济一些失业的昔日商务同人。

明末清初理学家朱用纯的《治家格言》多年一直被人传诵，影响极大。旧时大家喜欢请人用寸楷

把它写成一幅中堂，挂在客厅里。张元济卖字，常有人点名请写《朱子家训》的。他觉得《朱子家训》已经三百年了，世事已大变，词意太陈旧。比如，朱用纯不反对纳妾买婢，仅仅主张“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而他主张夫妇互相尊重、容许再嫁而



張元濟集褉帖對聯（張　同先生藏）

反对纳妾。他主张平等、民主、自由，尊重劳动者，等等，都是朱用纯的时代所没有。有些活动的目的已不适应当时，如教育，朱用纯说“读书志在圣贤”。而二十世纪读书已为国计民生。他说：“选科目宜顺其天性，择学校尤贵有良师。毋信无才是德之谣，女子宜习专业。毋蹈数典忘祖之弊，游学遂变于夷。”所以他利用《治家格言》这种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作《新治家格言》说是“揆度时势，补所未备”，其实是旧瓶装新酒。他的《新治家格言》不仅代人书写，还排印后分送亲友。不久解放了，一种崭新的伦理观念为大家所接受，他的《新治家格言》社会影响不很大，但研究他的思想，却是一个很重要的材料。

抗日战争期间，他认识了几位年轻的朋友，成为忘年交。

一九三九年初，叶揆初提议，和陈陶遗、张元济在上海组织合众图书馆。各人捐助经费和图书，收藏以古籍为主，是东亚学专门图书馆。经苏州藏书家潘承厚先生介绍，聘请顾廷龙先生主持馆务。

顾廷龙同志是著名史学家、目录版本学家和书法家，对音韵学极有研究。当时在燕京大学图

书馆。

两人年龄相差虽近四十岁，但志趣情操相投，成为往来最密的朋友。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五九年，整整二十年，三二天，两人总要在一起谈谈学问，谈谈时事，还是文字交。

另外就是俞氏明时、明岳兄弟，他们是商务的新股东。

商务创业人鲍家的股票在一九四四年底就卖掉，流到俞氏兄弟手里。俞氏浙江镇海人，在上海从事金融活动。在那个年代，在上海金融界活动的人投资于商务印书馆这样因出版物严肃而陷入经济困境的印刷出版企业，可以说是别具慧眼的。

张元济通过陈叔通、叶揆初，了解到俞氏兄弟是可以信托的，虽然相识时间不长，彼此成了赤诚相待的朋友。当时社会经济情况恶化，继鲍家后，有些股东也在变卖股票。张元济曾经和俞明时有过一次长谈，嘱托遇有商务股票大宗流动时，务请尽早通知，要他们努力防止商务的股票落入对商务不怀好意的人手里。

法国高等汉学研究院出版的让-比尔·德莱日的著作《上海商务印书馆》说：抗战后，“政

府在两家主要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中取得大量股份。”是毫无根据的。张元济始终努力保持商务股份不落入有政治色彩的人手里。

商务在文化出版界有很大影响，而“业务向来避免和政治接触”（1950年股东会报告）。一九二七年以后，一些政治力量多方想控制商务而始终没有能达到目的。上海沦陷，特别是珍珠港事变，日伪力量进入上海租界以后，日伪对商务软硬兼施，屡次施加压力，想改变商务的性质，为他们的“大东亚共荣圈”服务。日伪曾经以没收相威胁，也用教科书垄断权引诱过，也命令过中日“合资”，命令改选董事和增加资本。这些都被软泡硬顶推宕掉。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对在上海和日伪周旋的董事会热烈鼓掌致敬，说：“当上海沦陷后，公司备受敌伪胁迫危害。但在菊生先生暨各位董事主持下坚决抗拒，始终不屈，不开股东会，不改选董事、监察人，不更改组织，甚至连公司的股本都未增加。我们实在可以自豪。处在当时恶势力下工商机构改组的有多少，但本公司始终没有改组；增资的有多少，但本公司始终没有增资。这不能不归功于菊生先生和其他几位董事。”

本章主要引用材料

实藤惠秀：《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
《“一·二八”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毁记》（1932年）
张元济：《题朱遂翔抱经堂藏书图》
张元济致陈润生信（1932.6.8）
张元济致黄齐生信（1937.8.3）
《张元济书札·致胡适》
《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记录》（1936—1940年）
向敦厚：《三老祝蓉记》（《同舟》4卷11期）
张元济李宣龚致卢作孚等人信（1937年8—9月）
高君珊等：《高梦旦先生治疗经过》（《同舟》4卷11期）
访问俞明岳谈话记录（1984年）
Jean-Pierre Drege: La Commercial Press de Shanghai 1897—1949
张元济：《告窆文》（1934年）
张元济：《挽陈伯严先生》（1938年）
张元济与孙伯恒往来信
孙伯恒：《商隐日记》
张元济：《和郭沫若先生归国书怀并步原韵》
张元济：《题黄花岗图》
张元济：《中华民族的人格》
张元济：《新治家格言》

曹冰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统制中国出版事业的企图和暴行》(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

《商务印书馆股东会记录》(1946年)

顾廷龙张树年一九八二年谈话录音第四盘

十九

黎明前

一九四五年夏天，第二次世界大战胜败之局已定，上海人都在谈论“天快亮了”。张元济和家属有一天晚上乘凉，幻想“天亮”后的情况。当时他就说：“不要以为天亮以后有好日子过，国民党的味道也是不好尝的。”我们自然就会想起，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之后，关于商务印书馆的恢复，希望国民党“真能致民于生，而不再致民于死”那句话。抗日战争一结束，人民盼望着大家坐下来商讨实行民主政治，建设我们的国家。但蒋介石集团和美帝国主义者决定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一刻不停地推行他们的致民于死的步骤——发动内战。

内战、美“援”所带给中国人民的在城市是倾销美国货，是工厂倒闭；在农村，拉丁征粮，是田园荒芜。内战不得人心，在国民党统治区展开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国民党政府用逮捕、监禁、殴打、屠杀等暴力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一九四七年五月下旬南京、上海等六十多个大中城市发动了反内战的学生游行，上海反动政府指挥军警、特务镇压，打死打伤和逮捕了一批学生。张元济非常愤怒。在六月三日他联合唐文治、张乾若、李宣龚、叶揆初、钱宗成、胡藻青、陈仲恕、陈叔通、项兰生等上海七十岁以上知名老人，由他拟稿，上书市长吴国桢和警备司令宣铁吾。信里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根源在于内战，所以学生反对内战是人人同情他们的，“此要为尽人所同情。政府不知自责而调兵派警，更有非兵非警参谋其间。忽而殴打，忽而逮捕，”“人民犯法，有法庭在，不出于此而于法外任意处置，是政府先已违法”，义正词严。他们说出了老百姓想说的话，使反动派非常狼狈。

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的开幕式上，张元济是年龄最长的院士，所以请他在开幕式上致词。前一天他由儿子陪

同到南京，安顿下来后就起草发言稿。他讲话的主旨是反对内战。他认为戊戌以来内部争执不停是招致外侮的根源。他说："抗战胜利，我们以为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改造我们的国家了，谁知又发生了不断的内战。这不是外御其侮，竟是兄弟阋于墙。我以为这战争实在是可以不必的，……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商量的。"他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到处征兵征粮，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用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免不了要关门。"那天蒋介石和何应钦出席了开幕式，中外记者一大堆，影响很大。他讲话时何应钦等相顾失色。散会时胡适坐汽车陪他去休息，车上，胡适说："菊老，今天大家在做喜事，你的发言未免说得太杀风景了。"他不理胡适的话。

蒋介石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一九三三年日军侵占热河、一九三四年东北军南调、一九三五年华北特殊化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导致日本对我国的全面侵略，抗战胜利后又发动了这场内战。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一次比一次深重，科学文化所受的摧残一次比一次严重。就商务印书馆讲，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之役创巨痛深，损失极大，但很快就基本恢复。七七事变后的损失

更大。

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商务被日军轰炸、焚烧、查封的分支馆和工厂达三十三处。机器仅上海、香港两地就损失三百六十五台，被日军"征用"的铜模、字铅、纸张、油墨等原材料无算。珍珠港事变时，上海、香港两地被没收的书籍即达一千五百二十万册。

商务董事会在抗战一年后就说："直接损失或未必如"一二八"之巨，而间接损失实远过于彼时。"

内战时期虽然没有大的直接损失，国民党为了进行内战而大肆搜括，使社会经济破产，除了官僚资本和投机行业外，无一能幸免破产的噩运。对文化事业说来，最怕的莫过于这种社会情况。

商务在抗战期间，在上海，还有能力影印《稼轩词》、《宛陵集》以及出版《孤本元明杂剧》这样大部头书。在重庆，有能力出版康德、费希特等学术著作。而在内战期间，几乎没有出版过印数少的学术著作。甚至还想卖掉一些书的纸型。卖纸型，就出版社讲是最凄惨的事（见《书札·致顾廷龙第46信》）。

国民党政府在社会经济破产时又一次敲骨吸髓

地大搜括，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发行“金元券”，强行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这个“政策”连国民党内部都很少有人支持。蒋经国的日记里讲：“今天最可忧虑者，即高级官员对此策多抱观望、怀疑以及反对态度。”而王云五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出任财政部长从事这件事情，并且一再宣称发行“金元券”后，财政收支能够平衡，“今后币制稳定，通货流通速度减低，物价自可稳定，预算即可平衡”（王云五答复立法院质询）。蒋经国的“打虎队”、王云五的“保证”，软硬兼施，仅上海中央银行从市民中收兑的黄金、白银、外币就值三亿七千多万美元。很快“金元券”宣告贬值，财长王云五下台，无数升斗小民劳累一辈子省吃俭用的积蓄变成几张废纸！

三年内战和“金元券”圈套，帮助张元济彻底从不过问政治的一贯立场，转移到关心政治。当然这种变化还有朋友们的影响，特别是陈叔通。

十一月初王云五下台，正好他在商务的替身朱经农因为要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向商务董事会请假。张元济说，请假不如辞职，解除了他的总经理职务。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邀王云五入阁，任经济部

长，他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一九四七年他介绍朱经农自代。朱经农和王云五私交很厚，和国民党关系很深。

十二月十九日，商务印书馆股东年会上，张元济建议不选王云五为商务董事。

王云五说："我于三十七年（1948）冬解职南还不久，他（张）突然写信给我，内有'本年股东年会甫于本日举行。与同人相酌、谓公此时正宜韬晦，不敢复以董事相溷，想蒙垂察'等语，轻轻把联任二十年的老董事革除。"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使得社会经济凋敝，商务印书馆出不了几本书，业务萎缩。古籍是完全没有条件影印了。一九四六年股东会上，吴瀓英向张元济建议重印古籍。张回答他：一本书"影印，动辄经年，目前人力物力两感困难。"最困难的是大部分人饭都吃不饱，有谁买古籍。这一段时间他比较空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也更加暴露。一九四七年底他就上海报纸上所揭露的国民党倒行逆施的事情，陆续写《时事杂咏》二十多首，讽刺国民党及其政府。第一首叫《发行大票》："州官放火原依例，百姓如何可点灯。一样葫芦重画出，而今遍地是田登"，讽刺国民党在发行大面额钞票时禁止

商人"藉机抬高物价"，而同日宣布邮政费用提高300%，电报电话收费提高200%。

《囚请加刑》："堂上刑官将下笔，囚徒反乞莫从宽。吹箫何处寻吴市，囹圄还能博一餐。"我们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大公报》上找到了犯人在法庭请求法官增加刑期的报道。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下旬教育部公布修订学生自治会规则，明确规定自治会不能干预学校行政，不能参加学校活动。规定"自治会"理事由学校圈定，"自治会"活动由学校派人监视指导。他写《学生自治会》诗一首，讽刺国民党所允许的"自治"："防民之口甚于川，若要防心更甚焉。不见秦王除腹诽，长留话柄二千年。"

当时国民党政府正搞"行宪国大"选举丑剧，报上不断选举丑闻，他当然要做一首诗记录。《选举证》："选民诉讼闹纷纷，得票多云数未真。民意不妨凭假造，传来心法袁项城。"他已经把蒋介石比拟做袁世凯了。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的死讯传到上海，他在日记上写"闻袁世凯病毙"。这个毙字表明了他对袁世凯的全部看法。

玩火者必自焚。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内战政策到一九四八年已经自食其果，众叛亲离，经济、政

治、军事已经都不能维持。为了取得喘息的时间以便卷土重来，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元旦发表了求和声明。接着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天津解放，二十一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一月三十一日，李宗仁派甘家侯到上海请张元济出任“和谈”代表。张元济虽然竭力反对内战，主张大家坐下来谈，可是从元旦蒋介石求和声明里他知道国民党并无和谈诚意。蒋介石虽辞掉“总统”，并未下野，还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溪口老家指挥军政。李宗仁只是傀儡，什么都作不了主。所以他连甘家侯都不见，只让家属代递一封回信，请他带给李宗仁，信里说：“连日在报端屡读文告，自揣庸愚，实无涓埃可再为高明之补”，断然拒绝受命。

进入一九四九年，最后一根束缚中国人民的铁链将被斩断，商务印书馆把《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停刊，聘请曹未风、章靳以、董秋斯、李平心、董每戡等，筹备编《新东方》等新书刊，迎接上海解放。

本章主要引用材料

《张元济书札·营救被捕学生函》

张元济：《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张树年一九八二年谈话录音第4盘

陆诒：《张元济先生二三事》（1956年8月2日《新闻日报》）

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九年来之报告》

蒋经国：《沪滨日记》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第34—37章。

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

王云五：《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我所认识的朱经农》（均收入《王云五回忆录·谈往事》）

刘涛天《出版业经营家王云五先生传略》（《同舟》3卷7—8期）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李宗仁张元济往来信

二十

“及身已见太平来”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上海人民沉浸在欢乐的阳光中。刚解放，所谓“汉兴，接秦之疲”，社会生活困难极多，但是崭新的社会制度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气象，在困难面前人人信心百倍。这位在上海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八十多岁老人，第一次见到这种社会精神面貌。这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北伐打倒旧军阀、抗战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些社会转变时所没有过的振奋精神。在六月，他为朱屺瞻画讲学堂图题词，词中说：“今我风气日新，人心振奋、诚有剥极思复之象”，表达了上海解放一个月来他对新社会的看法。虽然新的社会制度他接触还不久，但他知道，这正是他几十年所

追求和为之奋斗的独立、富强的中国，尽管现在还很穷。他热爱这新社会，他重新参加了停止多年的政治活动。

解放后他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

一九四九年八月前，陈云同志和陈毅同志分别拜访了他。陈毅同志是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身分拜访耆宿会面的。陈云同志是"商务老同仁"的个人拜访。

陈云同志原名廖顺云，一九一九年底进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店员，后来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商务印书馆工会担任发行所职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前离馆转入地下，年底退职。这次和张元济见面时，告诉他去年在东北视察的时候在商务印书馆东北各分馆见到的情况和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

九月，张元济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特邀代表到北京参加会议。这次会议前后一共在北京耽了近五十天。是他清末离开官场

以后在北京耽搁时间最长的一次。五十天里他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也结识了无数新朋友。北京已经多年没有去了，老年人旧地重游，总有一种特别的感情，特别爱回忆，爱对比，五十天里他回顾了戊戌以来的五十年，懂得了一些新的东西。

政协开幕前，九月十九日，张元济午睡在床，陈毅同志到他前门六国饭店住所，说"菊老，毛主席让我来邀请您和李明扬先生一起游天坛。车子在外面等。"到天坛，毛主席在祈年门外等候，还有程潜、李明灏、陈明仁以及刘伯承、粟裕等好几位。他们一起浏览了祈年殿、圜丘、回音壁。在回音壁外树荫下，毛主席请大家坐下休息，喝茶、谈天。大家随便谈，最健谈的是陈老总。张元济最年长，毛主席坐在他旁边，问他戊戌政变时情形，问光绪召见时的仪式。毛主席谈到商务印书馆，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有益于人民大众，他读过商务出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

毛主席还说，你是参加戊戌变法运动的，你们几个读书人，关起门来变法，是注定要失败的。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你们不发动群众。我们就不一样。我们发动群众，群众起来，革命才能成功。这次革命，实际是人民革命，不是共产党一党的事。就以

前几天重庆号军舰起义讲，船上七百多人，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证明。所以这次革命不单是靠共产党，一定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起来了，革命才能成功。你们戊戌变法也流了血，有六个人被杀。的确对社会进步起了推动作用。

当天晚上张元济回饭店后，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夜已很深了。他孩子问他，您是不是睡不着。他说："我有点兴奋。今天看到毛主席，现在回想回想过去。我见过光绪，见过袁世凯，见过孙中山，见过蒋介石。光绪想把国家治理好，但是人太懦弱。结果变法失败了，后来死得不明不白。袁世凯是个枭雄，阴险毒辣，像曹操一类的人物。孙中山，说得多做得少。蒋介石，竟是一个大流氓。今天看到了毛主席，我觉得毛主席是有学问，有胆略。而共产党，你看前几天周恩来，对人是那样体贴入微，想得那样周到。我看中国从此有希望了。"

几天后他应张志让请求，追述戊戌变法，即记录整理后发表在《新建设》一卷三期的《戊戌政变的回忆》。文章里强调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必然性，和整整一年前他在中央研究院演说里强调变法失败的偶然性，认识大不一样。

九月三十日，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同

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二天下午三点，三十万人在天安门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毛主席在大会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公告。那天傍晚天安门前阅兵和游行六点完毕，张元济回到住所后，因为累了，八点半就上床休息了。这样兴奋的日子如何睡得着呢，加以外面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子夜方止。思绪万千，他又一次失眠，披衣起来，摊开信纸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还送给毛主席一部《林文忠公政书》，即林则徐的著作集。这封信和主席三天后的复信的内容我们都没有见到，但是我们都能想象到他送书给毛主席的心情。

会议期间他积极从事工作。预备会期间讨论《共同纲领》草案的时候，第三十六条关于交通，他建议增加推广水运的决定，被大会采纳。十月十一日晚上，毛主席请他到颐年堂住处吃晚饭。在饭前谈天的时候，他向毛主席建议："一为应令下情可以上达。报纸应酌登确有地址姓名之来稿，以广言路。二为建设必须进行。最要为交通，其次为工业，再次为农业。抗战八年、内战三年，民穷财尽。若百端并举，民力实有不逮，不能不权衡缓急。"

会议期间他住的地方就在东交民巷附近，八月八日傍晚，他在东交民巷东段散步，竟然耽了三个小时才回到住所。这儿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成为使馆区，是使人感慨万千的地方。民族之间、国家之间，随着社会的发展，应该是加强彼此之间平等而互利的交往，促进各自的发展。清代的闭关政策，窒息了正在发展着的商品生产和对外贸易，失掉了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逐渐落后。资本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又用炮舰霸占了这个罕见的使馆区，——外国人可以驻兵筑堡垒，而中国人不能随便经过；不是办理外交事务而是指挥中国政府。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在这可纪念的日子里，挺起胸，走着，会引起思潮起伏的。

在戊戌政变那天，他和通艺学堂的同学到这儿日本使馆去见刚到北京来的伊藤博文，请教变法的事。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是诚心诚意以日本为师的。但是真如毛主席所说："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鳞次栉比的使馆，那一个不是说要帮助中国富强，最后以掠夺了事。派人留学、辛亥革命、北伐战争，都不足以制止。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驱逐了日本帝国主义；三年解放战争，在国民党军队背后的美国也不敢直接出兵。

曾经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人，现在，毛主席说："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

张元济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十月九日，第一次全国委员会开会以后，会议活动全部结束，他有余暇从事一些个人活动。他领儿子树年到西皇城根灵境宫井儿胡同凭吊原来兵部尚书许庚身的旧居。在前院他们流连了片刻。戊戌政变以前，他和许庚身的女儿正是在这儿结婚，住在这儿好几年。五十年了，现在门墙已多有移动，已经不是旧时景象。逡巡而出，不胜感慨。戊戌年他是从这儿离开北京的。他同树年说，政变，他革职永不叙用的命令下来以后，这大院里有两位老太太，对他大不一样。一位是他岳母，树年的外婆。对他大为责怪，说他闯了大祸，丢了官，不许在北京住了，连累了他女儿，不能当诰命夫人，永无出头之日。一位是他母亲，树年的祖母。她左手拉着他的手，右手拍着他的手背说："儿啊，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再四安慰他。对母亲的安慰，他不觉一阵心酸，捧着母亲的手泣下如雨。母子的心是相连的。八月六日政变，就追捕康有为等，张元济在八日写给汪康年的信里就断定"将来必有株连"，而

且传说要抓他，他不怕被抓，只怕抓时母亲受惊。在革职的命令没有下来以前，他每天早出晚归上班，让当轴知道他在班上而不到他家里抓他。

政协成员和出版总署里有很多二十年代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人，如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等等。政协成员里还有商务的老作者和老读者，像郭沫若、费孝通、宦乡等等。会议期间多有交往。他们非常关心商务印书馆的状况。商务在解放以前几十年，以出版“业务避免和政治接触”的办法而在动荡的政治变动年代保持了独立性，对政府采取了警戒和守法的态度，而能为广大人民作一些单纯的文化工作。现在政权回到了人民手里，应该有所转变。也许是“惯性”吧，“业务远跟不上政治”（1950年股东大会上董事会报告），就相形见绌，较为落后。张元济在和他们接触中请他们协助规划商务的出版业务，并且聘请其中的一部分人担任商务的编审出版委员会委员，指导工作，“俾馆中工作得与文化建设方向相适应。”

另外，他向出版总署提出了商务印书馆公私合营的私改和私改以前请推荐人员的要求。

从北京回到上海后的一二个月，一方面，他要

规划商务印书馆适应社会制度的变化，很多事都要他出面办。一方面，社会活动比较多；也有一些人，你门庭冷落的时候他不认识你，你稍稍有点活动，他今天来叙旧，明天来请教，后天来寒暄。人来人往，打破了近几年形成的安静生活习惯。虽然他的情绪一直很好，在决定去北京开会前做了详细的体格检查，但终究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安静过一段时间，不适应骤然的变化。

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商务印书馆工会召开成立大会，请他出席，会议将近结束，请他讲话。解放后不久，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筹备工会，正是上海"六二大轰炸"之后，经济很困难，劳资双方几个月来协商共同克服困难，比较协调。商务印书馆从一九二五年起始终有工会，只是政治背景不同。他都接触，心里自然有评价，请他讲话时比较兴奋，恰恰是老年人最忌的。刚讲了几句，他忽然面色苍白、左足频动，身体失去平衡，神志还清楚。经送医院诊断，是脑血栓形成。

第二天他一直高烧和昏迷。陈毅和陈叔通都去医院探望。陈叔通见了落下了眼泪，对张树年讲，"我看恐怕没有希望了吧，要准备准备。我心里很难过。"后来慢慢有所好转，到春节，神志已经完

全清醒，五月七日出院。夏天已经可以偶尔见见客人，小谈几句。他左侧上下肢功能也有所恢复。

从一九五〇年夏天到一九五五年，张元济除了因为左侧上下肢偏废常在床上外，一切如常。每天仍然看书看报，写信，有时也写些诗。

一九五〇年秋天，由顾廷龙帮助整理他在一九三二年所著《涵芬楼烬余书录》。顾先生后来回忆说："曩岁承命佐理校印《涵芬楼烬余书录》时，病偏左未久，偃卧床第。每忆旧作，辄口授指画，如某篇某句有误，应如何修正，又如某书某刻优劣所在，历历如绘。"可见他的脑力精力一如病前。

他写的诗很少发表，除了《回忆戊戌政变杂咏》二十首以外。毛主席在一九五一年复他的信里说"积雪西陲一诗甚好。"这是他的告存诗。全诗是：

"积雪西陲今渐化，怒涛东海讵难平。
祈天我欲须臾缓，扶杖来观告武成。"

告存诗是大病后答谢亲朋慰问的。诗作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下旬。第一句讲当时刚签字的和平解放西藏协定。后三句讲朝鲜战争的事，他相信中朝人民必然会挫败美国侵略朝鲜的野心。

一九五三年他又写一次告存诗：

“预期计划盈三五，社会主义万般新。

愿留老眼睹新国，我倘能为百岁人。”

一九五三年所作《和陈叔通出国纪事俚言二十四首》，其中《大会公报用五种文字》、《决定今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等，都表达了解放后我国民族团结、国家昌盛、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给他所带来的喜悦心情。

一九五三年国庆前夕，他读毕方志敏烈士的遗著《可爱的中国》，在扉页上这样写：

“可敬的烈士

可喜的中国已有人使中国脱离半殖民地之困陁

而复为独立之中国

最可惜的烈士先已成仁不及亲见中国之复兴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张元济”

一九五六年他九十岁生日后，体质逐渐衰弱。次年夏天的一次感冒引起肺炎，久不退烧。八月住院治疗，有好转。但是医家说：“肺炎是老年人的好友，来了就不愿走。”武汉长江大桥落成，报上登了消息和发了照片。他非常高兴，翻来复去地看。说想做一首诗，表达自己的喜悦，但脑力衰退，已经做不出来了。一九五八年春天，周恩来总

理到上海，便中到医院探望他。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只说了句："毛主席好。"他喉部肌肉已活动困难。

一九五九年起，他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八月十四日晚上七点，这位毕生为祖国独立富强勤奋工作的老人停止了呼吸。终年九十三岁。

八月十七日，上海市举行公祭会，灵前悬挂着他的自挽联：

"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过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这般新世界，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

毕生的勤奋和欢乐尽在于此。

本章主要引用材料

张元济：《题朱屺瞻画讲学堂图》
张元济：《赴会日记》
张树年：一九八二年谈话录音·赴会前后
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
张元济：《追述戊戌政变杂咏》
张元济沈雁冰往来书信
商务印书馆一九五〇年股东会记录

吴泽炎："一个商务人看商务"录音第二盘
顾廷龙：《涉园序跋集录序》
《毛泽东书信选》

后　记

编写张元济的年谱和传记，在他生前失掉了机会，现在只能依靠文字资料。他与人交往极多而性格内向，个性极强而能克制，办事多而不居功。从现在搜集到的材料，远不足以说清楚他的思想和感情。所以这本小书不是研究的成果，只是材料搜集的开始，向读者提供一个轮廓和线索。如果能辨正一些流传的轶闻，我就很满足了，——我正是对这些轶闻困惑，从而开始搜集材料的。

一本以材料为主的书，注出处就注不胜注。为了节省篇幅、排版和阅读方便，只在每章末，将引用的材料按其被引用先后列出。对于研究者，根据每章的书目，核查引文的正误，并不困难。书后附

全书的引用书目。

汪 家 熔

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

引用书目

本书目不是执笔时准备资料的全部，仅限于引用到的。以汉语拼音排列，未注出版者的基本上是原稿或抄件。未出版的诗词、挽联不列入。已见文集的单篇不列篇目。

包遵信：《中国近代一位感觉锐敏的人》《光明日报》1982年5月10日
蔡元培：《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君传》《同舟》2卷6期
曹冰严：《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统治中国出版事业的企图和暴行》张静庐辑《中国出版史料补编》1957年，中华书局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草原出版社1979年香港
陈叔通：《回忆商务印书馆》《文化史料》第六辑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科学出版社1955年
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

丁英桂：《一九八一年访问谈话记录》
——《一九八二年访问谈话记录》
杜亚泉：《文学初阶》1—6册商务印书馆1902——1904年
——《鲍咸昌先生事略》《鲍咸昌先生哀挽录》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
高风池等：《本馆创业史》《同舟》2卷10期
高君珊等：《高梦旦先生治疗经过》《同舟》4卷11期
高梦旦：《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时务报》第26册
高乃同（平叔）：《蔡孑民先生传略》商务印书馆1943年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
顾廷龙回忆张元济的谈话录音1982年
——《私立合众图书馆十四年小史》
顾廷龙、张树年回忆张元济的谈话录音1982年
关国煊：《王云五小传稿》《传记文学》第35卷第3期，台北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 1958年
贺世友：《杨贤江年谱》
侯宜杰：《袁世凯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
胡适：《胡适的日记》《新文学史料》第5辑
胡文楷：《张菊老校书琐记》
胡愈之：《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人民日报》1981年4月25日）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
蒋经国：《沪滨日记》

蒋维乔：《鷇居日记》
——《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张静庐辑《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
——《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东方杂志》第33卷第1期
——《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人文》复刊1期
——《辛亥革命闻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八册 上海人民 1957年
蒋维乔庄俞等编张元济高梦旦校订：《最新国文教科书》第1——10册商务印书馆1904——1906年
——《最新国文教科书教授法》商务印书馆1904——1960年
《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卷》第1—7册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篇 中华书局1981——1982年
李一氓：《纪念杨贤江同志》《光明日报》1949年8月9日
李宗仁张元济往来信（1949年）
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5册中华书局1936年
林熙：《从张元济日记谈商务印书馆》《大成》第105——108期香港1982年
刘涛天：《出版经营家王云五先生传略》《同舟》第3卷第7—8期
刘思生：《世载堂杂忆》 中华书局1960年
鲁迅：《病余杂谈之余》《且介亭杂文》
陆费逵：《京津两月记》《教育杂志》第3年第8期
陆诒：《张元济先生二三事》《新闻日报》1956年8月2日

《民国人物传（四）夏曾佑》中华书局1984年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讨论创作致郑振铎信》《小说月报》第12卷第2期
——《影印小说月报序》《小说月报》影印本第12卷卷首
——《忆杨贤江兄》《光明日报》1949年8月9日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书信选》人民出版社
墨悲：《苏杭甬铁路资料》（一）（二），日本 1905年
《平海澜关于南洋公学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2年
钱仲联：《文廷式年谱》《中华文史资料》总第二十四辑
瞿凤起：《答友人问》
《商办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暂定章程》《东方杂志》第3年第3期
《商部代奏浙绅筹资筑路折》《东方杂志》第3年第1期
《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会议记录》
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九年来之报告》1946年
——《民国二年股东会报告书》
——《民国三年特别股东会报告书》
《商务印书馆股东会记录》
《商务印书馆志略·历年筹备公共教育事业一览》1929年
《一·二八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毁记》商务印书馆1932年
盛宣怀：《愚斋存稿》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1981年
孙伯恒：《商隐日记》
孙楷弟：《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上海杂志公司
〔孙毓修〕：《四部丛刊〔初编〕书录》商务印书馆〔1920年〕
《孙中山自述》见《Revolution of China》商务印书馆1912年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中华书局1982年
《通艺学堂章程》
汪家熔：《外交报史料》
——《商务印书馆早期书录》
——《商务印书馆的绣像小说》《出版史料》第二辑学林出版社
——《东方杂志是否有南方版北方版？》《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3期
——《高梦旦先生小传（1870—1936）》《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之二十七
——《泽本郁马著商务印书馆和夏瑞芳一文的译注》《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之二十二
——《东方杂志概况》《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之五
——《涵芬楼与东方图书馆》《图书馆学通讯》1982年第1期
《汪康年昌言报启事》《昌言报》第1期
汪诒年致张元济信（1936年）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
《汪穰卿师友书札》
王云五：《王云五回忆录·谈往事》华国出版社1964年香港

——《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台北
——《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台北
〔王季康〕：《中华书局七十年大事记》《中华书局七十周年纪念刊册》，1982年
王君九（季烈）：《元明杂剧提要·序》商务印书馆1941年
《翁同龢日记·壬辰春闱》商务印书馆1924年
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张静庐辑《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
吴泽炎：《一个商务人看商务》讲话录音1—2 1981年
吴稚晖：《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东方杂志》第33卷第1期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中华书局1958年
夏瑞芳暗杀案材料《申报》1914年1—2月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商务印书馆
向敦厚：《三老莅蓉记》《同舟》4卷11期
谢菊曾。《十里洋场的侧影》花城出版社1983年
《辛亥革命材料·汤寿潜张元济辛亥九月往返电》
《惺存遗著》商务印书馆1922年
《学府汇闻·国立交通大学·校史纪年》董鼐主编 南京出版公司1981年台北
严独鹤：《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闻界》《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2年
严复致张元济信
严复：《英文汉诂·序》商务印书馆1905年

颜之推：《颜氏家训》
杨铨：《五十年来之工业》《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1922年
叶景揆：《卷庵书跋》文学古典刊印社1956年
——《卷庵賸稿》1957年》
叶圣陶：《记我编小说月报》《文汇报》1983年8月24日
叶宋曼瑛：《张元济与新文化运动》《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2期
《影印四部丛刊卷》
邮传部电报十件（1907年）
《于光远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一日讲话录音》
《访问俞明岳记录》1984年
袁翰青：《自学有成的科学编译者杜亚泉先生》《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之十六
章开源等主编：《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季子九录》
《张謇日记·辛亥年》《张季子九录》
《〔海盐〕张氏族谱》
张树年：《一九八二年谈话录音》1—6
张荞明：《怀念和感激》《联合书讯》1982年2月
张元济：已丑浙江乡试硃卷
——壬辰会试硃卷
——《答友人问学堂事书》《教育世界》壬寅二期
——《埃及近世史涉园主人序》《埃及近世史》商务印书1903年
——《最新修身教科书》第1—10册商务印书馆1904—1905年

——《最新修身教科书·教授法》第1—10册商务印书馆1904—1905年
——《东方图书馆缘起》
——《记影印描润始末》张静庐辑《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　中华书局1955年
——《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东方杂志》34卷16—17期
——《中华民族的人格》商务印书馆1937年
——《涵芬楼辑本夷坚志校例和跋》商务印书馆1940年
——《校史随笔》商务印书馆1938年
——《宝礼堂宋本书录》（原署潘宗周著潘氏出版1938年）
——《涵芬楼烬余书录》商务印书馆1951年
——《戊戌政变的回忆》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版
——《追述戊戌变法杂咏》（同上）
——《涉园序跋集录》顾廷龙编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
《张元济日记1912—1926》商务印书馆1981年
《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81年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
张元济　《祭四弟文》
——《送简摒人滇序》
——《致学部书》
——《上庆王书》
——《告茔文》（1934年）
——《题朱遂翔抱经堂藏书图》

——《跋今献汇言》
——《新治家格言》
——《在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上的致词》
——《题朱屺瞻讲学堂图》
张元济致沈曾植信（1898年）
张元济致蔡元培信
张元济致原亮三郎信（1911年）
张元济致伍光建信（1934年）
张元济致商务印书馆扶助职工子女教育基金委员会信（1925年）
张元济致庄俞信（1929年）
张元济致陈澜生信（1932年）
张元济致吴梅信（1932年）
张元济与长泽规矩也等日本友人往来信（1927—1937年）
张元济致黄齐生信（1937年）
张元济与孙伯恒往来信
张元济与沈雁冰往来信《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之三》
张元济李宣龚致卢作孚等四川人士信（1936年8月）
张远：《无闷堂文集》卷七
张宗祥：《说郛序》
——《冷僧自编年谱》
《赵凤昌藏札》第107—108册
赵世暹：《记张老伯二三事》
《浙赣铁路资料》
郑鹤声等：《中国文献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28年
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　中华书局1965年

郑振铎：《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劫中得书续记》
——《百衲本二十四史缩印本序》
《中国交通史·路政篇》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宓汝成编　中华书局1963年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杨默夫译本龙田出版社台北
朱用纯：《治家格言》
庄俞：《谈谈我馆编辑小学教科书的变迁》《同舟》第7期

*　*　*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1年
——《日本文化の支那への影响》映雪书院1940年
樽本照雄：《商务印书馆和山本条太郎》天理大学学教抽印本
——《金范堂·商务印书馆·绣像小说》《清末小说研究》第三期1979年
泽本郁马：《商务印书馆和夏瑞芳》《清末小说研究》第4期1980年
Jean—Dierre Drege：La commercial Press de shanghai 1897—1949
J.A.Fogel：《Nation's Formative years in the Meiji press》《Modern Asia studies》16:3
T.W.Howerth：《History of teach by correspondence》
《纽约时报》1930年6月1日报导转引自《出版月刊》第16期，台北

*　*　*

《亚泉杂志》第1—10册
《普通学报》第1—5期

《东方杂志》第1—8年
《教育杂志》第3—4卷
《中华教育界》创刊号
《外交报》第4年
《预备立宪公会报》第1—10期；会员题名录职员录
《法政杂志》1911年
《中外日报》1901—1903年；1906年8月—1907年2月
《民立报》1911年1月
《申报》1906年8月—1907年2月；1914年1—2月
《时事新报》1911年创刊号

走向未来丛书

人的发现	0.81元
增长的极限	0.87元
激动人心的年代	1.03元
GEB——一条永恒的金带	1.07元
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0.89元
现实与选择	0.95元
经济控制论	0.99元
探险与世界	0.95元
看不见的手	1.03元
语言学和现代科学	0.86元
在历史表象的背后	0.74元
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已	0.91元

· · ·

人的现代化	元
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	元
没有极限的增长	元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元
在国际舞台上	元
昨天　今天　明天	元
摇蓝与墓地	元
择优分配原理	元
第三次数学危机	元
凯恩斯革命	元
艺术魅力的探寻	元
西方文官系统	元
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演化	元
新的综合	元